

R U S S I A N S T U D I E 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年 第2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国别与区域研究

- 3 钱乘旦, 刘 军 /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
- 20 赵可金 / 当代俄罗斯研究的核心问题、范式演变与发展趋势
- 40 汪诗明 / 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 62 刘军梅 / 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
- 89 孙 祁, 尤利娅·哈里托诺娃 / 数据主权背景下俄罗斯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特点及趋势

俄罗斯空间观念与国家认同

- 108 徐 乐 / 从地理形象的重塑看俄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
- 128 李 暖 / “转向东方”: 俄罗斯东方学视野中的广州航道与海洋空间建构
- 159 葛静深 / 能源与当代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一项基于互文性话语框架的实证研究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刘 军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本期执编: 阎德学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2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2 年第 2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Цянь Чэндань, Лю Цзюн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Цянь Чэндань (3)

Чжао Кэцзинь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вопросы, эволюция парадигмы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20)

Ван Шим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кеан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40)

Лю Цзюньмэй

Механизм действия и хеджирующая логика контрмер России на крайние санкц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62)

Сунь Ци, Юлия Харитон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данны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данных: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тенденции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ока данных (89)

Сюй Лэ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в свете изменени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108)

Ли Нуань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морским путём в Кантон» и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океан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ориентализма (128)

Гэ Цзинишэнь

Энерг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Эмпи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в рамках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159)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2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Qian Chengdan, Liu Jun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Dialogue with Professor Qian Chengdan..... (3)

Zhao Kejin

Contemporary Russian Studies: Core Issues, Paradigm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20)

Wang Shiming

Oceania Studies: a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40)

Liu Junmei

The Mechanism of Maximum Sanc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the Hedging Logic of Russia's Countermeasures.....(62)

Sun Qi, Yulia Kharitonova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Legislation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 in Russi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ata Sovereignty.....(89)

Xu Le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A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Images Reshaped(108)

Li Nuan

“Pivot to the East”: The “Coast-to-Canton” Issu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Space in View of Russian Orientalism (128)

Ge Jingshen

Energ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Russi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Intertextual Discourse (159)

国别与区域研究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 ——钱乘旦教授访谈*

钱乘旦 刘 军**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不断发展。新文科建设的积极推进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和学科体系中的固态思维模式被逐渐打破,使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机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中发挥促进作用。国别与区域研究具有交叉学科门类的特征,能够弥补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域外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如果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既需要足够的现有学科支撑,又需要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交叉,从而设计合理的二级学科框架。同时,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还应该涵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智库建设、对外交流等重要的具体内容。此外,还应该坚持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既要向书本学习,又要向社会学习,其中包括向其他国家学习成熟的建设经验,以及在研究对象国、地区进行充分的社会体验与调研,进而培养“既是通才、又是专才”的学术团队,打造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学术成果。

【关键词】国别与区域研究 学科建设 新文科 交叉学科

【中图分类号】D50**【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003(17)

* 为响应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精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杂志于2022年3月28日对钱乘旦教授进行了访谈。本文根据访谈记录整理而成,并经过钱乘旦教授本人的审阅认可。

** 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刘军,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从学科边界到学科交叉

刘军：钱老师，您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步加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也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在这样的历史演进中回望初心，您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资深专家，如何评价 40 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发展历程呢？

钱乘旦：我们先简单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一个回顾。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建立为主要标志，我国开始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曲折。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采取了“全盘苏化”的方针，虽然向当时的苏联学习了不少优秀的经验，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正是改革开放以后高考制、学位制的恢复，对后来几十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积极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

在恢复学位制的过程中，教育部制定的、作为规范的学科目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果没有学科目录，我们不可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学科体制。这一制度在推动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方面起到了正面的、值得充分肯定的作用。但学科目录也为中国的学科制带来了固化，各个学科之间不互通、不往来，从而形成了自立门户、边界清楚的情况。这是学习苏联教育体制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就“学科”这个概念来说，西方也是有学科概念的，学科概念在西方国家已经流行了一百多年，它的出现甚至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18 世纪。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科制”是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学科制不等于学科。有学科的概念不意味着必定会出现学科制。我这里说的学科制就是把一个个学科固化、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互不往来的情况。就这一方面而言，学科目录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这种缺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学科区分在欧美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用我们现在通用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学科交叉变得非常普遍，尤其表现在理科、工科、医科、农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工科”当中。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在国际领先的科学研究当中找到界限清晰的学科概念了。同一个

课题既可以有物理学的内涵，也可以有化学的内涵、生物学的内涵，甚至于其他学科的内涵，国际学术界学科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以历史学科为例，以前它的传统研究对象无非是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等等，20世纪初有了经济史，又有了社会史，到了20世纪下半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心态史、生态史、情感史、环境史、人口史、疾病史、灾害史……学科交叉很明显。其他学科中也出现了同样情况。因此，学科交叉是不可避免的潮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术界、科学界取得的重大突破、成就几乎都是学科交叉——“叉”出来的。因此，在这样的现实当中，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学科的边界不可打破，仍然坚持严格的学科分割体系，显然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所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制的迅速建立、学科目录的迅速制定，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变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制度有它的缺陷，需要去改进。

刘军：谢谢钱老师。您刚刚提到，学科制不等于学科，学科交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并且现在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科技成就都是“叉”出来的。我之前也阅读过钱老师论述“文科为什么要交叉”的论文，^①学科交叉的问题实际上有必要放到更宽广的历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得到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都知道，现在教育部也在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刻，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建设具体实践中，区域国别学肩负着怎样的学科使命？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钱乘旦：新文科是一个听起来非常新颖的概念，但究竟什么是新文科？它的内涵是什么？直到现在也没有很成熟的阐述。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新文科指的当然不是我们过去研究文学，现在要去研究一种新文学；过去研究哲学，现在要去研究一种新哲学；过去研究历史学，现在要研究一种新历史学……新文科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无论是文科的哪一个部分、哪一个领域，都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① 参见钱乘旦：“文科为什么要交叉——兼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第130-136页。

中国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我们的关注点，有我们的结论，有我们的研究成果——新文科应该有中国自己研究出来的、体现中国研究特色的成果出现。第二个方面，新文科更多地体现在我们刚刚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学科之间的交叉，通过这个交叉能够产生新的角度、新的内容、新的视野、新的思想、新的成果，最终会出现非常出色的新的成就。第二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是我对新文科的理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和具体实践中，关于国别与区域研究有怎样的内涵，现在我们的学术界、知识界、甚至于整个社会都在讨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观点，还没有达到形成共识的程度。事实上，有很多人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解为要么是国际关系研究，要么是国际政治研究，要么就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理解。我认为，这些理解大多受到了我们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提到的学科体系、学科目录框架下固态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通过一种固态思维方式产生的理解，也就是仍然要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解为某一个界限非常清楚的、边界非常明显的固态领域。

然而在我看来，国别与区域研究恰恰不应该是这样的。从它的内涵来说，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个“全面了解”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试想，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一个国家，哪怕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比如说尼泊尔、缅甸、乌拉圭、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等等，真的要把它了解透，就要对这个国家、地区有非常全面的知识积累，这不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领域就能够完整涵盖的。这种了解包含的内容很多，甚至超出了文科的范畴——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比如气候、环境、地理、资源、水源、技术、人口、种族、宗教、教育……我们能够想到的和这个国家、地区相关的一切，都是我们在做国别与区域研究时需要去掌握、需要具备的知识。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积累与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有关的、全面的知识。这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要去完成的基本任务。

所以，现在我们社会上，包括学界、知识界，在理解“国别与区域研究是什么”这一问题上，视野还不够开阔。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宽广，仍然把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了解局限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方面，这是

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的体育、运动需不需要了解呢？是需要了解的。一个国家的史前情况需不需要了解呢？也是需要了解的。因此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是文科的事情，它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知识积累，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够形成我们的知识体系，而形成知识体系才有助于我们去深刻了解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基本情况。基于这样深刻的了解、全面的认识，才谈得上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才谈得上考虑我们应不应该去那个国家或地区投资，要怎样发展经贸合作关系，政治和外交关系如何处理等等。这不是随便碰碰、随便闯闯就能够做到的，没有全面的知识积累，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免碰壁。这是我们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当中不断碰到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真正内涵与意义，然而，这又恰恰是我们需要正确理解的。

二、历史演进与人才培养

刘军：近期我在给学生上课时讲到近代，比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①，比如林则徐把他组织翻译的材料送给魏源等等这些内容，由此我们也在思考，这是不是可以被视为我国近代早期的一种“国别与区域研究”，当然那个时候主要是翻译一些材料，所做的工作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现在的我们当然都是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沿着这样的发展脉络来看，我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现状如何？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这两个问题我们刚才也有所讨论，如果向更深远的历史和更广阔的未来伸展的话，我们又该怎样看待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呢？请钱老师再讲讲。

钱乘旦：《海国图志》问世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那时这个危险刚刚开始。当时一些较有远见的人、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我们中国人所认识的“天下”其实不够大，还有一个我们基本不了解的世界。这些人希望去认识这个世界，但当时的了解在今天看起来其实微不足道。例

^① [清]魏源撰：《海国图志》，陈华等点校注释，李金明等审校补注，长沙：岳麓书社，2021年。

如，佛郎机究竟是指什么地方？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西班牙也属于佛郎机，甚至更多的地方都是佛郎机，并不能解释清楚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它更多是“法兰西”的转读。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人才对那个曾经基本不了解的世界的大概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尽管如此，中国自从 19 世纪中叶以后所遭遇的一切，使得国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关注的重点基本上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存亡危机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在考虑怎样才能够救亡、才能图存，基本上在考虑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话，就把对外界的了解放到一边去了，或者是放到第二位，至多是第二位，大概连第二位都没有达到。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与当时国内国外整体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来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真的是百废待兴，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当时大概是 6 亿人口，要让 6 万万人民吃饱饭，有衣服穿，要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环境非常险恶，我们是被包围的，随时随地可能被扼杀，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我们也不可能有很多的机会或者说比较好的条件去了解外部世界。

所以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决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其实相当不足，甚至是匮乏，国内外环境使然，我们也无暇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也随着国际整体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已经迫切地感觉到，这种对外界所知甚少的状态，远远不足以去应付现在所面临的各项任务以及各种情况。

现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开始意识到，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必须“补课”。我们在这个方面欠缺太多，真的需要恶补，要好好补一下，所以我刚才用到的这个词就是“补课”。但当我们意识到需要去恶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资源是不够的，我们的积累是不足的。现在，我们把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提出来，而且从上到下都感觉到这个问题需要赶快去解决，否则的话会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前进的步伐，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和面对的未来在这方面都给了我们足够的提示。但是仅仅意识到这

一点还不够，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我认为目前有可能把区域国别学设置为学科目录中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采取具体行动的重要的一步，也是正确的一步。

刘军：谢谢钱老师。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也派出了一些考察团，比如向东欧、日本等等这些地方都派出了考察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对外界所知甚少，为了“补课”。现在我们还是要补课的，也正在补课，所以区域国别学这样的学科设置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在这些具体行动过程中，正如钱老师您所指出的，交叉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主要特征，这个“叉”出来的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门类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它会最终突破其他学科的影响而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学科属性吗？作为独立学科进一步构建与发展的区域国别学应有怎样的学科自觉？应树立怎样的学科自信呢？

钱乘旦：我刚才说到我们确实很欠缺，需要去补课。我们最欠缺、最缺少的是什么？从现在的情况看，是人，我们缺少人才——就是在区域国别方面能够进行研究、能够去做工作的人才，我们缺少的是这样的人。其他东西都好说。比如说我们曾经没有钱，现在有没有钱呢？当然不是很有钱，但是经济问题不是大问题。我们曾经没有书，现在有没有书呢？我们有的是书，资料都是现成放在那里的。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们最拿不出来的恰恰是人。你刚才提到我们派出考察团到不同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去走一趟，去了解一些情况。这当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在补课，但是短期地、走马观花地走一走是难以了解更深层的问题的。我们必须去对象国，待在那里，了解那个地方，知道那个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解那个地方的人，了解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了解它的风物，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那不是一两个考察团在一个月、半个月之内就能完成的，根本做不到，你非得去那里待着。可是你在那里待着，怎么待着呢？当然要有人在那里，有意识地到那个地方去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这样的人才培养是当前最重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说在学科目录当中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来设立是最重要的一步。中国教育体系的一个特点是学科制，在这个体系下，只有用学科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把人才培养纳入学科体系里面去，否则，说要进行研究，需要这方面的人，怎么呼吁都没用，因为没有培养这种人才的手

段，在目前的学科体制下，只有通过学科目录体系才能培养人。所以就需要建设一个一级学科来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这样的人怎么培养？前面已经说过，学科目录、学科制的出现非常重要，推动了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快速发展。但它也有缺陷，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把每一个学科固定化，相互之间不往来、不交叉，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此，在 2020 年底，教育部对学科目录作了重大修改，就是设立一个新的门类，这个门类叫交叉学科。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非常正确，而且也很聪明，它既没有破坏原有的学科制体系，避免产生混乱；同时又弥补了缺陷，帮助打破学科壁垒，提供相互联通的平台。

学者们特别喜欢提到一个概念，叫“学科边界”，但设立交叉学科门类的目的就是打破边界。有人问，你们这个学科边界在哪里？我们的回答是：交叉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交叉。什么是交叉？交叉就是突破边界，实行知识交叉、方法交叉、学科交叉，否则怎么叫交叉呢？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突破性的科学发展，以及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新成果，都体现着学科的交叉，这已经是潮流了。恰恰因为突破了边界，才产生了最领先的科学成就以及重大学术成果，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因此如果有人问：人工智能的学科边界在哪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边界在哪里？是物理学、化学还是生物学？是公安学还是外交学？是农业生产还是环境保护？能回答吗？如何回答？同样道理，区域国别学作为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它的特点就是突破边界，从而产生新的知识，形成新的领域。国人在这个方面确实认识不够，跟不上时代步伐。

三、学科设置与研究方法

刘军：是的，非常有道理。钱老师您所提到的这样一种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以及学科边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需要理解交叉学科最大的特点是交叉，最大的潜力是突破边界。您曾提及，国别与区域研究至少由 10 个以上不同的传统学科构成，主要涵盖哪些学科？根据目前区域国别学一级学

科的顶层设计，接下来如何推进二级学科的设置与建设？在学科体系和组织机构建设上，如何协调可能涉及的这么多传统学科？

钱乘旦：“国别与区域研究至少由 10 个以上不同的传统学科构成”，这是对我以前说过的一句话的误解。我曾经在一些场合提到过，如果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那么按照现有的规定，各个学校若想设立这个学科，需要经过申请、评审、投票、审批等一系列程序，才能最终设立。我当时说的是：如果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不能任何单位想设就设，尤其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需要严格把关，需要有一些基本条件。在这些基本条件中，有一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这所学校至少已经有 10 个不同的一级学科，才能得到申请这个新学科资格。因为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现有学科的存在，怎么能形成交叉学科呢？也就是说，没有学科，谈何交叉？我当时说的是这个意思，并且以“10”这个数量来打比方，“已经有 10 个不同学科的学校可以去申请，只有 1 个学科就不能申请”，并不是说“10”是一个确定的标准。重要的是，交叉学科要以现有学科为基础、为支撑。

那么，如何推进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的设置与建设？首先，从学科规范方面来说，目前我们的学科目录规定，一级学科之下设置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下面还有若干个方向。这是在我们建立学科制的时候就形成的规矩，时至今日也依然有它的生命力，因此当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出现时，也没有理由要去破坏这个规矩。但是，这一规矩在几十年的学科建设实践中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设置，一度都需要经过非常繁杂的步骤才能够得到批准并最终设立。现在二级学科的设置是开放的，申请单位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二级学科已经不再是固定的；一级学科的设置也渐渐灵活，有一些公认的质量好的学校可以自设一级学科。这些开放与灵活也说明，在学科制建立以来的几十年实践当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学科制度的固化如果达到一定程度，不仅发挥不出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反过来还可能形成障碍。

如果申请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我认为，在开始的时候需要严格一些，否则有可能出现一哄而起的乱象，会偏离我们的初衷，甚至南辕北辙。所以，应该在起步时严格一些，在找到正确的方向并且运行平稳之后，再慢

慢松开。最初以严格的规范来使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做，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一种自律。正因为如此，新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设置是需要考虑的，要有一个基本的范围。关于二级学科怎么设置，现在已经有一些讨论。有的认为可以按照国家、地区去设置，例如设置欧洲研究、美国研究、日本研究这样的二级学科。但这种设置的弊病是难以全面涵盖所有国家和地区，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难道要设置上百个二级学科吗？就算设置几十个二级学科，也是不现实的。另外，也有人提出按照专题来设置二级学科，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案。

关于二级学科的合理设置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我认为，在思考如何为一个新学科设置二级学科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规范，例如，历史学必须要有史学史、史学理论，政治学也要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这是设置二级学科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基本方面。第二，综合考虑专题和国家、地区因素，例如有的二级学科以地区为参照，但是地区不能简单划分为中东、东欧、西欧、东亚、南亚……而是要考虑更大的地区单元；或者将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类型，发展中国家作为另外一个类型等等。二级学科的数量不宜过多，由此带来的杂乱无章最终会使学科建设失去统一的标准，这对学科发展是没有助益的。这些是我对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设置的一些初步想法。

刘军：您刚刚强调了学科建设当中学科理论方法和基本规范的重要性。那么，就区域国别学这一学科的交叉特征而言，除了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外，还有其他比较适宜的研究方法吗？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学科建设上，可以或者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哪些经验？

钱承旦：交叉学科的交叉特征，不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上，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互通互融的交叉特点。首先，我认为学科目录上的很多现有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运用到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中来，在一定时期的实践当中把它们融合起来，这也是交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另外，文科以外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是需要借用的。在我们最初的讨论当中已经提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积累，不仅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文”的方面的知识积累——需要的是全面而立体的知识积累。因此在一定意义

上，理工科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是需要借鉴的，但如何借鉴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去逐渐摸索。

我们刚才提到的现有学科，它们的边界非常明确，从而方法也变得非常固定。例如政治学研究，现在国际学术界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定量式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数据和事例去支撑模型，证明结论。而历史学是一种实证的学问，需要在史料、事实中总结出某些见解，或者得出某些结论。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交叉了，选择哪一种方法更好呢？也许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才是更好的。这就是我所强调的交叉不仅是内容的交叉、对象的交叉，也是方法的交叉。

四、北大的建设思路与实践

刘军：目前，我国已有 400 多个教育部设置的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还有相当数量已建多年的各校自设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推动全国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能否请您谈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运行模式、发展特色及培养宗旨？

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 2018 年正式成立的，但意识到应当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要远远早于 2018 年。北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事再三思考。学校领导很有前瞻性，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缺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关于如何弥补这一缺陷，却思考了很长时间，终于在 2018 年建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为北京大学提供一个平台，无论哪一个学科、哪一个院系，所有研究外国问题的的工作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相互沟通，打破原有的边界，完成一些有协调性的、互帮互助性质的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在建设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在建院之后的几年里，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项工作，培养人才。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缺乏人才的问题，北京大学的校领导意识到这方面的人才太少——并不是说北大没有研究外国问题的学术力量，是有的，而且相当丰厚。但是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院系，比如有的在外国语学院，有的在历史学系，有的在社会学系，有的在国际关系

学院，甚至公共卫生学院，虽然这个学院属于医科，但是有大量的研究国外公共卫生问题的人才存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也有许多研究全球性的气候、地区性的自然环境的人才。所以，研究外国问题的学术力量不仅在文科有，理工科也有，医科也有……他们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院系、不同的学科，结果各自关注的就是本学科的内容、本学科的课题，做不到对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进行全面了解、全面研究和全面认知。所以，我们搭建这个平台的第一步设想是，培养一种可以突破某一个学科限制、尽可能全面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才，这也是我们建院以后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学校专门拨了招生指标，每年按照这个指标招收以国别与区域研究为学科方向、学科定位的学生。

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要求对对象国有全面了解、全面认知，是不是“杂家”——什么都知道，但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处置不当，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我们的想法非常明确，我们培养的人，他们的学术定位不是学科，而是国家或地域。什么意思？比如说，政治学培养的人，他的学术定位是研究政治问题，如果研究外国，他研究外国政治问题，未见得专门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多数情况是研究普遍性的“政治问题”；他很可能鲜少甚至不会关心其他学科范畴内的问题，因为他只关心“政治问题”。政治学是这样，其他学科差不多也是这样。

可是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人才培养方案，其学术定位不是某个学科，而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所以在课程学习阶段要对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有尽可能多的全面了解，尽可能完备地积累各方面的知识——从天上到地下、从物质到精神，尽可能做到应知尽知。从这个角度说，他是“通才”，比如美国通、德国通、埃及通、印尼通、巴西通等等。

但仅有普遍性知识是不够的，一旦进入学术研究阶段，也就是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就需要有具体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他以后的专业，是学术方向。因此对这个学生来说需要有两个方向，第一是国别方向（或者地区方向），第二是专业方向（比如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这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培养的人，应当既是通才，又是专才。这个难度很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单学科的培养目标。但我们希望能

培养出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胜任或者去完成我们国家现在所需要甚至亟待有人去完成的那些工作和任务。而现在我们恰恰没有这方面的人。最后，这个学生还需要有外语能力，不仅是英语能力，现在英语已经普及了，而是要掌握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培养的人需要同时具备以上三项能力，显然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培养的难度也很大。这是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平台建设。刚才已经提到，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全校性的学术平台，为整个学校包括北大各个院系、各个学科研究外国问题的学者教师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一起工作的平台，共同从事学术研究的平台。学术研究是我们工作的重要方面，我们会举办很多学术活动，会出版学术专著，也有学术期刊，这些都是围绕着学术研究展开的具体工作。学术活动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是很重要的工作方面。

第三项工作，智库建设。按照当前的国家需要和学校的具体工作部署，我们会参与到智库工作中，尤其最近两三年的进展比较明显，成绩也很显著。与国内其他智库有所区别的是，我们的智库工作既对上、也对下，不仅向各级党政机关提供咨询报告，同时也向国民提供各种外国相关的知识，使他们了解域外的情况或正在发生的事，我们认为这也是智库工作。在智库对下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澎湃新闻》上有我们自己的专栏，建院4年来，已经有差不多600篇文章刊出，都是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文章。每篇文章大概5000字，针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现象、某一个国家的某一方面进行讨论和介绍，非常受欢迎，点击量很高，已经超过8000万次。这是智库建设工作。

另外，协助学校其他工作部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这些就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工作的一些基本方面和大致情况。

五、静观他国，立足社会

刘军：谢谢钱老师。虽然您说这是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工作的一些基本方面，但已经涵盖了许多重要内容。尤其是您提到，要培养“既是通才，

又是专才”的人，尽管难度很大，但这样的人才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发展而言的确非常重要。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具体实践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普遍认为美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做得好，但我认为欧洲起步要更早，并且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因为在欧洲对外扩张与殖民时期，美国还是一片美丽的大荒原。所以我想请问钱老师，在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过程中，有哪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供中国参考和学习？您是国际国内享有盛名的英国史研究专家，我们也常常推荐学生阅读钱老师的著作，包括日前给学生上课时讲到的《帝国斜阳》^①，也是钱老师翻译的。您在英国史的具体研究中，有怎样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心得？就具体研究实践而言，如何平衡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研究？对于做好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研究，您有怎样的建议？

钱乘旦：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史的确可以追溯到欧洲。因为当欧洲开始向海外扩张时，特别是在攫取了许多殖民地以后，欧洲人意识到，如果想要控制一个地方，必须了解这个地方——听得懂当地人说话，了解当地的物产、资源、历史、文化、思想……因此国别与区域研究最早是在欧洲展开的，尤其是英法等殖民大国。所以后来也就有了各种“学”的出现，如东方学、埃及学、亚述学、汉学等等，都是从欧洲流传出来的。

美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大国，20 世纪之前，美国人对域外的世界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西进运动，所以一战结束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建议和想法，回国后就被国会否定了——当时美国人对外面没有兴趣。兴趣的产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一个拥有世界霸权的国家，美国当然需要去了解整个世界，国别与区域研究也随之出现了——地区研究（Area Studies）这个概念就是在美国出现的。

从这个角度说，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大国的“奢侈品”。大国往往感到需要做，也往往有能力做，有迫切的需求。它又是大国的“必需品”，对于一个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而言，国别与区域研究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大国国际地位的学术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补课”。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欧洲、

^① [英]布赖恩·拉平著：《帝国斜阳》，钱乘旦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美国的起步都比我们早很多，日本的域外研究也十分成熟。明治维新以后，对外扩张的野心推动日本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发展。由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全球活动的增多，韩国对域外的关注度和研究水平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虽然印度、越南等国难以与前述国家相提并论，但是他们也都在做，在发展，这与他们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的变化有关。因此，学习与借鉴优秀的经验很重要，我们不仅要关注美国、欧洲，还要有更宽阔的视野，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其中甚至有与欧美完全不同的地方。

“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是欧洲、美国做得比较好的方面，许多学者不急功近利，不盲目追逐热点。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花时间，需要花精力，需要在对象国长住一段时间，了解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才能观察到真实的情况。我曾在一篇报告中看到，一位美国学者在湖南湘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活了6年，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同生活，我相信，以此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有可能会超过中国同行。但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也存在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有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像有色眼镜一样，会使研究人员的观察与判断蒙上滤镜而失真。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方面。

另外，国别与区域研究也是学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过程。不仅要从书本上学，还要到社会上学。有些学生到了国外，马上就泡在图书馆，而我们恰恰有一些评判的标准认为：一个学生到了一个国家哪儿也不去，就泡在图书馆，很用功，很好。这的确是用功。但是做好国别与区域研究也要到社会上去——要跟当地人聊天，跟他们交朋友，去游历，去观察——要“向社会学习”，这是毛主席强调过的一种学习方法。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是别人写出来的，在社会当中的学习——观感、体验、调研……有助于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知识。我们在培养人才时也需要注重这一方面，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刘军：谢谢钱老师。国别与区域研究所需要的“学习”，无论是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学科与个人而言，都是要紧和值得投入的。

最后，非常感谢您接受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编辑部的访谈！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have evolved continuously. The active advancement in new liberal arts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interdisciplinarity. Boundaries among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rigid thinking modes in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have been gradually broken,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to facilitate the new rou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interdisciplinary categories, which can make up for Chinese academics' long-term lack of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countries. If constructed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it needs not only sufficient existing discipline support, but also rethink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content and methods etc., so as to design a reasonable second-level discipline framework. Meanwhile,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should also consist of important specific content such as talent training, platform building, think tank building, and foreign exchanges. Besides, we should also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specific practice. We should also learn from both books and the society, including getting mature experie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conducting sufficient field work in relat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a result, we could cultivate academic teams which are "both generalists and specialists", and then create outstanding academic accomplishmen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cademic Development, New Liberal Arts, Interdisciplinarity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еформ и открытост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дисциплины первого уровня, постоянно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в Китае. Активное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овых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дало толчок развитию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наук. Границы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дисциплинами и твёрдое мышление в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й системе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рушались, что дал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ыграть каталитическую роль в процессе нового витка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имеют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наук, что восполняет многолетне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глубо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и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ми кругами знаний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региона, требу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со стороны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дисциплин, нуждается в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и связей объектов,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метод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 целью разработки разум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торичной дисциплин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острое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должно также охватывать такие важные конкретные темы, как подготовка талантов, создание платформ, создание мозговых центров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бменов.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сочетания теории и конкрет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и учиться из книг, а также из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опыт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зучать зрелый опы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дисциплин в других странах, а также набира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пыта и проводи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изучаемых стран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чтобы развивать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оллективы,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универсалами и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и», и делать выдающиеся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 новы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науки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当代俄罗斯研究的 核心问题、范式演变与发展趋势

赵可金*

【内容提要】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横跨两个大洲，在中国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俄罗斯研究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置于学科建设优先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明确界定欧亚地区特征和俄罗斯研究核心问题的基础上，系统评述国际学界关于俄罗斯研究的斯拉夫学范式、苏联学范式和转型学范式的贡献与不足，认为新时期中国俄罗斯研究应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学科建设和比较研究，丰富和加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为中国国家战略和域外知识体系的建设服务。

【关键词】俄罗斯研究范式 区域国别学 俄罗斯学 中国俄罗斯研究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020(20)

在中国国别区域研究中，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是欧亚地区战略大棋局上的重要棋手。与世界上很多文明古国面临的历史问题类似，中国自古以来就承受着来自北方蛮族的严峻挑战，从古代犬戎到秦汉时期的匈奴人和突厥人，从三国之后的五胡乱华到辽金夏，从蒙古大军逐鹿中原再到清王朝一统华夏，来自欧亚大陆的战略冲击一直是左右中华文明走向的重要力量。历史上，中国对于欧亚地区的了解也长期是中国域外知识体系建构的优先方向。从张骞出使西域到苏武北海牧羊，中国对西北强悍对手的研究长久居于相当紧要的学术地位，甚至来自匈奴、突厥、鲜卑、辽、金、夏、蒙古等众多族群部落的贤达来到中原，成为历朝历代中国域外知识建构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于西北周边地区的了解一直是最深入的。

*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外战略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全面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则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大批学生赴苏联留学，众多苏联援华专家在中国工作，一度导致中国对苏联的关注在中国国别区域研究中是最为强大的。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将重点转向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开始超越对苏联东欧的关注，成为中国国别区域研究中最强大的板块。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日益复杂，中国的国际战略从以美国为中心向运筹大国关系和经略、塑造周边并重转变，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俄罗斯和欧亚地区、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南北必经之路，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研究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机遇。当前，俄乌军事冲突引发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深刻冲击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必将推动俄罗斯研究步入新的阶段。本文在宏观考察欧亚地区特征和俄罗斯研究核心问题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俄罗斯研究的范式变化及其对中国俄罗斯研究的意义，为欧亚地区研究提供一个导论性的基础。

一、欧亚大棋局中的俄罗斯问题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俄罗斯已经存在了 1000 多年。俄罗斯起源于东欧草原上的东斯拉夫人，混血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共同祖先。历史上，兴起于第聂伯河两岸的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自公元 988 年开始，东正教（基督教的东部分支）从拜占庭帝国传入基辅罗斯，由此开始了拜占庭和斯拉夫文化的融合，并最终形成了占据未来 700 年时间的俄罗斯文化。

然而，俄罗斯最初只是一个族群，并非一个成熟的国家。俄罗斯成长为一个国家是从 988 年接受东正教洗礼开始的。自此之后，俄罗斯一直处于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之中：究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独特的斯拉夫文明的主体？究竟是声名远播的世界大国，还是偏安一隅的地区大国？这一

系列的认同斗争和思想矛盾，成为俄罗斯国家成长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对俄罗斯的研究一直是欧亚研究的重点，不仅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俄罗斯及其走向，俄罗斯自己也一直处于内生的犹豫和彷徨之中。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欧亚地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重要棋手。^②同时，俄罗斯位于欧洲经济圈、东亚经济圈和穆斯林经济圈的结合部，是连接东西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俄罗斯还是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杂糅混居的文明交汇处。所有这些特征决定了俄罗斯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民族，同俄罗斯打交道的国家也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因此，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们都不能忽视俄罗斯，它始终是影响当今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如何管理地缘战略旗手之间的纵横捭阖，如何推动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以及如何调处不同族群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欧亚地区研究的一条主线索。几千年来，欧亚地区的主题尽管有主次之别，但基本上没有脱离地缘战略、丝绸之路和文明交流的轨道。在这一主线索下，如何在幅员辽阔的国土和杂糅混居的多民族区情基础上实现俄罗斯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推进独具特色的大国外交，是贯穿俄罗斯国家发展始终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俄罗斯的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以及两者关系的问题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国土面积超过 1700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由 194 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为俄罗斯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78%。^③国家建设、民族建设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如何在这一庞大国土和众多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并进行有效治理，这是相当艰巨的任务。

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及其扩展，是俄罗斯的国家逻辑。俄罗斯人的祖先为东斯拉夫人罗斯部族。公元 15 世纪末，大公伊凡三世建立莫斯科大

① Halford John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in Halford John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Norton, 1962, p.261.

② 史学界沿用著名诗人吉卜林创作的一个术语，称这场角逐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参见[英]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③ 相关数据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俄罗斯国家概况”，2020年10月（最近更新时间）。

公国。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1721年彼得一世被元老院授予“全俄罗斯皇帝”的头衔，并建立俄罗斯帝国。到20世纪初，俄国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帝国，并一度建立了由15个权利平等的加盟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并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然而，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人就有一个观念的鸿沟：俄罗斯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构成独特的斯拉夫文明的主体？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认同欧洲化，但斯拉夫主义也一直在场，主张俄罗斯的斯拉夫传统在人种、历史和精神上都有别于西方。“西方化论”和“斯拉夫优越论”之间的紧张，贯穿着俄罗斯的千年历史，也构成了俄罗斯国家构建的主题。这一对立可能源自俄罗斯处于两种文明（欧洲与斯拉夫）边界的某种程度的模棱两可，但始终都是俄罗斯国家构建的一条核心逻辑。

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也是俄罗斯国家构建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俄罗斯是一个脱胎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社会，从早期的斯基泰人到来自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河谷的斯拉夫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来自西亚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来自亚洲的鞑靼人等混居在一起，境内有大大小小190多个民族，是世界上族群最为复杂的国家。长期以来，历代沙皇政府强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对俄罗斯族以外的其他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赋予俄罗斯族以特权，鼓吹俄罗斯族高人一等，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理应受它支配。而对其他的民族则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将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①沙皇政府将“俄罗斯民族”描绘成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级民族”，以此来凝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群体，但对其他民族则十分残酷，通过设置行省分割各少数民族，淡化各民族与俄罗斯人在族源、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努力拉拢和培养边疆民族精英分子，争取他们对帝国的政治忠诚和文化认同，使俄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②因此，列宁批判沙皇

① 赵磊：“国外如何促进民族关系和睦”，《学习时报》，2014年5月12日，第2版。

② 马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俄国是“各民族大监狱”。十月革命后，列宁纠正了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选择，不仅承认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芬兰的独立，而且尊重当时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建成独立国家的现实，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当政者削弱了民族自治，竭力在政治上支持俄罗斯联邦与物质上支持各民族共和国之间保持平衡。这一设计本身，在经济上不利于俄罗斯，在政治上则分割了各少数民族，结果导致俄罗斯成为反哺少数民族的“大奶牛”，少数民族地区也缺乏对俄罗斯和苏联的认同，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诱因。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继续推进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奉行公民自由和民族平等的原则，民族自治更多表现为民族文化自治，朝着培养公民社会、塑造“俄罗斯国族”的方向发展。毫无疑问，俄罗斯的民族建设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二）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大国外交范式问题

相比周围成熟的文明型国家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后来者，其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过程充满着对其他国家的借鉴和参考。伴随着俄罗斯国家的成长，如何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及如何以一个大国的角色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历代的俄罗斯领导人都具有一个探海梦想，从欧洲、中东、东亚三个方向寻找出海口，这是诸多沙皇政府的强烈愿望。为此，俄罗斯在历史上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吞并了欧亚多个国家和地区，于 18 世纪中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达到鼎盛。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时的俄罗斯参与欧洲抵抗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并成为战后神圣同盟的领导者，此后长期充当“欧洲宪兵”的角色。

然而，当俄罗斯走上世界舞台后，从沙俄时期到当代俄罗斯，自身究竟是大西洋主义国家，还是欧亚主义国家，是一直贯穿其对外交往的核心问题。相比之下，这一争论关注的主要是俄罗斯的利益，而非认同。在沙俄时期，尽管历代沙皇在对外扩张方面可谓四面出击，但是重心却在欧洲。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战略重点也是经营欧洲，尤其是冷战期间的苏联成为超级大国，通过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来同美国争霸，拉锯的焦点还是在欧洲。然而，关于国家的战略选择问题，在苏联内部也不是没有争论，主要分化为两派观点：**首先是大西洋主义派**。该派认为苏联的利益在西欧和北美，决定了苏联与美

国战略角逐的重心在欧洲。大西洋主义在冷战时期就已出现，有的人认为苏联最大的战略机遇在欧洲，另一些人则认为美国才是苏联最重要的目标。^①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一度认为欧洲和美国是一个整体，这一定位强调的是核武器、市场、财政资源和技术的重要性，它们总体上都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其次是欧亚主义派。**该派认为苏联的利益主要在欧亚地区，特别是在东欧和中亚，他们认为欧亚国家是俄罗斯在外交、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更为合适的伙伴。欧亚主义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由流亡海外的俄国思想家特鲁别茨科伊、阿列克谢耶夫、萨维茨基等人提出，经过几番分化逐步形成后来的古典欧亚主义思想。^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亲西方主义失败之后，基于地缘视角，主张民族包容性的欧亚主义重新受到重视，这股思潮被称为“新欧亚主义”（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被誉为“普京大脑”的俄罗斯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是现代欧亚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③他强调俄罗斯应该坚持欧亚国家的定位，反对西方，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倡导多极化世界，认为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存在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圈，俄罗斯应坚决同西方文明划清界限，保存俄罗斯自己的文化，继承本地区的社会生活传统，重新整合独联体区域，建立一个基于地缘文明传统上的新型欧亚国，并在此欧亚国的基础上构建包括印度、伊朗、土耳其在内的大欧亚。杜金构筑的思想体系，堪称一种弱化版本的斯拉夫主义，也是一种努力推动实现苏联王者归来的战略。亚历山大·杜金被土耳其媒体称为俄罗斯的“布热津斯基”，认为他对当前俄罗斯的国际战略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基本上是走西方价值、体制和政策的道路。普京继承了叶利钦的路线，也曾一度积极实行与西方缓和的政策。

^① 参见 Graham Smith, “The Masks of Proteus: Russia, Geopolitical Shift and the New Eurasian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9, Vol.24, No.4, pp.481-494.

^② 参见 Peter J. Katzenstein, Nicole Weygandt, “Mapping Eurasia in an Open World: How the Insularity of Russia’s Geopolitical and Civilizational Approaches Limits Its Foreign Polici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7, Vol.15, No.2, pp.428-442; Kateryna Levchuk, *Eurasianism: A Russian Monroe Doctrin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13.

^③ 参见 Alan Ingram, “Alexander Dugin: Geopolitics and Neo-Fascism in Post-Soviet Russia”, *Political Geography*, 2001, Vol.20, No.8, pp.1029-1051.

但是，由于西方一直拒绝完全接受俄罗斯，且不断推进北约东扩，普京转向走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道路，推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一体化进程。总之，困扰俄罗斯千年的问题，今天仍然持续影响着俄罗斯前进的脚步。

（三）当代欧亚地区的合作愿景及路径选择问题

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在历史上几经演变，其国家形态数度变化，先后经历了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大公国、鞑靼人冲击下的俄罗斯、学习西方的俄罗斯帝国、苏联时代的世界主义梦想和当代俄罗斯的欧亚转向等发展阶段。确切来说，欧亚地区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欧亚主义的产物。从地理区位上看，欧亚地区居于欧洲和亚洲的结合部，所涵盖的位于这一空间的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俄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曾先后建立起横跨欧亚地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该地区呈现出欧亚文化复杂交织的景观。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在的地区统称为欧亚地区，这一地区在冷战期间是被苏联凝聚在一起的国家集团。冷战结束后，原来强加给这些国家的同盟体系解除，基于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地区合作框架不断涌现，包括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具有同盟性质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新型合作伙伴基础上的上海合作组织等。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大力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经济合作、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试图重建由自身主导的欧亚战略安排。然而，相比欧洲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和东亚地区的内部合作深度，欧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缓慢，还需要克服众多障碍和难题。

二、俄罗斯研究的范式：从斯拉夫学到欧亚学

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俄罗斯是无法忽视的。然而，不仅在其他国家缺乏俄罗斯学，甚至在俄罗斯本土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学。对俄罗斯的研究（русистика）主要是指俄语语言和文学研究，中国大多数的俄语院系在学科专业上，也基本上使用“俄语语言文学”的名称。冷战期

间，美国曾经在区域研究中发展出了苏联学甚至克里姆林宫学，苏联解体后转变为俄罗斯研究或后苏联学。冷战后，俄罗斯本国才开始重视俄罗斯学，并在一些高校陆续建立起了俄罗斯学的相关学科方向和课程，比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建立了俄罗斯语言文化学院、圣彼得堡大学设有俄罗斯文学院，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俄罗斯区域学等学术培养项目在俄罗斯高校广泛开设，俄罗斯学有了很快发展。在中国，俄罗斯研究仍然按照不同领域和专业分散在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之中，没有形成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整体视野和立体研究。其实，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建立中国俄罗斯学的构想，认为俄罗斯学应该是针对俄罗斯进行的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路径等问题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俄罗斯学正处于快速成长之中。

（一）斯拉夫学范式：东方学及其遗产

对俄罗斯的研究首先来自俄语的教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一些早期英国探险家、商旅、外交人员开始前往俄罗斯，拉开了英国俄罗斯研究的序幕。在发展的过程中，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传统对俄罗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代表作是出生于新西兰的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的著名作品《俄罗斯人的俄罗斯》(*Russia of the Russians*)。^①作为一个标志，牛津大学在 1869 年首次开设了与俄罗斯研究相关的课程。随后，剑桥大学(1889 年)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1907 年，利物浦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家专门从事俄罗斯研究的俄罗斯研究院(School of Russian Studies)。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满足战争、外交和商业的需要，很多欧美大学陆续设立了俄语专业，并且大多集中于语言和文学，采取了古典学的学科形式。从 1914 年开始，英国大学普遍开设俄罗斯研究课程并开展俄语教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先后设立了俄罗斯研究高级讲师(Readership)职位，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诺丁汉大学设置了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教授职位(Professorship)，各大学

^① 参见 Harold Williams, *Russia of the Russians*,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 Sons, 1915.

开展俄罗斯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真正代表着俄罗斯研究学科化发展的标志,是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罗纳德·巴罗斯(Ronald Burrows)的支持下,伦敦大学学院在 1916 年仿照利物浦大学的模式建立的斯拉夫暨东欧学院(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在俄语语言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也拓展到了其他斯拉夫和东欧国家的语言,并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纳入其中,在服务英国战略需要的同时,也推动了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和英国类似,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基本上采取类似的模式。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知名俄苏问题专家蒂莫西·科尔顿(Timothy J. Colton)教授认为,美国对斯拉夫文化进行学术性研究是从 19 世纪 80 年代末和 20 世纪初开始的,从 1807 年美俄建交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俄罗斯研究总体上以斯拉夫学为主(侧重语言、文化和历史等领域),不少移居美国的俄罗斯裔学者对发展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①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俄罗斯研究的特征是斯拉夫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带有很强的东方学色彩,即主要从西方视角观察和理解斯拉夫地区,重点研究俄罗斯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传说、物质与精神文化等人文学科的内容,往往受到东西方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进而被纳入广泛的跨国界比较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美国主导的区域研究和冷战战略需要的影响,尽管早期偏重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的斯拉夫研究依然存在,比如“英国大学斯拉夫学者联合会”(BUAS)仍然关注对斯拉夫地区的语言、文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但重心开始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转移。“英国全国苏联东欧研究会”(NASEES)则更多地聚集起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后来,在以上两个组织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了“英国斯拉夫和东欧研究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EES),成为西方国家引领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研究的重要学术社团。迄今为止,关于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的人文科学研究,仍然是由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主导。

^① 转引自胡毓鼎:“美国的斯拉夫研究机构”,《苏联东欧问题》,1981 年第 2 期,第 58-59 页。

（二）苏联学范式：冷战及其遗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俄国和斯拉夫世界的研究重心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美国偏爱社会科学学科，上述领域被纳入区域研究的轨道，先后形成了苏联学和后苏联学的研究框架，侧重对苏联进行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文化、语言、文明等方面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苏联学研究，始自乔治·凯南 1947 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以“X”为笔名发表的“苏联行为之根源”一文。可以说，此文开启了冷战框架下的苏联学研究。^①为了服务冷战战略的推行，美国迫切需要关于苏联的情报和相关信息。在美国政府、军队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关于苏联和斯拉夫世界的教学和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极权主义理论和修正主义理论两种主导性的研究框架。

1. 极权主义理论（totalitarianism）。基于对二战的反思和冷战的需要，一些学者提出了极权主义的分析模式。这一模式将苏联与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视作同一类型，是一种垄断一切权力并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政治极权，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标签。极权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以及他的博士生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在 1951 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认为极权主义是 20 世纪的独有现象，其基本特征是意识形态与恐怖，其根源是反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帝国主义。^②卡尔·弗里德里希则从国家体制及政策运作方面，提出了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1）官方和单一的意识形态；（2）有大众支持的一党专制；（3）使用恐怖手段的警察力量；（4）对媒体的垄断性控制；（5）对武器的垄断性控制；（6）对经济的全面控制。^③布热津斯基在其博士论文《永远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中，将苏联制度定义为非理性

^① 参见 G.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1947, Vol.7, No.8, pp. 566-582.

^②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

^③ Carl J. Friedrich, “The Chan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talitarianism”, *II Politico*, 1968, Vol.33, No.1, pp.53-76.

冲动行为基础上的清洗，以此来达到其政治经济目标。^①不难看出，极权主义分析模式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简单的极权主义模型概括复杂的苏联制度特征，存在片面化、简单化和偏执化的问题，尽管一度具有较大影响，但也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尤其是一些注重经验和反理论的区域研究学者对极权主义的简单化倾向进行了猛烈批评。一些学者注意到，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表明苏联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集权主义理论忽视了苏联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因此很快就被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理论模式所取代。

2. 修正主义理论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革命也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的苏联学研究，加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催生了各种对极权主义理论的修正主义模型。越来越多的学者受到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等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从原来集中关注上层的“政权研究” (regime studies) 向中下层的“社会研究” (social studies) 转移。他们基于理性主义主导的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现代化等理论框架，认为现代化将把苏联拉向城市化、全球化的潮流，进而在政治上转型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于是，形形色色的“趋同理论”流行于世。这一潮流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阿列克斯·英克莱斯 (Alex Inkeles)、亚历山大·恰亚诺夫 (А. Чаянов) 和乔治·凯南 (George Kennan) 等一大批学者。其中，巴林顿·摩尔在 1954 年出版的《苏联：恐怖与进步》一书中认为，苏联政治与经济是传统文化、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以及极权主义三种因素交织的产物，不是铁板一块。^②阿列克斯·英克莱斯则认为，苏联政治可以用极权政治、工业化以及发展主义的模式来概括。^③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强调苏联研究必须多元化，不能仅考虑上层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④弗里德里克·巴格霍尔 (Frederick Barghoorn)

① Z.K. Brzezinski, *The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② J.B. Moore, *Terror and Progress, USSR: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③ A. Inkeles, R.A. Bauer,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④ D.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with "The Resumption of History in the New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在 1966 年出版的《苏联政治》一书，把阿尔蒙德的功能理论应用于苏联政治研究，几乎全面引进了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中的一系列理论框架，完全融入政治学的主流，开启了对苏联进行结构-功能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理论、多元模式、官僚政治理论等路径的研究。^①与极权主义理论偏重从西方意识形态视角和普遍主义出发相比，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理论研究开始关注以苏联为中心的研究，强调苏联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在方法论上也更加精细了。^②当然，所有这些研究仍然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且带有战略推进需要的现实考虑，这是冷战环境所决定的，冷战后惯性仍存，可谓根深蒂固。

（三）转型学范式：当代俄罗斯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俄罗斯研究都呈现出式微之态，原有的苏联学主要是服务于冷战的政治研究。^③苏联解体使得传统的苏联学失去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原来从事苏联和东欧研究的机构开始集中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关注政治经济转型研究，呈现出社会文化多样化发展的特征。^④冷战结束以来，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对俄罗斯的研究在“转型学”的旗帜之下，探索俄罗斯制度转型的路径、方向、方式和方法等问题。在转型研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还是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和多种制度模式的出现，这引起了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关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转型学研究。与早期转型研究多侧重某个单一学科不同，冷战后的转型学研究具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实证特征，尤其是对原苏联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体系中的组织、精英利益集团、大众价值观和期望之间关系的研究，推动了转型

① F.C. Barghoorn, *Politics in the USSR: A Country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② 参见 S. Fitzpatrick, “Revisionism in Sovie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007, Vol.46, No.4, pp.77-91.

③ D.C.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④ P. Kubicek,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Studies: Ten Years Later, Twenty Years Behind?”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0, Vol.33, No.3, pp.295-309; J. Gans-Morse, “Searching for Transitologists: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and the Myth of a Dominant Paradigm”, *Post-Soviet Affairs*, 2004, Vol.20, No.4, pp.320-349; K. Sonin, “The En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3, Vol.21, No.1, pp.1-10; G. Ekiert, “Three Generations of Research on Post Communist Politics-A Sketch”,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15, Vol.29, No.2, pp.323-337.

学 (transitology) 的发展。尽管这些研究不乏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激情, 但实践很快就证明, 转型国家并非如此简单, 转型学研究仍然处于争议之中, 围绕转型发生的条件、目标、内容、方式、动因、影响的研究, 仍然没有形成共识。

1. 发展经济学。发展研究是基于西方国家援助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国际发展框架展开的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一些发展经济学者开始把发展型体制的经验, 移植到苏联东欧中亚地区国家体制转型的实践中去, 呈现为“正统主义发展模式与结构主义发展模式”两种政策路径的争论, 并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对采取有效的稳定化政策的共识。然而, 发展研究对转型国家的探讨仍然围绕究竟采取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展开争论, 体现为“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主义、大爆炸与渐进主义或人性化发展的对立。同时, 除了关注波兰等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案例研究外,^①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转型也被用来镜鉴东欧地区的转型发展研究, 比如阿根廷^②和拉美地区^③, 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验。赫特纳批评转型研究“从极权到民主”“从计划到市场”的简单化倾向, 强调要采取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波兰尼社会转型理论的多学科视角, 将苏东地区转型纳入周边世界和全球化潮流中去认识。更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关注历史-比较视角, 将苏东转型与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主化的古典转型、二战后的新古典转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行比较研究, 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获得启发, 以解决面临的挑战, 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的“嵌入式自治”的理念, 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④进入 21 世纪以来, 转型学逐渐被作为贬义词, 苏东地区改革战略的设计被纳入发展

① D. Lipton, J. Sachs, S. Fischer, et al.,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0, pp.75-147.

② John Williamson, *The Progress of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③ L.C. Bresser-Pereira, J.M. Maravall, A. Przeworski, “Reformas Economicas em Democracias Recentes: uma Abordagem Social Democrata”, *Dados-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is*, 1993, Vol.36, No.2, pp.171-207.

④ P.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转型学不再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

2. 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长期以来，苏东地区的制度转型成为新自由学派的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流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结构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的话题。尤其是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直接以制度转型为研究对象，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定论，这些研究在熊彼特、纳尔逊和温特以及哈耶克的基础上，不再迷恋均衡框架下静态效率的提高，而是集中关注经济代理人、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对制度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在演化经济学看来，苏东地区的转型是组织和制度“隐性知识”的演化，需要重视改革进程中的试验和失误。当然，演化经济学对苏东地区转型的研究也遭到了主流经济理论的激烈批评：质疑其忽略了国家和制度的决定性影响，低估了制度改革的优先意义。此外，制度经济学对苏东地区转型也有大量研究，强调制度能力对转型的意义。

3. 经验主义政治学。对于苏东地区转型的研究，往往围绕经济转型及其效果来展开，而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策和国际问题方面，造成对于经济转型中的政治问题的研究相对不够深入。因此，不少学者倾向于将政治哲学分析、经验主义模式和规范理论，应用到对苏联东欧国家政治混乱局面的研究之中。普泽沃斯基推动了关于经济增长/福利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研究，集中分析了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关系问题。威廉姆森和哈格德则集中关注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先决政治条件，强调“华盛顿共识”的政治可行性。他们发现，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离不开牢固的政治基础、卓越的领导人和团结的经济学家团队。^①还有一些研究从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中，加强对转型的制度类型的研究，并且将公民社会、价值观念等因素纳入其中考虑。此外，大量关于苏东地区形势、政策变化和热点问题的追踪，尽管看上去热闹非凡，却没有什么理论贡献。

从苏联东欧传统政治、国有经济，转型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能否在这一地区稳固下来，仍然是一个未定之数。发展型国家的经验是否可以推广到原苏东地区，也是不确定的。

^① J. Williamson,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for Economic Re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63.

一些学者对国家和政治制度因素的重视表明，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有着传统固有的历史独特性，只有通过移情（empathy）或关注表意性因素，才能形成真正的理解。有些东西是无法学习的，这也是转型学在进入 21 世纪后受到冷落的一个原因。究竟哪一种经济模式和制度更适合苏东国家社会的现实情况，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将依旧是一个同时拥有市场经济和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缺乏诸如公民社会、法治和真正政治多元化等基本民主要素，这就决定了俄罗斯研究不能从单一视角出发，需要确立复合研究的新思路，走出一条俄罗斯研究的新路来。

三、中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趋势

最初，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也只是关注俄语语言、文学、文化、历史等人文领域，后来逐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综合性范畴，转变为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各领域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当然，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俄罗斯研究是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角度进行的探索，受中国文化、利益以及价值选择的影响。中国的俄罗斯研究最终会形成基于中国视角的俄罗斯观。

在世界大变局之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利益关系、安全关系、价值关系和世界秩序都在进行着复杂的调整，在宏观上对俄罗斯的生存、发展和国家特性，以及对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政策导向和对外关系都会产生重大变化。因此，新时期的俄罗斯研究需要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大环境中观察俄罗斯的战略走向，研究其内部文化价值观和外部利益关系的变化，对俄罗斯在整体意义上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透视。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人的行为选择和俄罗斯发展变化的规律。总体来看，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俄罗斯研究存在着以下若干发展趋势。

（一）俄罗斯研究的共同体化趋势

在中国，关于俄罗斯的研究是在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旗帜下开展的。学会主持的年会、期刊、各类研讨会以及吸引的众多会员，推动着中国

俄罗斯研究形成比较稳定的学术共同体。长期以来，俄罗斯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对于普遍理论的关注度并不高，主要原因或许是俄罗斯与众不同的国家特性，导致很多理论难以解释俄罗斯发生的大量案例。同时，俄罗斯研究存在着语言、文化、历史方面的门槛。如果不懂俄语、俄国文化和历史，即便获取了大量的社会数据也无法真正洞悉俄罗斯国家的“秘密”，很多从事俄罗斯研究的人包括俄罗斯的学界，不怎么重视普遍理论的构建，也不太重视 20 世纪中后期在欧美主流社会科学学界备受追捧的科学方法。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更愿意建立一个专业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成员需要掌握俄语，熟悉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体系。如果不是国家政策和特别的激励措施，他们普遍不愿意学习和掌握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方法、编程语言、理论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等。而且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学术共同体要比美国、欧洲、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共同体显得关系更加紧密、更加团结，不怎么形成重大的理论争鸣，而更执着于政策研究，这可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俄罗斯发展报告》中看出端倪。该报告的作者均为长期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科研人员，主要集中于总论、俄罗斯政治、俄罗斯经济、俄罗斯外交和中俄关系五部分，努力反映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领域及中俄关系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点，不是特别关注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展望未来，俄罗斯研究的这一学术共同体化还会持续进行下去，略有不同的是，俄罗斯学术界的专家也会融入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学术共同体，中国的俄罗斯研究会更多参考俄罗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进行必要的修正。

（二）俄罗斯研究的学科化趋势

俄罗斯研究是一个涵盖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但各学科发展不太平衡。由于俄语语言、文学、文化和俄罗斯民族历史对于俄罗斯研究的门槛地位，在学科化方面比较稳健的是俄语语言文化和俄国史的研究，不仅研究对象比较稳定，研究力量、研究标准和规范也比较明确，被学界视为一种对俄罗斯的静态研究，主要关注语言、文化、历史等一些本质性、特征性、模式性和规律性的维度并对其进行抽象和概括。俄罗斯研究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方面。俄罗斯研究在政治学中最为发达，大部

分的学者和杂志集中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大量关于俄罗斯的学术会议也更多由政治学和俄语学科出身的专家出席，这与政治学中已经形成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明确的二级学科有关。相比之下，经济学中专门从事俄罗斯经济研究的学者比较少，不仅因为相关学术期刊不被经济学主流学界所看重，而且因为俄罗斯的经济研究普遍被纳入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俄罗斯经济又不被认为是典型的形态。在 20 世纪 90 年代转型经济学衰落后，关于俄罗斯经济的研究已经沦为经济政策或经济形势的分析，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会认为自己是“俄罗斯研究专家”。与经济学类似，社会学家关注一些碎片化的问题，决定了社会学家很难在地区研究中找到共同语言，在社会学界不仅没有关于俄罗斯研究的学科方向，甚至也很少听到关于俄罗斯社会研究的声音，没有什么期刊在定期发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俄罗斯的文章。显然，俄罗斯研究已经完全被外国语言文学和政治学学科所主导，大多数俄罗斯研究者要么栖身于俄语语言文学学科的麾下，要么是政治学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舞台上的常客。

随着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创立，俄罗斯研究有可能在区域国别学框架下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方向前进，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在内，都将会为俄罗斯研究做出贡献。不过，俄罗斯研究学科化的前景，还取决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及其凸显度。与俄罗斯相关的各类重大事件，是推动俄罗斯学科进展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俄乌冲突，正在推动一次世界范围内俄罗斯与欧亚研究的新高潮。

（三）俄罗斯研究的比较化趋势

俄罗斯是一个脱胎于游牧文明且有着复杂历史经纬的国家。它置身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中间，是各大文明交融交汇、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和战略博弈纵横捭阖的连接点，在语言、族群、宗教、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与多个文明圈交织在一起，是比较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对俄罗斯进行比较研究，存在着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从纵向比较来看，可以对俄罗斯进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分析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景观，尤其是与欧洲文明、鞑靼人、穆斯林世界的复杂关系，比较俄罗斯整体和局部的变化及其根源，从而揭示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特点及规律。从横向比较

来看，俄罗斯作为跨越欧亚两洲的大国，其自身文化具有东西方融合的特点，通过开展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更好地认识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把握俄罗斯未来的发展规律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这也是俄罗斯研究需要加强的重点方向。

四、结论与思考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领土横跨欧亚两大洲，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力量。特别是作为欧洲经济圈和亚洲经济圈的结合部，俄罗斯与欧亚地区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无法绕开的重要通道，在中国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俄罗斯学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放到学科建设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

受制于大国博弈和内部复杂因素的影响，欧亚地区呈现出战略碎片化和不确定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随着美、俄、中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地区热点温度不减。一方面，俄罗斯在竭力巩固其欧亚地区大国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约也在积极推动东扩进程，欧亚地区短时间内还难以确立稳定的秩序。千百年来，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的战略走向动荡不定，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是欧洲早期推动的斯拉夫学，还是冷战期间美国推动的苏联学，以及冷战后如火如荼的转型学，都没有成功构建起理解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的成熟知识体系。因此，在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研究应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学科建设、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全面推进俄罗斯研究和欧亚地区研究，努力构建起中国特色的俄罗斯与欧亚地区知识体系，为服务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实践中，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受制于百年大变局和欧亚地区战略形势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在欧亚地区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需要从长计议，稳妥落实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国别区域研究与前期调研论证，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强大的知识保障。

【Abstract】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Eurasia, Russia spans two continents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China's overall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ussian stud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which should be placed in an prior direction for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clearl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rasian region and core issues of Russian studi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contributions and deficiencies of paradigms in Slavic studies, Soviet studies, and transitolog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It argues that China's Russian studies in the new era should advance academic community building,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enriching,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nd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and extra-territorial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Russian Studies Paradigm,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Russian Studies, Russian Studies in China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я расположена в самом сердце Евразии, на двух континентах, и играет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в общ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Кита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Китае 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важ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развития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е чётк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основных пробле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вклады и недостат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совет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и переходн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сделаны выводы о том, чт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е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должны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остроению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построению дисциплин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богащать и укреплять построе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а также

служить постро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Китая и системы экс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арадигм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осс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усистика, китай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苟利武)

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

汪诗明*

【内容提要】近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渐受重视，这为各区域与国别的“同等”研究创造了契机。纳入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如诸多研究机构的创建、学术交流机制的形成、研究议题的不断拓展、学术成果的与日俱增以及智库建设的稳步推进等。大洋洲研究如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跨学科研究、文本解读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陆地史观、海洋史观和全球史观相结合等就应受到重视，并且需要借鉴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路径。与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一样，大洋洲研究也面临诸如基础研究薄弱、母语研究阙如、国别研究不均衡、通识性研究人才缺乏等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区域与国别研究 大洋洲研究 跨学科研究 田野考察

【中图分类号】K107**【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040(22)

2012年，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与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了42个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国际教育培育基地。这些培育基地已成为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阵地。2017年，教育部又对395个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进行了备案登记并予以政策、资金及人员等方面的必要支持。与大洋洲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如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等入选。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中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对于像大洋洲那样在学术界处于较为边缘的区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 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与其他大洲研究相比，国内的大洋洲研究起步较晚。零星的或个体的研究也许不比其他大洲晚，但从形成一种学术氛围或有一支相当规模的专业研究队伍来衡量，大洋洲研究只能算是姗姗来迟。不仅如此，受到学术界话语体系的制约以及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大洋洲研究一直处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以及学术研究的边缘地位。比如，在传统学科背景下，大洋洲研究分散在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世界经济等学科。在这些一、二级学科中，欧美国家及相关主题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比如世界史学科注重与欧美史有关的学科或专业的设置。教学实践也是如此，即便是讲授广义的世界史，澳洲、大洋洲史往往只有三言二语；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学科主要演绎大国政治或大国关系，澳洲、大洋洲区域关系或区域政治很少被提及，如此等等。虽然早有人呼吁要注重学科的均衡发展以及摒弃学科领域的“欧美中心论”的窠臼，但学科体系一旦建立并成为一种遵循，相应的话语体系也就随之而立。话语体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可以在宏观层面决定学科或专业的发展大势，也能够在微观层面影响甚至左右一个人的研究偏好、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范式。从学科自身演进的规律来看，短时间内改变某一态势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寄望于传统学科体系的修正或“善意”来给澳洲、大洋洲研究以一席之地，是很不现实的。那么澳洲大洋洲研究的出路或机遇在哪里？

深入改革和进一步对外开放战略不仅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为学术界开展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问题导向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历史上很多大国不同的是，中国奉行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零和博弈和与邻为壑的冷战思维和狭隘观念；中国崇尚“和而不同”，主张世界多元化。^①在我国大力践行新外交理念和努力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与互惠合作格局下，大洋洲地区在我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和2018年先后两次访问了太平洋岛屿国家，并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屿国家领导人举行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6-429页。

了集体会晤，便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关系翻开新的一页的有力依凭。^①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一支，大洋洲国家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对接便利。正因为如此，新西兰于2017年3月与我国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安排备忘录，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个与中方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②2021年1月，中国与基里巴斯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这标志着中国同所有建交和复交的十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③上述例证表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诠释的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理念已被大洋洲地区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所接受，是契合太平洋岛国实际需要、受到岛国真诚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决不是封闭排他的“地缘政治工具”；是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合作项目，决不是“白象工程”“空头支票”；是促进岛国民生福祉的惠民“馅饼”，决不是所谓“债务陷阱”。^④2021年10月21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举行外长会。与会各方“积极评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抗疫合作。太平洋岛国赞赏中方疫情防控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感谢中国积极提供医疗物资、疫苗和资金支持”^⑤。“各方一致同意加强高层和各级别交往，扩大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各方同意建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定期会晤机制。”^⑥2022年1月14-15日，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剧烈喷发，突如其来的天灾给汤加王国造成沉重打击。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汤加国王图普六世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汤加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表示，“中汤是相互支持、守望相助的全面

① 汪诗明：“开放的区域主义与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第54-7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新西兰的关系”，2020年11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940/s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基里巴斯的关系”，2021年8月，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418/sbgx_681422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1年4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https://www.fmprc.gov.cn/ce/cesg/chn/fyrth/t1870410.htm>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联合声明”，2021年10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110/t20211021_962104823.shtml

⑥ 同上。

战略伙伴。中国愿为汤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汤加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①。随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多种渠道驰援汤加，除向汤加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外，还分多批向对方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包括饮用水、应急食品、发电机、水泵、电锯等，成为全球首先向汤方提供援助的国家。中国的及时援助不仅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担当，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毫无疑问，中国与太平洋国家关系不断发展的事实以及双方对今后扩大合作的期待，为国内学界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时机，而提供有关岛屿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政情商情、法律与制度、区域合作进展等方面的系统信息，对岛屿国家及其所属的大洋洲地区开展系统性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成为时代赋予我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一项使命。

一、大洋洲研究的进展

大洋洲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如果要确立一个时间节点，那么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是一个转折点。教育部一系列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政策与措施就是在这时期出台的，这并非一个时间上的巧合，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有着因果联系。在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阈之下，大洋洲区域与国别研究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一）研究机构的纷纷建立

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的研究已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可以说，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为了推动某个学科、某个领域研究的持续、稳定与健康发展。我国的大洋洲领域的研究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登台亮相了，^②但那个时候以及此后陆续建立的一批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都把澳大利亚文学或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建立了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就汤加火山爆发造成严重灾害向汤加国王图普六世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汤加首相索瓦莱尼致慰问电”，2022年1月19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01/t20220119_10630561.shtml

^② 1979年，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以大洋洲来命名的研究机构。2018年11月，该研究所正式更名为大洋洲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机构内设立大洋洲研究中心，这本身就具有标志意义。2012年5月，中山大学率先建立了国内高校第一家大洋洲研究中心，并有幸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同年9月，聊城大学的领导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地利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有效地调动和整合了校内学术资源，建立了国内第一家太平洋岛屿国家研究中心。这个集全校之力建立的研究中心自成立后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此后，北京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福建农林大学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南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也相继建立。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建立了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室，这是在党中央关怀下成立的研究室。^①虽然目前尚处在初创阶段，但凭借其高水平的学术平台以及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该研究室必将在我国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或大洋洲史研究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国家层面没有把区域国别研究提至议事日程并给予相关政策的扶持，那么这些以大洋洲、太平洋、太平洋岛国、南太平洋岛国来命名的区域研究中心就很难建立起来。^②

（二）学术交流的机制化

学术交流是推进学术水平提升的一条重要路径。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准如何，学术交流的规模、等级以及频次是重要的衡量参数。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前，大洋洲研究的学术会议只有两年一度的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国别学术研究论坛，且讨论的议题以文学为主。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后，大洋洲研究的学术交流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如一些大洋洲研究中心或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经常性地举办专题研讨会或学术工作坊，或不定期举办学术讲座等。而一年一度的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已给学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创建于2018年的学术论坛已成为大洋洲研究学术交流的一个机制性平台，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成功举办过三次。

① 时伟通：“太平洋与太平洋国家史研究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11月10日。

② 参见汪诗明：“大洋洲研究的新进展、不足及未来展望”，《学术界》，2020年第5期，第177页。

创建伊始,该学术论坛就被界定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背景之下。正因为如此,会议议题是开放的和包容的,既讨论大洋洲国别和区域历史的演进,又观照当代现实问题;既剖析政治、经济、外交和防务战略,又畅谈文学、文化和教育;既梳理学术史流变,也交流教学方面的经验与体会。^①如今参与论坛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学术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每次论坛的成果均被整理成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上。^②从一个鲜有人问津、无学术交流平台支撑的研究领域到一个稳定在七八十名专家和学者参加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大洋洲研究的学术交流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试探性之举到一个大家期待的制度性交流的转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三) 研究议题的拓展

传统学科背景下,大洋洲研究主要聚焦澳新两国,探讨的议题亦较为通常,比如英国在澳洲的殖民模式、澳洲原住民问题、澳大利亚华人华侨问题、“白澳政策”的兴废、澳美同盟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澳亚(洲)关系的变迁、新西兰幼儿与中小学教育、澳新两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毛利人文化及其复兴、澳新两国多元文化主义以及移民政策等。区域与国别视野下的大洋洲研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方面提倡用新视角、新方法、新资料对传统议题进行新的探讨,^③以期丰富和更新已有认知;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新领域、新议题的发掘,像环境史、海洋史、科社史^④等以前很少进入研究视野的新领域

① 2020年11月13-15日,第三届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在中山大学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我国的大洋洲研究:创新与展望”,下设八个议题:新冠疫情对大洋洲国家的影响;中国与大洋洲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大洋洲区域与国别的历史与文化;大洋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大洋洲语言和文学;大洋洲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问题;大洋洲教学方法论;大洋洲的其他问题。

② 李永杰、卢颖琳:“第三届大洋洲研究高层论坛暨《大洋洲蓝皮书:大洋洲发展报告2019-2020》研讨会在中大举行”,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11月20日。

③ 参见费晟:“1881年悉尼天花疫情下的排华运动”,《世界历史》,2020年第5期,第16-32页;吕桂霞:“斐济的印度移民:历史演变及影响”,《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第33-44页;徐桑奕:“英帝国与殖民地自由贸易权问题——以初创期新南威尔士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21年第6期,第40-53页。

④ 参见乔瑜:“物种的跨洋传播与生态经验互动——桉树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890-192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33-144页;费晟:“海洋网络与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的生计变化——基于瓦努阿图案例的研究”,《海洋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32-49页;赵婷:“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与发展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第88-95页。

或新议题，现在却成了大洋洲研究的新宠。研究议题的拓展还体现在太平洋岛屿国家受到了大洋洲学界的重视。这个在传统学科背景下几无存在感的区域，现在理所应当地成了大洋洲研究框架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的议题也从对一般时政动态的评论转向时政问题分析与基础研究并重。^①

（四）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

学术成果的多寡是考察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受到学界关注的重要参数之一。十多年前，大洋洲领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有影响的成果更是难得一见。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人员不多，专家则更少；二是多数刊物以没有相关栏目设置、论题关注度不高、二次引用率低等为由，对大洋洲领域的研究成果多是婉拒。“投稿无门”或“十投九拒”成了这一领域从业者的共同体验。

随着区域国别研究渐成气候，国内的刊物生态开始出现悄然变化。以前将这一领域的稿件一概拒之门外的一些学术期刊，也渐渐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一些较早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高校也乘势而为，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园地，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的《区域国别研究学刊》^②、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区域与全球发展》、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聊城大学主办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等。这些刊物多为学术集刊，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显著的专业、学科特色。虽然目前它们在学术影响力上尚无法与传统核心期刊相提并论，但由于其显著的专业性以及较高的学术水准而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除此之外，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在坚持其传统的办刊原则和办刊特色的前提下，与时俱进，把推进适应时代需求的学术研究作为其使命之一，如《俄罗斯研究》近年来就新增了“国别与区域研究”专栏，每年刊发一定数量的和国别与区域研究有关的专题论文，这些成果涉及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和模式、与具体国别、地区有关的诸多问题，等等，收到了很好的学术反响。

^① 参见陈晓晨、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陈晓晨研究员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6-160页；赵少峰、于镭：“太平洋岛国酋长制的演化及其走向简论”，《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第11-20页。

^② 从2021年起，该刊易名为《北大区域国别研究》。

传统刊物的逐步开放以及新刊物的接续问世，给大洋洲研究成果的发表带来了福音，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如果要对大洋洲研究成果进行学术梳理的话，十年前从事这项工作并不困难，因为需要搜索的成果数量有限，而且对成果的分类梳理并不复杂；五年前从事这项工作就得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需要评述的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学术水准高；现在要对过去一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话，这项工作做起来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

（五）智库工作的稳步推进

2015年1月，教育部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从国家层面对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进行顶层设计，重申“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要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要任务，以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扎实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提高研究质量，着力推进成果利用，努力建成具有专业优势和重要影响的研究中心”^①。该《办法》为国别和区域研究规划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其他大洲区域与国别研究相比，大洋洲区域与国别的基础研究方面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但在对接社会、提供政策建议等智库工作方面却显示出后发优势，且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大洋洲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兴起和发展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之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二是得益于大洋洲相关研究机构的准确定位。比如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初创之时就确立了如下目标：“通过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中国人民与太平洋岛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和经贸往来。”该中心成立十年来，已承担了多项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的专项研究课题，并与中联部、外交部、商务部的研究部门建立了业务往来，适时提供具有参鉴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报告。三是有众多海外生活、工作和求学经历人士的加盟。比如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秘书长的牛丽女士，曾于2001-2008年在汤加工作。在她以及其他同事的多方努力下，海颐智库(Haiyi

^① “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2015年1月26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501/t20150126_189316.html

Institute) 于2018年正式成立。^①该智库致力于全球问题、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的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国际合作的智力服务。为发挥教育科研平台和智库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双重作用,自2020年7月30日起,海颐智库推出《海颐讲坛》系列直播讲座。2021年,《海颐讲坛》设立了“RCEP 合作系列”和“太平洋岛国系列”^②两个系列主题讲座。从7月30日首播至今,已经播送了35期,每月定时两期,受到了社会、学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③

二、大洋洲研究的路径探索

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试图去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或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观点、新视角,以及揭示事物内在运行规律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中不断观察、思考和试验的经验总结。这里就涉及哲学领域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议题有不同的本体论范畴,而不同的研究个体又决定了对本体论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果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出现不同的研究方法。既然大洋洲研究被纳入区域与国别研究范畴,那么其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就必然刻上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印记。

(一) 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

区域与国别研究注重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整体性或综合性研究,与特定区域或国家相关的政治、经济、司法、外交、防务、文化与文学、教育、环境、医疗卫生等问题无不在研讨之列。按照传统学科的分类,这些领域或方面的研究各有所属。这就是说,单一学科或专业是无力承担区域与国别研究

① 该智库的发起单位是北京海颐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共建单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太平洋岛国战略研究中心和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

② “太平洋岛国系列”讲座有“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增进了解,巩固和发展中汤友好关系”、“践行‘一带一路’,实现海外业务高质量增长”、“萨摩亚援教”、“太平洋岛国概述”、“萨摩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太平洋岛国渔业合作探析”、“后冷战时代斐济和南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等。

③ 北京外国语大学太平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秘书长、海颐智库理事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牛丽女士提供了上述材料。在此谨表谢忱。

之使命的。^①

前面述及，区域与国别研究探讨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区域或国家，而非区域或国家的某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相互之间难以切割，甚至连理同枝。这就预设了这样的认知框架：观察和认识某个区域或某个国家，不能局限于单个角度或维度。多角度或多维度的嵌入，不仅能够丰富人们的认知，还可以纠正某些片面的认识，而那些常常被忽视的角度或方面往往被证明是独特而有效的认知路径。比如说，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政治、经济、安全与防务是三个最常见的分析视角，文学或文化很少被考虑进去。人们总认为文学或文化对一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互不相干。其实不然。“在某一个时候，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文化这时就成为身份的来源，而且火药味十足，……”^②爱德华·W.萨义德进而认为，“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小说可以说是英国社会中唯一的美学形式，并获得了主要表现者的显著地位。由于小说在‘英国事务’问题上占有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认为它也参与了英国的海外帝国”；“英国贸易与帝国扩张的特殊结合是多么地依赖于例如教育、新闻、异族通婚、阶级等文化和社会的因素”^③。萨义德考察的是处在大规模对外扩张时期的英国。这一时期，英国的小说或其他文化载体在刻意渲染本民族优等文化基因与特质方面极尽浮夸之能事，而对异族及其文化则无所不用其极地予以贬抑和丑化，对殖民扩张过程中的种种非人道行为通常保持缄默或有意掩饰，甚至蓄意否认，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英国海外殖民与扩张的帮凶。而在当下，欧美国家在开展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对外战略时，文化因素又何尝不占据一个重要位置呢？

在传统学科背景下，文学或文化注重其本色研究；而在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野下，文学或文化研究就应被置于一个广泛的人文与社会语境之下，这是

^① 参见钱乘旦、胡莉：“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野下的‘欧洲研究’——关于欧洲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8-150页。

^②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页。

^③ 同上，第98页。

我们考察一个国家、民族、族群属性的重要符号或重要路径。要实现文学或文化研究的上述功能，跨学科研究就是一条变通之途。比如，在对大洋洲区域或国家的历史、对外关系进行研究时，文化甚至文学领域就不能离开人们的研究视线，反之亦然。

（二）文本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

大洋洲地区的研究议题非常广泛，不仅指涉人文学科，也关乎社会学科，甚至与其他学科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人文学科倚重文本捡拾与释读，社会学科推崇调查研究（包括访谈），即田野考察，其他学科也有其独到之法。它们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都有用武之地，可以相互借重，互为补位，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

首先，文本研究是最通用的研究手段。前人或他人留下的文本，包括通过田野考察得来的文本有其独到的参考价值，因为通常情况下，“任何著作者都以破旧立新为己任，都希望有所建树，并力图做到这一点”^①。在学术研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阈和旨趣，一部成功的作品往往是研究者非凡的人生之路和学术之路的真实写照。通过阅读文献作品，可与作者在文本中对话，了解其研究理路，感知文本的真实意义，藉此开阔学术视野，提升研究能力；也可以通过咀嚼现有文本，发现作者没有发现或解读不深的问题，甚至匡正某些舛误。这就是文本研究的魅力与价值所在。

囿于一些主客观条件，国内的区域与国别研究通常依赖于文本资料，属于吕万和所称的“遥研”^②。研究者通过对文献本义的准确研读与合理演绎，能够成就一部载誉之作。这在学术史上不乏其例。鲁思·本尼迪克特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她对日本、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遥研”，成就了经典著作——《菊与刀》。就国内大洋洲学界来说，尽管有些学者在实地考察与调研方面有着比较便捷的通道，但文献解读与分析仍是学者们乐此不疲的选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本资料无论其研究价值有多高，其“间接”资料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即资料的使用者是借用他人的“眼睛”来观察世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页。

②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本），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页。

界的；依赖“间接”资料可以得出与“直接”资料相同或相似的结论，但二者在情境、意境以及说服力方面难划等号。

其次，田野调查具有独特价值。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的伴侣。“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相应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当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将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必须大力进行观察并注意细节，这些，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常常是不大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乃是最关键的，并且也知道如何进行挖掘。”^①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门包括多学科学问，需要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知识供给。在观察与研究人类早期阶段的演化以及特定时期的社会习俗与文化时，人类学家具有其他领域的专家所不具有的专业技能和分析视角。而在民族学者那里，“原始文明所提供的各种事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们非常简单。因此，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内，民族学者的考察往往会给人们带来货真价实的启发，使有关人类制度的研究得到更新”^②。

大洋洲研究涉及很多岛屿国家，有些岛屿上的族群长期与外界隔绝或少有接触，处在比较低级的发展阶段，其族群架构、生活习惯以及文化传统几乎经年不变、代代相袭。了解这些族群的生活方式，感受其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仅仅靠研读他人留下的文献资料是不够的，需要走近原住民社会，亲身体验那里的生活，感受原住民社会的生活脉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观察和研究一个问题，需要对所收集到的诸多信息进行分类和筛选。这个过程需要研究者自身具备较强的识别、分析和判断能力。田野调查虽然能够取得很多第一手或有价值的材料，但材料本身不会说话，需要研究者替它说话。选择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希望达到何种目的，终究取决于研究者的心境、态度、能力和动机。

（三）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任何一个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环境中，任何人都是在一个给定的时

①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本），第10页。

②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空环境中生存和从事某种社会活动的，因此，对任何事物或人物的认知与评价必须且只能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进行。

从时间维度来看，时间可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对应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拟研究的对象应置于什么时段来考察，取决于被研究对象的性质或属性以及研究者的主观设想。有些研究对象必须放在长时段来考察；有些适合中时段来检视；而有些却只能置于特定的时段即短时段来审视。三个时段的视角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开创者也是集大成者，是年鉴学派第二代掌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他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时段的历史概念，即历史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所谓长时段的历史指的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这种历史几乎是“置身于时间之外的与无生命物打交道的历史”。而“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人们或许会乐意称之为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如果这个词语没有脱离其完整的含义”。这就是中时段的历史。还有另一种时段的历史，即属于“传统历史的部分，换言之，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保尔·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撰写的事件史。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①当我们用三个时段的历史观去审视大洋洲历史时，一幅清晰且立体感很强的历史画面便跃然纸上。大洋洲的地质构造及其变迁、大洋洲的生态系统的形成及其独特性、人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关系就宜在长时段下去认识，这是大洋洲史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面，读者也可从中窥见目前世界上环境保护相对较好当然也是最脆弱的一个大洲在时间的长河里的衍变轨迹。^②在人类日常居住的大洲中，大洋洲是两种文明或文化对比最显著、碰撞最激烈的区域，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及其影响，采用中时段历史分析视角很可能会让我们蹙紧的眉头变得舒展起来。至于个人史或事件史，这在大洋洲地区是不占显著地位的。该地区相当缓慢的历史演进节奏、政治环境的独特性以及远离世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第8-9页。

② 参见[美]唐纳德·B.弗里曼：《太平洋史》，王成至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

界政治与经济中心，使得短时段历史缺乏公众关注的视点或焦点。

另一个就是空间维度。空间维度的解释有较大的自由度。比如说，如果把大洋洲纳入空间层面来认知的话，全球范围无疑就是宏观层面，亚太地区属于中观层面，大洋洲就是微观层面；如果把大洋洲区域本身视为一个宏观层面的话，那么中观层面就是三大文化圈，即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微观层面就是个体岛国；如果把个体岛国视为一个宏观层面的话，那么各岛屿（指有人居住的）或群岛就是中观层面，岛屿社区就是微观层面。不同空间维度下的观察能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立体、多面和真实的大洋洲，一个成为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又处于边缘地位的大洋洲。

所以，无论是时间上的“三观”还是空间维度上的“三观”，它们都是考察和分析大洋洲相关问题的独特视角；在呈现大洋洲具体样态方面，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功能，互不取代，且相得益彰。

（四）陆地史观、海洋史观与全球史观相结合

就世界文明的起源来看，陆地文明似乎比海洋文明要早得多；从世界文明的变迁来看，近代以前，陆地文明或农业文明一直主导着人类文明变迁的节奏和轨迹。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使得海洋成为人类活动的一个新的经常性场域，而且发现了“新大陆”，甚至连传说中的“南方大陆”也尽收眼底。至此，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地理世界或人类世界就呈现在世人面前了。

海洋史是考察和认识大洋洲的一个重要起点，海洋史观则是分析大洋洲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视角。当以这种视角来观察大洋洲时，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不同世界的遭遇、碰撞和冲突，以及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极度不平等。正如汤因比所揭批的那样，“帝国主义征服者的另一种倾向是，把当地居民划归为‘土著’（natives）——这个词本来是没有道德含义的，但现在一说起来几乎只能引起人们最轻蔑的联想。‘优胜者’把其他社会的成员贬低为‘土著’，也就断定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微不足道，因而否定他们的人格”；“把异族居民看作‘土著’，也就很容易把他们说成低等种族，断定他们绝对无可争议的低劣。这是‘优胜者’给‘劣败者’打上的最坏的烙印”。^①从

^①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

这个意义上说,大洋洲进入人类的认知视阈是以这种屈辱的身份开始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全球史观则强调把研究对象置于建立了普遍联系的“世界”之中,这使得长期处于依附或被统治地位的大洋洲成为西方殖民霸权的一种注脚。由此可见,海洋史观下的殖民语境让大洋洲进入西方世界的话语体系之中,只不过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大洋洲是一个被征服的对象,处在一个边缘化的地位。此外,全球化环境下的大洋洲的发展显得极不平衡,澳新入列发达国家,而广大的太平洋岛国依旧积贫积弱,成为全球化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

当海洋史观和全球史观在描绘大洋洲历史演进画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得到肯定的时候,我们无意忽视或低估陆地史观的功能。这是因为,在被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之前,大洋洲地区早已有人类居住了,而且在此繁衍栖息了几万年之久甚至更长的时间;^①原住民在被殖民前就已经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并且构建了层级分明、管理有序的族群社会,过着与土地为伍、与海洋作伴的宁静生活。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较为清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因此,这里并不是西方殖民强盗所臆想或杜撰的无主之地。^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运用陆地史观来剖析新航路开辟前的欧洲社会时,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来诠释大洋洲的悠久历史以及原住民当下的生存状态。

（五）借鉴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之径

由于区域与国别间的自然属性即物理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其他属性有霄壤之别,所以不同的区域与国家所呈现的样貌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人们对其认知的需求和期待也不在一个层面。由于发达国家在传统学科背景下受到了较多和较为广泛的关注,所以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公众,对其进一步认知的需求和期待就不如较少受到关注甚至被忽视的欠发达或很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这正是新时期倡导加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动因之

^① M. Clark, *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p.10-12; P. Clark, *Where the Ancestors Walked: Australia as an Aboriginal Landscape*, Sydney: Allen & Unwin, 2003, pp.39-40.

^② 参见汪诗明:“‘马宝裁定’与澳大利亚土著土地权立法”,《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160-176页;“殖民前的澳洲并非‘无主地’”,《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第126-134页;“新西兰南岛属‘无主地’吗?”,《学海》,2017年第3期,第197-202页。

一。欠发达或很不发达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中往往经历过一些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如党派的兴起与重组、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加剧、民粹主义的兴起、族群意识的膨胀、由地缘政治而引发的国外干预，等等。这些通常被纳入国家或社会“转型”研究之范畴。“转型”研究之所以受到国内学界的青睐，是因为苏东剧变后一些新独立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防务安全等领域的重要转型，如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对于一个脱离旧制的国家或民族来说，寻求转型似乎是一个前进中的选择，但这委实是一个相当艰辛且漫长的过程，有时会伴随挫折或失败。这就是当下学界仍用“转型”理论或视角去考察中亚和东欧国家成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或原因。^①“转型”研究是不是只适用于中亚和东欧国家？梳理一下“转型”理论就会发现，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大洋洲区域或国家问题研究。因为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非殖民化运动前都是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托管地^②或附属地；取得民族独立或自治后，它们都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转型，而且在转型进程中，也会遇到一些与中亚和东欧国家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比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碰撞、族群自治与分离主义的兴起等。

研究方法是在问题与答案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研究方法本身不是捷径，也非答案，不能把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教条化；另一方面，研究某个问题，也许不只有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存在两种或三种方法和路径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殊途同归”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常见现象。

^① 参见强舸、叶尔郎·马季耶夫：“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的组织体系和发展趋势”，《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2期；周明：“哈萨克斯坦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参与及限度——结构制约与精英偏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3期；艾达尔·阿姆列巴耶夫：“当代国际局势与上合组织的角色变化——哈萨克斯坦的视角”，《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4期；纳扎尔拜·叶尔肯：“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王思羽：“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2000-2019年）”，《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1期；毕洪业、江博：“寡头干政何时了？——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困境及根源”，《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王志、王梅：“国家身份、国内政治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地区一体化政策探析”，《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苟利武：“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社会危机——独立30年后的乌克兰社会”，《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李超：“论国际托管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44-49页。

三、大洋洲研究的不足与挑战

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学术研究日渐走向深入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大洋洲研究中的不足或存在的问题就变得明显起来，并对大洋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一）基础研究薄弱

任何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创新原动力都来自于基础研究，这是学界的共识。基础研究的不足几乎是所有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共性问题。大洋洲研究之所以长期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是基础研究差强人意。

什么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不尽一致，^①但多数学者还是肯定了历史知识或历史研究的基础地位。在区域与国别研究语境之下，参与大洋洲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多，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但是，伴随而来的却是同质化研究现象的出现。当然，这绝不只是大洋洲研究领域存在的现象。大洋洲地区有20多个主权国家、自治领或托管地，学界对它们的认知还处在初步阶段，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究。然而，为何出现多人对同一问题展开几乎大同小异的研究？抛开其他原因不表，仅从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来看，基础研究薄弱或怯于基础研究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原因。基础研究不足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的思维空间、想像力和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进而有意无意地取易舍难或“炒冷饭。”

（二）母语研究缺乏

语言是观察世界的窗口。所谓母语研究，就是使用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或文字材料来从事知识建构或学理阐发。大洋洲地区岛屿国家众多，语言或方言五花八门。因此，若想获得第一手材料，就必须知晓当地的语言。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在这方面似乎很有心得。他于1914年获得了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做研究的机会，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在一个叫特罗布里恩（Trobriand）的小岛上，他与岛民朝夕相处，学会了土著语言，见识了各种风俗，写了好

^① 参见王辑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编委会编：《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页。

几本意味隽永的著作，如《巴洛马：特罗布里恩岛的亡灵》（*Baloma: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1916）、《野蛮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1926）、《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1929）、《珊瑚园艺与巫术》（*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1935）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1922）。^①试想一下：如果马林诺夫斯基不去特罗布里恩岛潜心学习当地原住民语言，哪来的勇气、自信来撰写这些反映岛民生活点滴的著作？哪来的知识和智慧就岛民日常生活、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一些独特现象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最广泛的方式或工具。^②但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交流了，它需要对对象国开展田野考察、系统认知和深度探究。这样一来，对所研究的对象国的母语甚至方言的掌握就显得必不可少。这也是目前区域与国别研究所遇到的瓶颈或难题之一。就大洋洲来说，英国在这里长达二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所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英语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言。然而，当地的族群语言众多，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场合，地方语言交流比英语交流更为便捷。学习和掌握土著语言不仅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的一把钥匙，而且是将其历史与现实建立内在联系的密码。国内的一些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已经意识到母语学习之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意义，故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举措予以补救。比如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就开设了很多小语种课程，其中有些就与大洋洲研究有关，如皮金语。^③但是，一门语言从学习、到基本掌握再到娴熟运用是有一个过程的。这就是目前大洋洲研究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

① 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群岛土著人之事业及冒险活动的报告》，弓秀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序言第7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③ 皮金语（Pidgin）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语言之一，又叫皮钦语、新美拉尼西亚语等。这是一种语法简单的语言，用于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流。皮金语词汇有限，有些词汇来源于当地语言，属于混合语言，但并不是土著语言。

（三）国别研究不平衡

从研究机构的数量来看，目前国内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有近40家，数量不可谓不多，而新西兰研究中心、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或大洋洲研究中心都只是个位数，迄今为止尚无一个以某个岛国名字来命名的研究机构。大洋洲地区国别研究的不平衡现象由此可见一斑。从专业研究人员的数量来看，绝大多数是澳研学者，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方面的研究人员数量明显偏少。从研究成果来看，大洋洲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澳研方面。

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国别研究是不平衡的，这里既有客观上国际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又有人们主观认识的因素。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修正国别研究失衡的局面，使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更加全面、也更加切合实际，其根本旨归是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通识性研究人才缺乏

传统学科背景下，区域与国别研究也是存在的，但那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强调学科与专业的专有属性。受制于学科与专业的指挥棒，学者们的阵营划分也是泾渭分明：要么以历史研究自居，要么把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很少有二者兼顾的。这种研究范式需要的是相应领域的专业性人才，因此而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研究历史的对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不太擅长或不感兴趣，反之亦然。这种对被研究对象国的历史与现状的条块分割，既不利于人们对对象国的整体认知，也不利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进步，更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当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就是要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研究模式下的块状研究格局，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通识性人才。就大洋洲研究来说，这里所讲的“通识性”人才有三个层面的含义：（1）研究者不仅要通晓大洋洲的历史，还要了解其现状；（2）不仅要研究澳大利亚，还要关注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3）不仅能够成就高水平的学术论著，还能撰写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作品。

四、结束语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我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支持与参与。这一倡议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结构以及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的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上述战略目标,需要我们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而这种合作须建立在对有关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法律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国家战略的了解之上,否则不仅不会出现合作机遇,反而会造成相互误解、产业合作失配等不该出现的局面。因此,相互了解是合作的前提或基础。^②这是我们在从事区域与国别研究时必须具有的政治高度和时代意识。

无论是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一个政治地理单元,还是作为历史学层面的一个区域研究单元,大洋洲都是一个较为“独立”或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然而,传统的学科分类以及学术界重视欧美世界研究而轻视其他区域研究,使得大洋洲研究处在一个可有可无的状态。区域与国别研究受到重视,尤其是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客观上为大洋洲研究提供了一个准确把握自身定位、迎头赶上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有利时机。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方向或一个研究议题,大洋洲研究都面临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与挑战。这些问题与挑战既有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与挑战?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门类,这些问题与挑战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可以视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制定相应的学术研究规范予以正确引导。相信在国家大力提倡和鼓励创新精神的激励下,在国内学术生态不断向好的态势下,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一定会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进取,逐步构建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成果面世。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86页。

② 参见冯绍雷、李中海、张昕等:“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创新”,《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has increasingly gained attention, which has creat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ies of all areas “on equal basis”. The Oceania studies, as a part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has achieved manifold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y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formation of academic exchange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o more and more research topic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steady progress of think-tanks. For the Oceania studies to form its own features and to make its own mark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 it is imperative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a combination of text interpretation and field work, a combination of macro-, meso- and micro-level researches,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concept of land, ocean, and the globe as a whole. Meanwhile, it has to learn from other area studies in its methodology. Just like other area studies, Oceania studies also fac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weaknesses in fundamental researches, lack of the ability in native languages, imbalance of national studies and shortage in generalists.

【 Key Words 】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Oceania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Work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сё больше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 и странов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что создало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азличных регионов и стра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кеании, которые включены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и странов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остигли прогресса во многих аспектах, таких как создание мног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механизмо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обмена, постоянное расширение те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астущее число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и неуклон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х центров.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кеан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свои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и заняли место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давать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сочетанию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текстов и

поле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акро-, мезо- и микро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очетанию истории земли, истории морей и глоб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а такж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извлечь уроки из друг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стран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ак и друг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кеании также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 таки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и вызовами, как слабые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тсутств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родном языке, не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е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общи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кеани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е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乌冲突的多重影响

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 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

刘军梅*

【内容提要】自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遭受美欧制裁后，八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被制裁与反制裁中挣扎、摸索。俄罗斯此次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欧通过制裁系统重要性银行、禁用SWIFT系统、冻结外汇储备、设置融资壁垒、高新技术及能源封锁等措施，对俄采取最严厉的极限打压，导致俄罗斯GDP增幅下降、卢布贬值、股市崩盘、通胀高企，并加剧债务危机。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提高关键利率、临时资本管制、保民生救企业、推出“天然气卢布”、宣布“俄概股退市令”、在俄外资企业国有化、加速使用替代SWIFT的SPFS系统、推动自身产业结构转型等一揽子举措，予以回击。西方的极限制裁让俄罗斯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但俄罗斯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经济的耐受力 and 民众的容忍度，以及一系列反制裁的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对冲了西方制裁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相关的反制裁行动很可能会产生“回旋镖效应”，对西方造成不利影响。

【关键词】俄乌冲突 俄美欧关系 西方制裁 极限制裁 俄罗斯反制裁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062(27)

经济制裁不仅是激烈的经济竞争手段，同时也是为地缘政治服务的工具。自21世纪初以来，美西方已经对75个国家实施了制裁，所覆盖的人口占全球的52%。耳熟能详的制裁对象有伊朗、伊拉克、古巴、中国等，当然也包括最近特别引人注目的俄罗斯。从既有制裁案例的效果来看，与针对个人和组织的定向制裁相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针对其关键经济部门的制裁

* 刘军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非常有效，尤其是石油禁运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在其影响下，伊朗当时所有宏观经济指标都不同程度地变差了。如今，美西方国家施加在俄罗斯身上的制裁手段堪称“史无前例”的极限制裁，各类制裁已经超过了8000多项^①，俄罗斯也超过伊朗，“晋级”为世界上遭受制裁最多的国家。从逻辑上推断，借助一系列制裁工具，通过相应的触发机制，致使俄罗斯面临通胀高企、货币贬值、资本外逃、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收入下降等“崩溃”局面，应该是美西方国家的先期目标。而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引发民众不满，配以“新媒体”时代的技术手段煽动“颜色革命”，引致社会动荡和抗议，从而严重削弱俄罗斯的政治力量来颠覆普京政权。那么制裁真的能够达到这些既定目标吗？其理论作用机制是怎样的？俄罗斯经济的抗压力及其反制措施的预期效果又如何？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文尝试加以梳理和讨论的。

一、美西方经贸-金融制裁的先期目标、工具与作用机制

自2014年因克里米亚和乌东局势遭受美西方国家首次制裁之后，八年来俄罗斯一直在被制裁与反制裁中挣扎、摸索。而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更加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再次密集接踵而至，同样呈现出由点及面的态势，且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制裁正在走向全面升级的极限。当下以“布查”命名的新一轮“地狱制裁”方案，则进一步夯实了“将俄罗斯与世界隔离”的计划。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贸和金融制裁、精英制裁、政治制裁、军事制裁、科技制裁、文体制裁等多个方面。鉴于经贸和金融体系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其加以制裁所展现的“威力”通常也是最巨大的，为此我们将主要围绕经贸和金融制裁展开分析。制裁措施落地实施后，能否顺利地通过相应的作用机制发挥效用达成先期目标和真实目的（见图1），其实还取决于多重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受制于诸多力量的博弈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匹配。为此，我们

^① “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已超8000项，内容逐渐离谱”，中国新闻网，2022年4月2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j/2022/04-02/9718126.shtml>

主要讨论几个典型的经贸-金融制裁措施致使俄罗斯经济衰退、崩溃等先期目标的理论作用机制。



图 1 美西方实施对俄联合极限制裁的目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一）制裁系统重要性银行——限制俄罗斯银行的结算和融资能力

银行体系堪称是一国经济的血液系统，限制了银行的结算和融资能力，阻止俄罗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中进行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遏制住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因此，美西方的制裁很早就盯上了俄罗斯的大型银行。几轮下来之后，被制裁银行的数量越来越多，其所拥有的资产超过了俄罗斯银行体系的三分之一以上。主要制裁措施包括禁止美元清算结算业务^①、列入 SDN List^②、冻结银行资产^③等。其中，俄罗斯外贸银行（VTB Bank）、新商业银行（Novikom Bank）和现代商业银行（Sovcom Bank）等俄罗斯银行遭受的损失最大，它们在美国管辖下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无法使用 Apple-Pay 和 Google-Pay 的服务，所有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也都在二级制裁的

① 指的是不允许被制裁银行在美国的银行开设代理行账户（Correspondent Account or Payable-through Account），这种制裁也称为“上了 CAPTA List”。金融机构使用美元进行清算结算，需要通过美联储的 FedWire（联邦电子资金划拨系统）进行。美国本土银行通过自身准备金之间的互相转账，来代理客户之间的转账业务。如果俄罗斯银行在美国没有分行，也没有接入 FedWire 系统，想要进行美元结算，就必须在美国本土找一家代理行来存放美元，当客户要求收取或支出一笔美元存款时，就会通知代理行动用准备金来代自己进行收支活动。因此，在制裁生效后，所有俄罗斯银行在美国的代理行将会在 30 天内关闭代理账户，从而无法继续提供相应的服务。

② SDN List 是特别指定的国民名单，也叫财政部黑名单，受 OFAC（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管辖，对名单上的实体进行一级制裁和次级制裁。进入 SDN 名单意味着基本丧失了与美国商业界的一切沟通和交流窗口。

③ 冻结资产就是被制裁银行名下持有的美国境内的存款、证券等一切金融资产，都不能再进行转账、转移、赎回、使用、更改等一切操作，银行账户里的钱和资产“只能看、不能用”。此外，制裁生效后，美国的一切个人和企业也都不能与其有任何资金往来。

威胁下被禁止与俄罗斯银行合作。同时，美欧都禁止与俄罗斯银行、国家财富基金及俄联邦财政部进行交易，禁止俄罗斯人在欧洲和英国银行的存款超过 10 万欧元和 5 万英镑等。

2022 年 3 月 6 日，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回应，万事达卡（MasterCard）和维萨卡（Visa）两家信用卡品牌宣布停止在俄罗斯的业务，而它们在俄罗斯支付交易的占比高达 74%。^①此后美国运通、日本信用局（JCB）支付系统也宣布了类似的决定。

（二）禁用 SWIFT® 系统——切断俄罗斯与国际贸易体系的联系

禁止使用 SWIFT 系统堪称是“金融核弹”。实践中，伊朗当年遭受这一制裁后，其与欧盟的贸易规模暴跌了 85%，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下降了 68%。^②同样，如果美西方国家联手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 SWIFT 系统，会让俄罗斯失去在国外进行外币支付的能力，无论是进口付款还是出口结算，抑或全球投资都无法进行，使其国际贸易遭遇全方位冲击，等同于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体系之外。对俄罗斯而言，这无疑是灾难性的打击，相当于被斩断了出口创汇能力，无法确保各项财政开支而陷于财政困境，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于是我们看到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势力在 2022 年 2 月 26 日突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禁止俄罗斯的七家主要银行^④使用 SWIFT 系统，并于 2022 年 3 月 12 日开始生效。

（三）冻结外汇储备——打击俄罗斯抵抗制裁的能力

为了确保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的“核弹”效果不被俄罗斯所拥有的超过 60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抵消，必须摧毁俄央行手中的金融堡垒，

① 因此，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阿尔法银行和廷科夫银行（Tinkoff）等多家俄银行，在 2022 年 3 月 6 日根据最新情况发布了转用银联的公告。除此之外，俄罗斯邮政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和其他一些小型银行此前就已开展了与中国银联的合作。

② SWIFT 全称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本质上讲，它就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之间收支清算活动的“电报系统”。全球 200 多个国家/地区的 11000 多家机构使用 SWIFT 的报文传送服务进行跨境支付。

③ 徐奇渊：“为什么中国不可能被整体上踢出 SWIFT？”《财经》，2020 年 7 月。

④ 这七家俄罗斯银行分别是：俄罗斯外贸银行（VTB Bank）、俄罗斯银行（Rossiya Bank）、开放银行（Otkritie Bank）、新商业银行（Novikom Bank）、现代商业银行（Sovcom Bank）、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Promsvyaz Bank）和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VEB.RF）。

才能给予其致命一击。限制了俄罗斯在 G7 各国境内外汇储备资产^①的使用权，就相当于制约了俄罗斯利用外汇储备抵抗制裁的能力。受这一措施的影响，尽管俄罗斯在 2014 年之后就开启了去美元化进程，但仍然有一半外汇储备资产因位于美、欧金融体系内而遭到冻结。

这是世界金融史上绝无仅有、叹为观止的超预期制裁，理论上完全可以把俄罗斯逼到墙角。美西方预期通过这一制裁手段使俄央行再无力支撑本国货币。不出意外的话，俄罗斯仅靠储存在俄罗斯央行金库中的现金难以稳定卢布汇率，储备中的黄金也将很难全部出售，届时俄罗斯势必会出现外汇挤兑、银行挤兑和供应链挤兑。此外，俄罗斯的偿债能力也会由此受到限制，进而引发债务违约。

（四）设置融资壁垒——削弱俄罗斯银行和企业的融资能力

对能源资源和外部融资的高度依赖，是俄罗斯经济的两个固有顽疾。在外部融资成本足够低、卢布汇率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来支持自身发展，的确是理性的选择。美西方国家要制裁俄罗斯，当然不会错过设置融资壁垒的手段。于是我们看到，2022 年 2 月 23 日美国财政部发布指令，禁止在二级市场购买俄罗斯在 2022 年 3 月 1 日之后发行的政府债券，限制对期限超过 14 天的新债务提供融资、限制俄罗斯的国企和银行在美国发行新股^②；欧盟禁止向俄罗斯公民和组织提供发行欧元证券的服务，以及禁止任何国有股份超过 50% 的俄罗斯公司在欧洲交易所上市进行 IPO 等等，力求阻断俄罗斯筹集资金的核心渠道。短期内，多家俄罗斯企业股价暴跌，许多俄罗斯公司失去了在国际层面开展业务的机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 20% 或更多，抵押贷款市场几乎陷入瘫痪。包括飞机制造商苏霍伊和图波列夫、俄罗斯铁路、火箭和航天中心等在内的 60 家俄罗斯领先工业公司，都无法与欧洲公司合作并接受他们的投资。

① 截至 2021 年上半年，俄罗斯外汇储备中接近 50% 为美元、欧元、英镑等资产，并存放于 G7 各国境内；13.8% 存放于中国；21.7% 为黄金；而存放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资产约占 15.7%。数据来源：俄罗斯央行年度报告-2021，https://www.cbr.ru/Collection/Collection/File/40915/ar_2021.pdf

② 被限制的银行和企业包括俄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阿尔法银行（Alfa-Bank）、莫斯科信贷银行（Credit Bank of Moscow）、俄罗斯农业银行（Rosselkhozbank），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俄罗斯铁路公司等，名单预计还会扩大。

（五）高新技术封锁——打击俄罗斯经济的创新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阶段俄罗斯对西方先进技术还是高度依赖的。为了对俄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努力加以限制，西方国家对其展开了高新技术封锁。主要措施包括禁止向俄罗斯国防、航空和海事部门出口敏感技术，以剥夺俄罗斯获得先进技术的机会；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半导体、计算机、电信设备、激光和传感器等高科技产品，限制对俄罗斯出口美国的软件技术；谷歌、“元”公司（Meta）、苹果以及许多科技公司正逐步关闭在俄业务；谷歌、亚马逊等国外云存储服务的供应商，也切断了与俄罗斯的业务联系，所有俄罗斯公司都被迫转向其国内云存储供应商，致使俄罗斯“智慧城市”项目所涉及的视频监控和面部识别系统的存储和数据处理面临巨大压力。

（六）制裁能源行业和能源禁运——切断俄罗斯经济大动脉

能源产业对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排名中，俄罗斯位居第二，2020年每天向国外销售465万桶石油。^①2021年油气资源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②出口收入则在不同时期占到了俄罗斯预算收入的36%-51%，油气公司在俄罗斯股票市场上的占比也高达45%-55%。^③对俄罗斯能源产业施加制裁甚至实施能源禁运，是美西方制裁的必选项之一，其目标就是切断俄罗斯经济的“大动脉”。美国在2022年3月8日直接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一个月以后美国总统又签署了一项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法案。欧盟则先是通过对一些商品实施出口禁令，来阻止俄罗斯对炼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然后表示将在2022年年内削减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并于2022年4月7日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煤炭禁运，预计将给俄罗斯造成80亿欧元的收入损失。^④这是欧盟首次针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制裁，并力求在2030年前中止对俄能源供应的依赖。

① “欧佩克年度统计公报（2021年）”，https://asb.opec.org/data/ASB_Data.php

② 2021年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比最大的是“矿物产品”（HS编码25-27），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石油气和气态碳氢化合物等，占总出口量的54.3%，约为2670亿美元。相关数据来源：Валентин Погорелый. Сколько товаров идет на экспорт в ЕС и США из России и ка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могут пострадать. 1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smart-lab.ru/blog/788758.php>

③ Нефтегазовая отрасль РФ. <https://fin-plan.org/lk/industries/oil-and-gas/>

④ 王晶晶：“欧盟批准对俄煤禁令：替代市场难寻，国际煤价或再度飙升”，澎湃新闻，2022年4月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24866

上述列举的美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所实施的经贸-金融制裁工具，单从影响经济状况的路径来看，其作用机制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几乎如出一辙，最终的冲击效应都导致了经济衰退、汇率贬值、资本外逃、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国际收支失衡（见图 2），进而通过打击俄经济融资能力、利润创造力、科技创新力和提升百姓福祉的能力，来为其真实目标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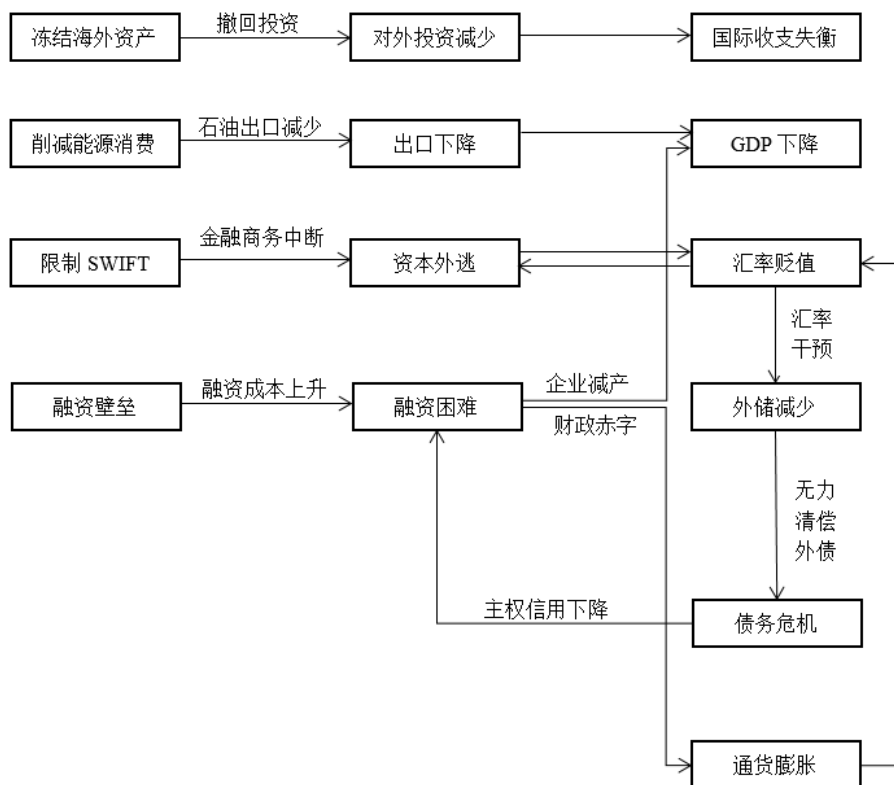


图 2 经贸-金融制裁工具作用于俄罗斯经济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二、极限制裁的严厉性 VS.俄罗斯经济的耐受力

虽然从理论上说，经贸-金融制裁是通过限制被制裁方的资金融通活动、

打压其经济发展的低成本、易执行、强威力、难规避的好方法，但纵观历史，真正能够通过制裁手段来达到政治、外交目的的案例屈指可数，更多的是无效案例。那么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所发起的史无前例的极限制裁是否能够达到既定的先期目标呢？这需要从联合制裁方的同步性、一致性和被制裁方经济的耐受力、民众的容忍度两个方面来评估。

（一）联合制裁方——美、欧对俄实施制裁的意愿和强度并不一致

制裁能否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不容喘息的创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各国是否会“全体”坚定不移地紧跟美国。从目前的情况判断，欧盟内部很可能会有成员国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首先，俄欧的经济融合度远远高于俄美之间。2021年俄欧的双边贸易额为2820亿美元，占俄罗斯对外贸易的36%，而俄美双边贸易额仅为344亿美元，占俄罗斯对外贸易的4.4%。^①俄欧贸易是俄美贸易体量的近9倍，可见欧美在做制裁决策时的考量很可能是不一致的。

其次，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是其进口的两倍，出口额达1881亿美元，主要出口项目为能源产品、木材、黑色和有色金属，而这些商品多数是资源型的初级产品。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这属于自然差异形成的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分工。虽然这是国际分工深度中最浅层次的分工，却是最稳定的分工，欧盟想要通过替代方式来打破这种类型的分工格局非常不易。即便欧盟下定决心放弃俄罗斯能源，在新能源替代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寻找来自其他国家的能源替代不但成本高昂（比如美国的天然气），而且很可能只是换了个交易对手而已（比如印度近期就在大量进口俄罗斯的打折石油，加工之后再加价卖给欧洲^②）。这种局面对于预设的制裁效果来说是个巨大的漏洞。

此外，在欧盟国家中，法国对俄贷款最多，德国对俄投资最多。乌克兰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 (ФТС) РФ. <https://customs.gov.ru/>

^② Мария Суворова. Индия получает прибыль, скупая российскую нефть и продавая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ы в Европу. 5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beststocks.ru/journal/indiya-poluchaet-pribyl-skupaya-rossijskuyu-neft-i-prodavaya-nefteprodukty-v-evropu/>; 吴斌：“畸形市场下印度‘倒卖’俄原油 美国力推俄欧‘能源脱钩’但难解困局”，21世纪经济报道官方网站，2022年4月19日，<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419/622aa94eab195a722318266345bd4f49.html>

危机之前，德国有 6000 余家企业在俄经营，30 万个工作岗位与此有关^①，至少近四成的原油及天然气来自俄罗斯，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替代，长期来看替代成本也会非常高。因此，在经济复苏乏力的前提下，保持与俄罗斯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有重要意义。虽然表面上欧盟委员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与俄罗斯彻底切割，但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欧盟各成员国想要齐心协力地、真正意义上与美国联手实施“全体+全方位”、铁板一块地对俄制裁是非常艰难的。

（二）历经数次危机的俄罗斯经济有耐受力、民众有容忍度

作为被制裁方的俄罗斯，其经济基本面能否承受住美西方此番极限制裁的压力，民众能否对生活水平的下降与不便保持容忍度，是制裁方能否达成先期目标和真实目的的决定性因素。之所以要考虑经济的耐受力，是因为美西方的极限制裁其实是非常精准、有力甚至致命的，俄罗斯的经济和民众生活毋庸置疑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影响，一定会感受到切肤之痛。只不过对于美西方来说，这场较量的输赢标准不只在在于俄罗斯的经济指标恶化到什么程度，更在于通过制裁打压经济之后，能否最终迫使普京下台。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在制裁工具的作用机制下，俄罗斯会面临 GDP 增速下降、汇率贬值、股市崩盘、通胀高企、外储冻结、资本外逃、债务危机等等“悲惨”局面，但只要没有突破它的耐受极限，只要生存空间尚存，俄罗斯民众反而很可能会更加团结、众志成城，致使美西方预期的颠覆普京政权的目的流产。

那么自转型以来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次经济、金融危机的俄罗斯，能否耐受住此轮极限制裁的压力呢？我们不妨以历史的视角，从下面几个宏观经济指标入手做些预判。

1. GDP 增速下降

在极限制裁的作用下，世界银行预测 2022 年俄罗斯 GDP 增速将下降 11.2%，而俄罗斯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的预测值为至少下降 10%，预计在 10%~15% 之间。如果超过 15% 的话，将是自 1991 年苏联解体以来 GDP 增速的最大年度降幅（见图 3）。

^① 3 тысячи немецких компаний ушли из России. 18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versia.ru/begst-vo-investorov-svyazyvayut-s-politiko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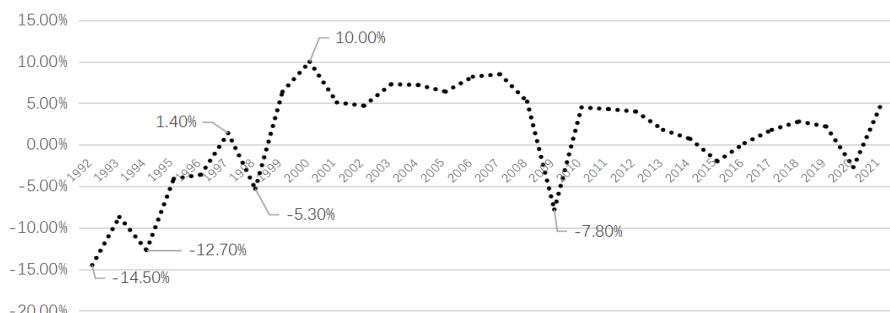


图3 俄罗斯 GDP 的年均增长率 (1992-2021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global-finances.ru>/数据整理绘制。

从图3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受美西方2014年制裁的影响，俄罗斯GDP增速在2015年的下降幅度只有2%，2016年就开始缓慢回升了。虽然本次极限制裁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幅度会大大超过2014年，但并不排除俄罗斯反制措施的“回旋镖效应”以及未来俄乌局势的最终缓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俄罗斯GDP增速止跌反弹的到来。

不过，仅从俄罗斯自身GDP涨跌幅度的变化，并不能很清晰地观察到制裁对其经济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再借助俄罗斯GDP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变化来进一步分析（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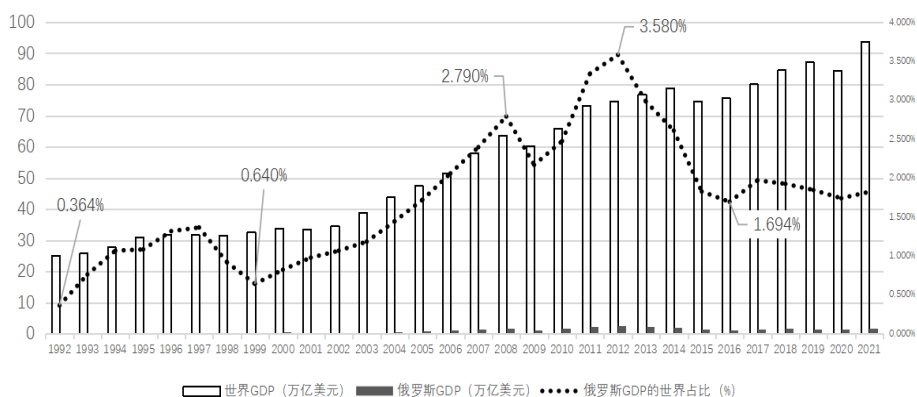


图4 俄罗斯 GDP 的世界占比 (1992-2021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global-finances.ru>/数据整理绘制。

从图 4 所展示的数据变化可以观察到，2014 年之后，俄罗斯 GDP 的世界占比受制裁影响下降之后，并没有得到迅速反弹，而是徘徊在既有下降的区间。由此推断，此轮极限制裁如果造成俄罗斯 GDP 增速史无前例地下降，那么受国际市场替代效应等竞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因制裁而失去的各种市场份额难以迅速恢复的话，其在水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会进一步下降。

2. 汇率贬值

在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下，卢布汇率不出意外地出现了剧烈波动。2022 年 2 月 23 日-3 月 11 日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从 80 P 跌到了 120 P，跌幅近 50%（见图 5），引发市场恐慌，甚至开始担忧 1998 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惨状再次上演。通过历史数据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卢布兑美元的汇率自苏联解体之后就一路下跌，从 1992 年 7 月 1 日到 1998 年 1 月 1 日，共贬值了 47 次：从 125 P 贬值到 5960 P^①（见图 6）。之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卢布汇率又曾在 1998 年 8 月 18 日至 9 月 9 日期间，从 6.43 P 跌至 20.83 P，跌幅达 3.2 倍^②，而 2014 年的首轮制裁也曾使卢布汇率下跌了 40%^③（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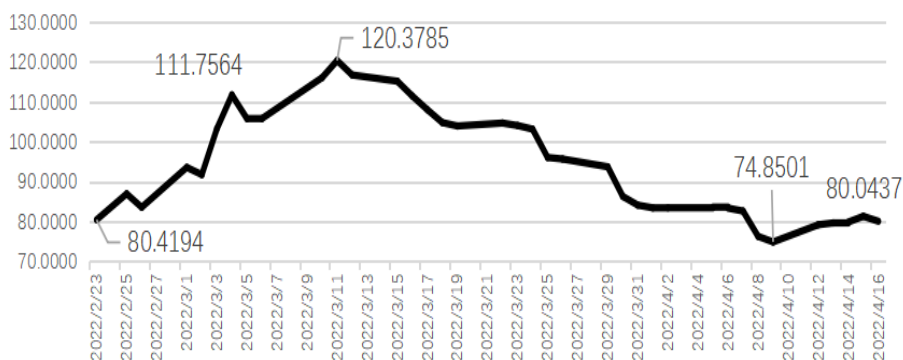


图 5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汇率（2022 年 2 月 23 日-2022 年 4 月 16 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库绘制（https://cbr.ru/currency_base/）。

① 卢布汇率史上的巨幅下跌，Крупнейшие падения курса рубля в истории. 22 мая 2018 г. <https://finance.rambler.ru/business/39907939-krupneyshie-padeniya-kursa-rublya-v-istorii/>

② Там же.

③ 2014 年 12 月 16 日，在油价大幅下跌和外币需求旺盛的背景下，俄罗斯卢布兑美元汇率在交易时段从 58 P 下跌至 80 P，跌幅近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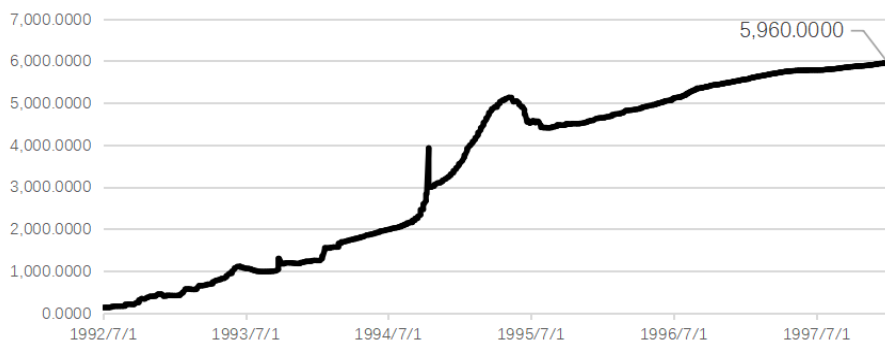


图 6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汇率（1992.07.01-1998.01.0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整理绘制（https://cbr.ru/currency_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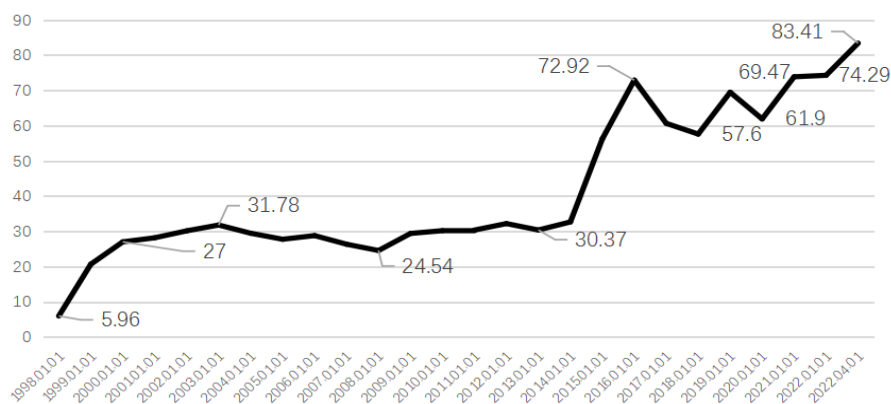


图 7 俄罗斯卢布兑美元的汇率（1998.01.01-2022.04.0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global-finances.ru/> 数据整理绘制。

这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卢布汇率的波动是非常频繁的。俄罗斯央行经过 30 多年的历练，已经较为娴熟地掌握了调控汇率的手段和方法，而大多数俄罗斯民众也在多年的“血雨腥风”中稳定了心态。由图 5 的数据可见，俄罗斯政府及央行的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已经使卢布汇率触底反弹，重新回到了 2022 年 2 月 24 日战前的水平，各方“预测”中的持续大跌并没有出现。^①

① 李丹：“俄罗斯金融市场大反攻 俄股扭转两连阴 最大行涨超 4% 卢布盘中涨近 7%”，华尔街见闻，2022 年 4 月 8 日，<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656317>

3. 股市崩盘

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股市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是民众的投资场所，是金融机构的利润来源，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所以股市的巨幅波动会预警金融危机的风险，意味着很可能财富被洗劫，继而直接融资受限、投资减弱、企业亏损、失业加剧、消费萎靡，最终导致经济减速和衰退。当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市场迅速做出了反应。莫斯科交易所指数（MOEX）在当天开盘就下跌了 11.28%，交易大厅宣布暂停衍生品、货币、股票等所有市场的交易。随后上午 10 点恢复交易后，盘中 MOEX 指数下跌 45%，探底至 1684.95 点水平^①；而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RTS）则下挫超 40%，探底至 610.33 点（见表 1）。那么，我们可否直接应用一般逻辑来对俄经济是否受到了灾难性打击做出判断呢？如果我们把俄罗斯股市的特点纳入分析的框架，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表 1 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RTS）、交易量和市值
(2022 年 2 月 21 日-2022 年 2 月 25 日)

时间	开盘	最高	最低	收盘	交易量/亿美元	市值/亿美元
2022.02.25	808.76	962.74	808.76	936.94	22.8	1470.7
2022.02.24	1061.74	1061.74	610.33	742.91	28.1	1166.1
2022.02.23	1124.82	1241.34	1075.98	1226.69	53.2	1925.5
2022.02.21	1417.8	1425.65	1152.14	1207.5	59	1895.4

资料来源：莫斯科交易所网站，<https://www.moex.com/ru/index/RTSI/>

俄罗斯股票市场的特点^②表现为：

(1) 资本化水平低，交易量小，股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莫斯科交易所（MICEX-RTS）流通的股票市值长时间维持在 2000 亿美元左右，这与不少国家股市平台上通常达到数万亿美元市值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见表 2）。

① Падение индексов стало максимальным за всю историю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ынка. 24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s://quote.rbc.ru/news/article/6217338f9a794769f119c4c2?>

②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фондового рынка. <http://tv-bis.ru/fondovyyiy-ryinok-i-investitsii/448-osobennosti-rossiyskogo-fondovogo-ryinka.html>

表 2 俄罗斯与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对比(2021 年 12 月 31 日数据)

排名	交易所	市值(亿美元)
1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276,869
2	美国纳斯达克	245,571
3	中国上海	81,547
4	欧洲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	73,337
5	日本交易所集团	65,443
6	中国深圳	62,198
7	中国香港	54,342
8	英国伦敦交易所集团	37,995
9	印度	35,480
10	加拿大多伦多	32,641
	俄罗斯莫斯科证券交易所	2,505

数据来源：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及彭博信息；<https://www.moex.com/ru/index/RTSI/>

(2) 参与者少。俄罗斯民众对股市的参与度很低，甚至非国家养老金、保险和对冲基金等机构的投资者，对股市的参与度也很低。

(3) 股价波动主要集中在二三十个蓝筹股上，最大流动性和每日交易量都集中在这些蓝筹股上。

(4) 如果要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方式真正筹集资金，俄罗斯企业更喜欢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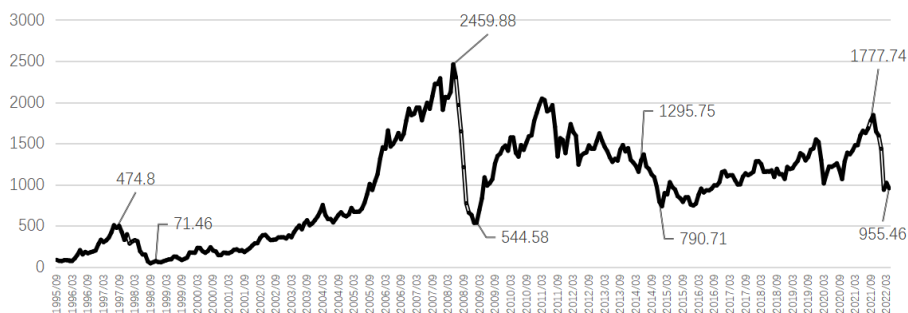


图 8 俄罗斯股票市场 RTS 指数的涨跌变化(1995-2022 年)

资料来源：莫斯科交易所网站，<https://www.moex.com/ru/index/RTSI/>

此外，创建至今，以美元计价的俄罗斯股票市场出现了两次灾难性的下跌（见图 8），分别是 1997-1998 年下降了近 90% 多和 2009 年 1 月下降近 80%。^①俄罗斯股票市场这些小市值、低流动性和民众参与度低的特点，使得其非常容易被操控，资本游戏的属性更强，所以股市的震荡对俄罗斯经济运行及民众生活的影响没有发达市场经济那么深远。而面对本次“股灾”，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从 2022 年 2 月 25 日到 3 月 24 日一直处于暂停交易状态，创下其最长的休市纪录。这期间，俄罗斯央行颁布了一系列临时资本管制措施，使得俄罗斯股市在 2022 年 3 月 24 日重新开盘之后没有继续下跌。^②

4. 通胀高企

通胀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指标之一。之所以要调控，就是因为通胀、通缩对经济发展、民众生活和政局稳定都有重要的影响。随着俄乌冲突的进展和制裁手段愈发严厉，俄罗斯的通胀率逐步高涨起来，2022 年 3 月份达到了 16.7%，是自 2015 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到年底可能会攀升至 17%~20% 之间。^③宏观调控一般要求将通胀控制在 5% 左右，很显然，20% 的通胀率是相当高的。那么，俄罗斯民众对这样的通胀有容忍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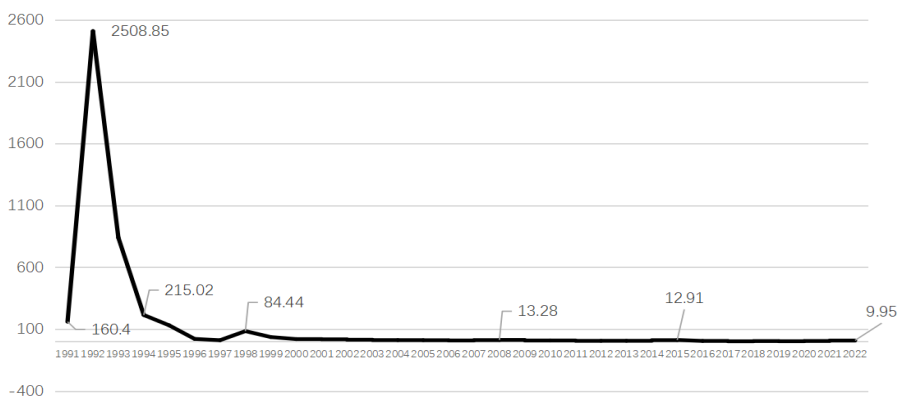


图 9 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1991-2022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statbureau.org/ru/russia/inflation-tables> 数据整理绘制。

① Индекс РТС: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долларах. <https://investprofit.info/rts/>

② 陈霞昌：“俄罗斯股市全面恢复，指数低开反弹，卖空仍被禁止！”《证券时报》，2022 年 3 月 28 日，https://www.stcn.com/xw/sd/202203/t20220328_4290377.html

③ Кудрин допустил инфляцию до 20% в 2022 году. 13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www.rbc.ru/economics/13/04/2022/6256ae139a794732acdaaf4f>

由图 9 的数据可以观察到，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过 2500% 多。受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影响，这些时点的年平均通胀率分别达到过 84.44%、13.28% 和 12.91%。如果只选取 21 世纪以来的数据进一步观察，则可以看到俄罗斯通胀走势整体是下降的，并在 2017 年达到了 2.52% 的低点（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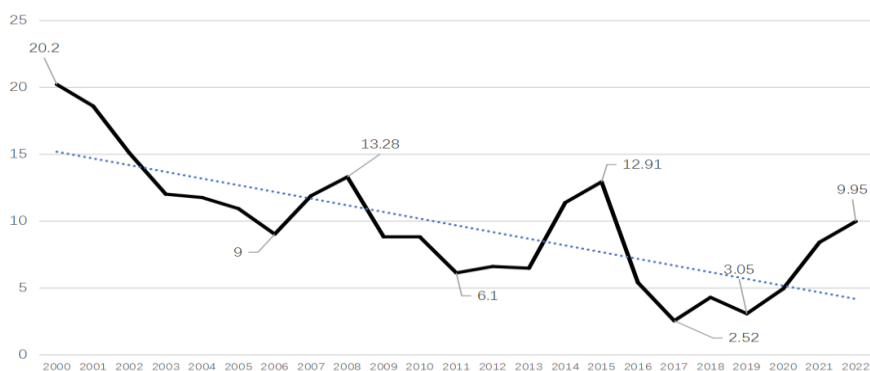


图 10 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2000–2022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statbureau.org/ru/russia/inflation-tables> 数据整理绘制。

再从俄美两国的年均通胀率的横向比较来看，美国的年通胀率 1991 年以来长期保持在 4% 以下，^①直到 2021 年才开始有所攀升（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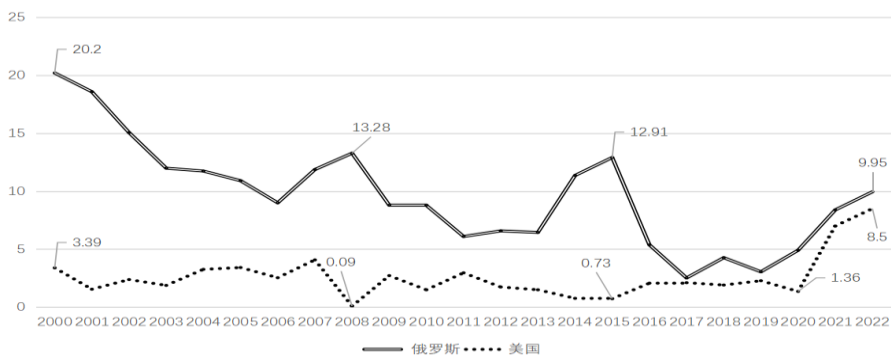


图 11 俄罗斯与美国年均通胀率的比较（2000–2022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global-finances.ru/inflyacziya-v-ssha-po-godam/> 数据绘制。

^① Инфляция в США по годам: 1970-2022. <http://global-finances.ru/inflyacziya-v-ssha-po-godam/>

从俄美通胀率的历史数据的比较来看，相较于长期以来一直借助科技进步、贸易投资及金融的全球化而享受着“低通胀”生活的美国人而言，经历过 2500% 恶性通胀的俄罗斯民众，对通胀率高企的容忍度显然会高一些。

5. 债务危机

理论上讲，一国一旦发生债务违约，通常都会造成融资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导致投资者和储户丧失信心，从而助长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使国内企业和家庭更难获得信贷。美西方设置融资壁垒、冻结俄罗斯近一半外汇储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限制俄罗斯的偿债能力，造成其债务违约。那么俄罗斯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有多大呢？我们也从历史视角来加以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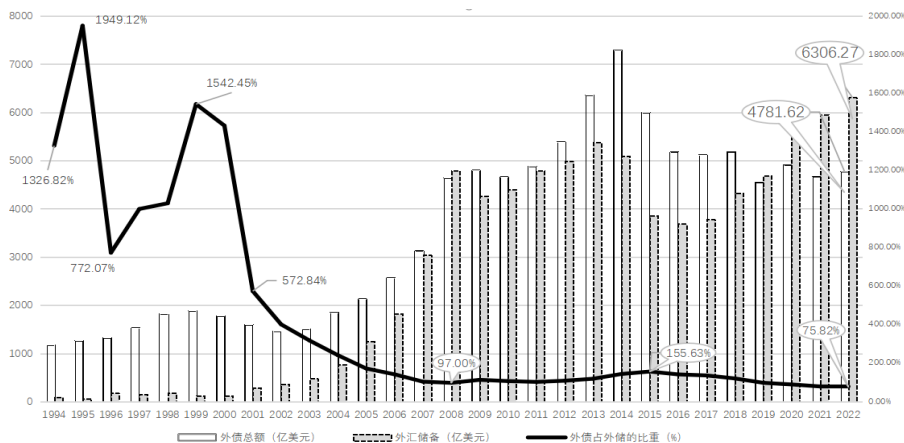


图 12 俄罗斯外债总额与外汇储备的对比图（1994-2022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global-finances.ru/vneshniy-dolg-rossii/> 的数据整理绘制。

从图 12 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外债负担是非常重的，外债最高达到了外储的 190 多倍。进入 21 世纪，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和国家治理的改善，外债规模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并在 2019 年之后低于外汇储备的数量。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俄政府机构、银行、企业部门在 2022 年度到期需要偿还支付的外债总额为 730 亿美元，^①不考虑制裁的话，俄政府及企业偿还这些外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在近一半外储被

① Выплата внешнего долга России-2022. 27 января 2022 г. <http://global-finances.ru/vyi-platy-po-vneshnemu-dolgu-rossii-2022/>

冻结、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同时下调主权信用等级的情形下，俄罗斯债务违约“迫在眉睫”的信号正在被不断地释放和夸大。对此，俄罗斯目前的做法是照常发出偿债指令，如果因西方银行的拒付而造成俄罗斯技术性违约，那么责任并不在俄罗斯。而且，极限制裁已经几乎全面封堵了俄罗斯的融资渠道，所以债务违约对其并不能造成更大的伤害了，反而是债权国及其银行等需要担心会不会因此而诱发债权危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所实施的极限制裁，能否达到既定的目标值得怀疑。可以说，经济转型 30 多年来，俄罗斯没有错过任何一场世界性或者区域性的经济危机，外部发展环境也几乎从来没有“好”过。但当 20 世纪 90 年代年均 6.5% 的 GDP 降幅，让世人觉得俄罗斯就要濒临破产的时候，它却迎来了 21 世纪前八年年均 7% 的 GDP 增长。可见，那些“难熬的日子”练就了俄罗斯经济的耐受力 and 民众的容忍度，使得这个号称“世界上唯一一个各类资源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在对抗美西方制裁的时候，具备了不同一般的底气。

三、俄罗斯反制措施的对冲逻辑及前景展望

面对美西方日益严厉的经贸-金融制裁，俄罗斯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不但运用市场经济常规的反危机手段加以应对，而且还绝地反击，出其不意地使出几个“世间罕见”的撒手锏，使反制的“回旋镖效应”得以渐显威力。

（一）俄政府和央行的常规应急举措——初见成效

1. 提高关键利率^①

货币、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通常是：面对危机冲击时，首先需要稳定金

^① 关键利率是俄央行于 2013 年 9 月引入的货币政策的主要指标。在此之前，1992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9 月 13 日俄罗斯一直使用的是再融资利率。2013-2016 年期间再融资利率和关键利率这两个指标并存，但数值并不相同。比如在 2014 年年底受欧美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关键利率飙升至 17%，但银行获得资金的再融资利率仍低于 10%。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俄罗斯央行将再融资利率等同于关键利率，此后就只通过提高或降低关键利率来影响货币市场的利率水平，进而影响银行流动性水平、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 and 经济增长率等。参见 Ключевая Ставка и Ставка Ре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Отличия Основ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Денежно-Креди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s://financc.ru/finansy/klyuchevaya-stavka-i-stavka-refinansirovaniya-otlichiya.html>

融市场、抑制通胀，然后再逐渐改善生产、恢复供应链。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当年 12 月 16 日卢布大幅跳水，俄央行立即将关键利率从 10.5% 大幅提高到了 17%（见图 13），由此暂时稳定了汇率。因此，加息再次被认为是俄央行处理此次卢布危机的首选项之一。

为了防止经济因极限制裁而停摆甚至崩溃，俄央行在卢布汇率快速下挫时做出了迅速反应，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直接加息 1050 个基点，将关键利率从 9.5% 上调至 20%，创下近二十年来的新高（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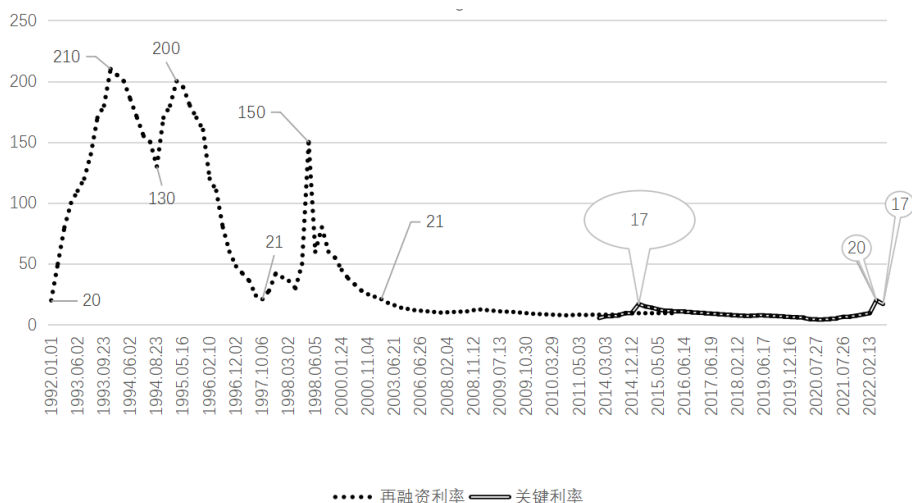


图 13 俄罗斯 1992-2022 年的再融资利率与关键利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央行与 <https://www.n-s-k.net/business/info/history> 网站数据整理绘制。

关键利率的大幅上涨会带动银行存款利率的上升，让银行存款极具吸引力，使民众的储蓄免于贬值，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也会吸引资金留在俄罗斯，避免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表 3 的数据可看出，20% 的关键利率是相当高的，俄央行的这一举措在成功阻止卢布暴跌（见图 5）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大规模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的发生。^①

① 许超：“卢布收复全部失地！俄罗斯做对了什么？”华尔街见闻，2022 年 4 月 1 日，<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655863>

表 3 世界部分主要国家和地区央行 2022 年的关键利率对比

相关央行	时间	关键利率
印度储备银行	2022.02.10	4.0%
新西兰储备银行	2022.02.23	1.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2022.03.01	0.1%
加拿大央行	2022.03.02	0.5%
欧洲中央银行	2022.03.10	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022.03.16	0.25%-0.5%
英格兰银行	2022.03.17	0.75%
日本央行	2022.03.18	-0.1%
中国人民银行(LPR)	2022.02.21	3.7%
瑞士国家银行	2022.03.24	-0.75%
俄罗斯中央银行	2022.02.28	20%
俄罗斯中央银行	2022.04.08	1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global-finances.ru/bazovyie-protsentnyie-stavki-tsentroban/> 数据整理绘制。

一般情况下，待危机事态平息后，央行往往会下调关键利率，来逐步降低贷款成本，以有助于恢复供给。于是我们看到，2022 年 4 月 8 日俄央行将关键利率下调到了 17%（见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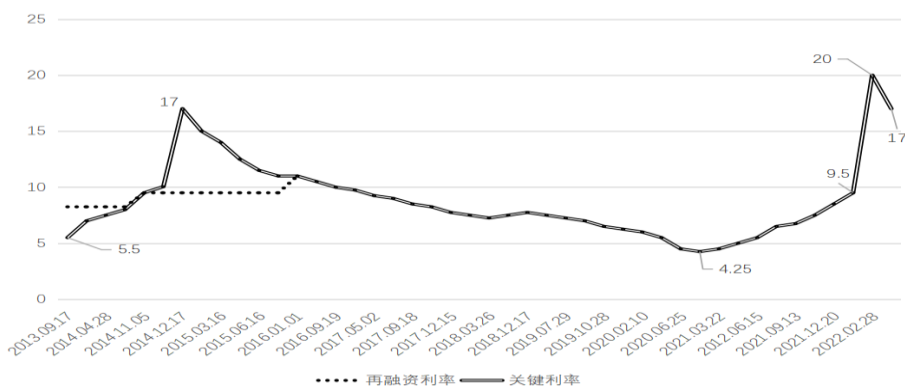


图 14 俄罗斯 2013-2022 年的关键利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俄罗斯央行与 <https://www.n-s-k.net/business/info/history> 网站数据整理绘制。

2. 临时资本管制

要想稳住卢布汇率，就必须尽可能减轻卢布的抛售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增加外汇供给的同时限制对外汇的需求。因此，俄政府和央行围绕这两个目标实施了一系列动作。

首先，为了增加外汇供给，俄罗斯财政部强制出口商出售 80% 的外汇收入，以稳定卢布的汇率甚至助其升值。其次，为了限制对外汇的需求，俄政府针对外国居民颁布法令，禁止外国客户从俄罗斯金融体系中提取美元等主要外币现金。而对于本国居民，则要求禁止根据贷款协议向非居民提供外币；禁止将资金转移到自己的外国银行账户，并将居民从外币银行账户中提取美元的额度限制在 1 万美元以内。此外，俄央行还对非居民实施一系列业务禁令：暂停证券交易商接受外国投资者出售俄有价证券的委托，使外国投资者无法交易手中的俄罗斯资产（无法抛售）；要求只有在政府委员会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向“不友好国家”的债务持有人支付俄罗斯的公司债务和政府债务。这些措施使数百家外国公司无法从俄罗斯提取利润，相当于对资本流动实施了限制，切断了资本外流的渠道，从而限制恐慌性抛盘以及外资逃逸。

上述举措既有利于减少俄罗斯国内市场对外汇的需求，同时也限制了国内资金的外流，减轻了卢布贬值的压力，使卢布汇率在经历了初期震荡后，形成了 V 型反弹走势。不过，俄罗斯央行的目标只是稳住汇率，并不会允许卢布大幅升值，原因在于俄罗斯的预算是以卢布为单位制定的，卢布过度升值并没有好处。

3. 保民生、救企业

面对当前的制裁，俄罗斯既要保民生，又要救企业，才能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从保民生的角度来讲，俄政府将提高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公务员工资、福利救济金和退休金，并强调必须保证包括药品市场在内的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同时要尽量避免人为干预市场。

从救助企业的角度来讲，俄政府正在制定一系列救助中小企业的措施，包括降低贷款利率、实施税收减免，以及正在酝酿之中的、旨在刺激创业以实现进口替代的一揽子举措，尽力扩大企业通过各种发展机制进行融资的渠道。2022 年 3 月 5 日，俄央行决定向银行拨款 5000 亿卢布，用于为中小企

业发放贷款，以帮助降低中小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家）违约的可能性。^①

（二）绝地反击——“回旋镖效应”渐显威力

1. “天然气卢布” VS. “石油美元”

面对美西方的“金融核弹”和“地狱制裁”，俄罗斯绝地反击，出乎意料地推出了“天然气卢布”。从化解制裁威力的角度来看，卢布成为支付工具后，首先可以降低俄罗斯的交易成本，有利于提振卢布的国际需求，减少国际市场做空卢布的意愿，从而有助于卢布汇率的稳定。其次，一旦欧洲被迫使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就会使 SWIFT 制裁的“核弹”威力大幅降低。此外，俄罗斯还可以通过卢布定价来调控天然气价格的空间。

从构建金融主权的角度来看，“天然气卢布”的推出，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对美国的一次有力的反击，即便不能完全削弱“石油美元”的霸权，也可以使卢布从依附性货币转变为具有完全主权的硬通货。而俄罗斯的底气则来自资源产业的难以替代性。相关的数据显示，2021 年欧盟 45% 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其中最大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国是德国和意大利，占比接近一半。^②

俄罗斯迫使欧洲同意使用卢布结算的规划路径是：首先建议欧洲国家在俄罗斯银行开设卢布账号来解决没有卢布的困境；其次，俄央行提出可以用黄金结算，并以每克黄金 5000 卢布确定了卢布与黄金的比价；最后，俄罗斯还表示自己未来出口的石油、金属和其他大宗商品也可能以卢布来结算。如果这次绝地反击能够成功，那么“天然气卢布”不仅有助于化解制裁的威力，而且堪称是俄罗斯迈向金融主权的第一步，甚至可能会开启国际贸易结算体系的重构。而从阶段性的博弈成效来看，俄罗斯正在朝着自己的目标靠近：2022 年 4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在发给成员国的指导文件中指出，欧盟公司在不违反对俄制裁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使用卢布进行天然气交易结算是存在可能性的。^③

① Санкц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2022 и 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бизнеса. 9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www.gd.ru/articles/12177-sanktsii-dlya-biznesa>

② Россия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 секторе. <https://translated.turbopages.org>

③ “妥协？欧盟：使用卢布支付天然气是可能的！英国已有行动，德国总理：禁运俄罗斯天然气不会结束战争…中国外交部也有回应”，2022 年 4 月 23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H5JPRA5U053469RG.html>

2. 扩大双边本币贸易

为了进一步缓解禁用 SWIFT 结算系统的压力，俄罗斯开始大力寻求与东方国家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特别是跟中国和印度。

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俄罗斯银行的商业客户正积极开设人民币账户，以及大幅增加账户内人民币的余额。中国企业也开始选择使用人民币购买俄煤炭和石油。虽然美国一直对中国威逼利诱，想要堵住这一“漏洞”，但现在看来结果可能会令其非常失望。

而严重依赖俄罗斯石油和武器的印度，恰好趁着全球石油价格飙升的非常时期加大了在俄罗斯的采买力度。俄罗斯也给出了巨大优惠，希望印度在 2022 年至少能采购 1500 万桶原油。为了绕开西方的制裁措施，俄印正在尝试落实“卢布-卢比”支付计划，通过俄印银行开发的系统完成双边支付。俄罗斯甚至希望能将自己的米尔（MIR）支付系统与印度的统一支付接口连接起来，让印度和俄罗斯的银行卡实现双向自由使用。

3. “俄概股”退市

为了制裁俄罗斯，伦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都停止了俄罗斯存托凭证的交易，富时罗素也将俄罗斯股票从基准指数中剔除了。受停牌和禁止支付股息等制裁措施的冲击，“俄概股”的存托凭证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价值暴跌，如俄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的股价由 20 美元贬值至 1 美分，北方钢铁（Severstal）和诺瓦泰克（Novatek）的股票也下跌了 99%。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政府宣布“俄概股退市令”，让俄罗斯公司重新回归国内股票市场，回归实际价值。此举既能防止“俄概股”在价值非理性崩溃后被美西方“收割韭菜”，也将有助于稳定自身的金融体系。目前俄罗斯外贸银行（VTB）已经决定自愿退市，所有的俄罗斯国企也将会采取相应的模式退市，私企则可自由决策。

4. 出口禁令

针对美西方国家的贸易禁令，俄罗斯也将实施对应的出口禁令，停止向加入反俄制裁的国家供应天然气、石油、煤炭和矿物肥料，禁止包括镍、铜、铝、锌、锡等稀有金属在内的特定种类原料的出口。这些反制措施会影响到全球汽车、不锈钢、电动车电池、微芯片、发光二极管（LED）以及智能手

机屏幕等工业企业的生产与供应。

5. 外资企业国有化

作为又一反制措施，俄罗斯列出了一份包括苹果、宜家、微软、大众等 59 家企业的“反制裁黑名单”。名单上的外国企业及其负责人将面临“账户及资产被查封、引入外部管理、财产国有化”等风险。目前这些企业很可能在没有监督和管理程序的情况下启动“加速破产”程序。

6. 加速使用替代 SWIFT 的 SPFS 系统

为应对西方制裁，俄央行于 2014 年分别开发了“俄罗斯央行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和国家支付卡系统（NSPK），目的就是在不时之需下替代 SWIFT 和维萨卡、万事达卡。历时八年的准备，才使得俄罗斯在面对美西方“金融核弹”时没有乱了方寸。截至 2021 年 5 月，20% 的俄罗斯境内转账通过 SPFS 系统完成，有大约 23 家外资银行完成了与 SPFS 系统的连接，预计随着全方位制裁的进一步升级，这些系统的应用深度和广度会进一步迅速加大。

7. “灰色”进口合法化^①

为了应对美西方国家的出口限制和技术封锁，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特殊的非标准措施”。比如，在各大互联网企业宣布撤离后，俄罗斯立刻开放了盗版资源网站，让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能正常使用各类资源，并且无需向欧美支付专利费。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则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发布了允许进行平行进口的货物清单^②，允许在未经版权所有者许可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境内市场销售超过 50 个类别的商品，用于满足其国内对外国商品的需求。这一举措等同于将“灰色”进口合法化，允许没有申报关税、也没有售后保障的走私物品流入正常销售渠道。

8. 经济转型

对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俄罗斯其实看得很清楚，也很早就下定决心摆脱对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

① Узаконивание «серого» импорта: Минпромторг согласовал список товаров для ввоза без согласия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я. 23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www.bfm.ru/news/498419>

② Минпромторг разработал перечень товаров, разрешенных к параллельному импорту. 22 апреля 2022. <https://www.tks.ru/news/nearby/2022/04/22/0011>

然而，轻而易举就能换来不菲收入的能源出口，就如同毒品一样让俄罗斯上瘾，想要彻底摆脱非常艰难。如果客观上能够借助外力来强制“戒毒”的话，也许恰好是出路之一。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欧盟各国果真能够下定决心并成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之时，就是俄罗斯因出口收入受到重创而被迫启动经济转型之日。这其中的逻辑在于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两面性：当油气收入稳定时，俄罗斯的机械制造业、轻工业难有发展机会；而一旦油气资源靠不住了，俄罗斯一定会被迫寻找并发展其他的支柱产业。由此很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虽然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其积极作用也不容忽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制裁会迫使俄罗斯寻求、生产以前没有的技术和产品，完成进口替代，最终实现经济多元化。如同 2014 年的制裁之后，俄罗斯“被迫”从事农业生产一样，2022 年的这一轮极限制裁也将迫使俄罗斯恢复自己的高科技产业。既然俄罗斯能够从高度依赖食品进口的国家，经过努力一跃成为粮食的主要出口国，并开始为自己提供牛奶和肉类，那么我们也有理由期望：俄罗斯仍然有机会借助本轮的极限制裁最终“凤凰涅槃”，摆脱对能源收入的依赖，实现科技创新，提升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本轮制裁也许恰恰会是俄罗斯经济结构转型的机遇。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前文的论证，我们认为，俄罗斯凭借自身资源的优势、经济的耐受力和民众的容忍度，很可能使美西方国家即便依靠经贸-金融制裁的手段让俄罗斯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但仍然无法达成颠覆普京政权的目的。而俄罗斯的一系列反制措施，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对冲了制裁的巨大损伤，还成功地触发了反制手段的“回旋镖效应”，使得美西方在“杀敌一千”的同时，无可避免地承受着“自损八百”之痛。

而俄罗斯因被制裁所遭受的所有“痛苦”都将是对我们的警醒。许多血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首先，外汇储备在国际争端中很容易成为制裁目标。可以考虑进一步有

序安排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适当增加数字资产和资源型储备,实现更合理的结构配置。

其次,必须掌握一定的反制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危机。可以进一步通过双边贸易、多边合作、“一带一路”来构建和促成相互交融的利益格局,以便在极端情况下为反制的“回旋镖效应”争取足够的空间和力度。

最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必须未雨绸缪。通过科技的创新和进步,掌握和发展关键核心技术,以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领土安全。

【Abstract】 Since being sanctio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due to the Ukraine crisis in 2014, Russia has been struggling and fumbling between sanctions and counter-sanctions for eight years. After Russia's "special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took the most stringent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by sanctioning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 kicking Russia off the SWIFT system, freezing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setting up financing barriers, high-tech and energy blockades. All these measures have led to a decline in Russia's GDP growth, a devaluation of the ruble, a stock market crash, high inflation, and aggravated the debt crisis. Meanwhile, Russia has countered by a package of measures including raising key interest rates, taking temporary capital controls, protect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ssisting companies, launching the "natural gas ruble", announcing the "delisting order for Russian stocks", nationalizing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in Russia, accelerating the use of the SPFS system instead of the SWIFT, and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its own industrial structure. Western sanctions have led the Russian economy into an unprecedented predicament. However, with its own resource advantage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public tolerance, as well as a series of counter-sanction measures, Russia has not only, to a certain extent, effectively hedged great pressure by Western sanctions but also has a "boomerang effect" of its counter-sanction measures, which adversely affects the West.

【Key Words】 Russia-Ukraine Conflict, Russia-U.S.-EU Relationship, Western Sanctions, Maximum Sanctions, Russia's Counter-Sanc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Россия попала под санкции США и Европы из-за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2014 году, Россия уже восемь лет борется с санкциями и выставляет контрсанкции.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России против Украины США и Европа предприняли самые жёсткие меры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наложив санкции на системно значимые банки, отключив систему SWIFT, заморозив валютные резервы, установив финансовые барьеры, создали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е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ады,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снижению роста ВВП России, обесцениванию рубля, краху фондового рынка, высокой инфляции и усугублению долг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путём повышения ключевых процентных ставок,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за капиталом, защиты средств к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ю людей и спасения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запуска «газового рубля», объявления «порядка исключения из списк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х акц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предприятий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капиталом в России, ускоренны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системы СПФС, заменяющей SWIFT, и внедрением комплекса мер по содействи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т.д. Западные санкции поставили российск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 затрудните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однако, благодаря собственным ресурсны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терпимости, а также ряду контрсанкционных мер, Росси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эффективно застраховала себя от огром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вызванного западными санкциями, но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контрсанкционные меры могут иметь «эффект бумеранга», который негативно скажется на Запад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я-США-Европа, западные санкции, крайние санк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нтрсанкции

(责任编辑 苟利武)

数据主权背景下俄罗斯数据 跨境流动的立法特点及趋势*

孙祁 尤利娅·哈里托诺娃**

【内容提要】数据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最新演化，关系到网络空间下数据流动与监管、个人信息安全与保护、数据存储地等国家安全的核心领域。数据作为基础性的战略资源，使得各国大力推动数据流动以获取战略收益。但在数据主权要求下，数据跨境流动的背后是数据安全监管与个人隐私保护等诸多限制因素。近些年来，俄罗斯基于其独特的网络安全考虑，持续强化国家数据主权与网络安全，收紧对数据的整体控制，在数据主权方面开展网络空间法律体系构建与规则建设，实行严格的本地化存储原则。这些举措维护了俄罗斯的数据安全和个人数据权利，但此类孤岛式的数据保护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据跨境流动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数据主权 俄罗斯数据本地化 俄罗斯个人信息保护

【中图分类号】D9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089(19)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流动赋予全球经济新的增长动能，对现代社会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各国对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风险担忧，致使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针对全球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政策和监管实践不断出新，而对数据流动采取的法律政策则有所差异。世界各国围绕网络空间的战略博弈与数据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强，其中，美欧数据主权战略属于“进攻型”，通过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联合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The rule of law in the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 and Russia: current state,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项目批准号：21-511-93004 КАОН_a）。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议！

** 孙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莫斯科大学法学副博士；尤利娅·哈里托诺娃（Юлия Харитонова），俄罗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教授。

“长臂管辖”扩张其跨境数据执法，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数据主权战略属于“保守型”，通过数据本地化解决数据治理与本地执法问题。^①“长臂管辖”在允许跨越一国传统地域主权限制获取境外数据的同时，也加剧了与外国关于数据管辖权以及执法权之间的冲突。^②2013 年“棱镜事件”曝光后，基于保护国家安全与互联网数据潜在危险的考虑，普京总统批准相关法案，对俄罗斯现行的关于公民数据存储和处理的立法进行了修改，实行数据存留本地化，且严格限制跨境数据流动。^③2022 年俄乌危机的战火已波及俄罗斯网络体系，俄罗斯政府与主流媒体官网受到黑客攻击而无法正常运行，俄罗斯网络安全风险等级也随着俄乌热战持续飙升。由此，2021 年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针对外来信息技术对俄政权稳定进行攻击的相关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俄罗斯是推动数据存留本地化、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代表，其出发点是基于国家安全立场来应对数据威胁，所采取的数据流动原则与中国的数据监管方向基本相同。^④目前，中国对于俄罗斯数据流动法制领域的研究较少，尚未对《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中关于数据存留本地化的内容进行梳理与解读。本文从俄罗斯数据管理的法律体系出发，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已缔结的国际条约为基础，梳理俄罗斯涉及数据流动的联邦法律、关乎个人数据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在俄罗斯坚决维护数据主权的背景下，对敏感和大规模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体系、模式和趋势，进行重点解读。

一、俄罗斯数据跨境流动立法概述

俄罗斯的数据主权保护与数据信息监管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全球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与普及，俄罗斯逐步延伸网络发展规划与构建信息保护法

① Ни Ф, Ли С. Ориентация и инновация: теория верховенства закона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Власть. 2016. No.10. С. 171-177.

② 黄道丽、胡文华：“全球数据本地化与跨境流动立法規制的基本格局”，《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 年第 9 期。

③ 孙祁：“俄罗斯强化数据主权保护”，《检察风云》，2021 年第 8 期。

④ 孙祁：“俄罗斯将推数字卢布促数字经济发展”，《检察风云》，2021 年第 5 期。

律体系，并及时建立起网络安全规范化、数据信息流动制度化的监管体制。俄罗斯不断收紧对数据的整体控制，并呈现出极端趋势，已经从地域管控演变为特定条件下的强制中断，即数据本地化向“断网”行动转变。^①俄罗斯基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严格管控数据流动，符合国际法中的基本权。俄罗斯基于其宪法中关于信息安全法律框架的一般性基础规则，逐步构建起了数据主权保护的安全体系。

俄罗斯自 2014 年提出“切断与互联网的联系”以来，不断增强对本国互联网与数据信息的法律控制能力，在网络空间与网络主权范围内全方面颁布专项法律，在传统部门法领域增补与网络、数据相关的内容。俄罗斯以数据本地化为手段，不断强化自身的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而颁布专项法律、对传统部门法进行增补，则是实现该手段的主要保障。

表 1 俄罗斯网络与数据保护的立法实践

传统部门法	《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民法》《著作权与邻接权保护法》《俄罗斯联邦国家秘密法》《俄罗斯联邦商业秘密法》《通信法》《邮政法》《大众传媒法》等。	例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55 条第 3 款规定：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在捍卫宪法制度基础、他人的道德、健康、权利和合法利益、保证国防和国家安全所必需的限度内，由联邦法律予以限制。
网络与数据保护专项法	《俄罗斯联邦主权互联网法案》《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国际信息交换法》《电子数字签名法》《电子商务法》等。	例如，《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规定：所有运营商确保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通过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数据库进行记录、存储、系统化、积累、调整、提取，期限为永久存储。
政策性文件	《俄罗斯远程通信服务市场发展纲要》《俄罗斯网络通信信息安全纲要》《俄罗斯信息社会发展战略》《至 2010 年俄罗斯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数据保护、生产和加工国家网络中心建设纲要》《国家信息安全学说》《数字经济国家项目》《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等。	例如，2021 年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规定：信息安全的目的是加强俄罗斯联邦在信息领域的主权。

^① Маслов А. Недетская песочница.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экспериментирует с правовым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м// Финансовая газета. 2020. No.17. С.8-9.

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 2019 年发布的《关于网络与数据信息保护立法与政策发展报告》（以下简称《网络与数据报告》），^①其中涉及网络主权与数据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呈现“两大类、多层次”^②的分布特征，除了专项法律，在传统部门法和政策性文件中也均有体现（见上表 1）。

《网络与数据报告》指出，俄罗斯已发布了近 50 部国家层面的规范性法律法规与政策性文件，就网络主权问题给予国家立法支持与保护，呈现出立法数量多、颁发部门层级高、涉及范围广的特征；形成了以《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已经缔结的国际条约为基础，以《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和《俄罗斯联邦主权互联网法案》为准则，以其他联邦法律与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数据与信息安全法律体系。

（一）宪法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基本规范

《俄罗斯联邦宪法》载有信息安全法律框架的基础规则，即信息关系主体法律地位的关键要素、信息安全原则（合法性、尊重人权、人格、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平衡）及确保信息安全的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等。《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23.1 条“人人享有私生活不可侵犯、个人及家庭秘密、保护自己的名誉和名声的权利”及第 24.1 条“非经同意不允许收集、保管、使用和传播个人的私生活信息”，确立了个人隐私权属于公民的宪法权利。第 29.4 条“保障舆论自由，禁止新闻检查”，确立了每个主体以符合法律的方式自由寻求、接收、传送、制作和传播信息的权利规范。第 55.3 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在捍卫宪法制度基础、他人的道德、健康、权利和合法利益、保证国防和国家安全所必需的限度内，由联邦法律予以限制”，确定了个人自由的“边界”，内含着国家安全优先的原则。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15.4 条的规定，如果俄罗斯参加的国际条约与联邦法律相抵触，则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则。在国际条约方面，俄罗斯除缔结了八国集团《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2000 年 6 月 22 日发表）外，

① С текстом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а № 340741-4 “Об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и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к нему можно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на официальном сайте Госдумы.

② “两大类”是指传统部门法和新颁布的政策性文件；“多层次”是指对国内、国外两个层次的监管。

还于 2006 年批准加入了《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约》（1981 年发布）。俄罗斯根据《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约》，就数据跨境转移列出了被官方认可为“确保充分保护”的国家名单。^①除了公约成员国外，截至目前还有 26 个国家被列入“白名单”。^②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对俄罗斯境内个人数据主体合法权益的保障，巩固了对数据主体的控制权，还对将个人数据传输给第三方的行为作了严格规制，对处理个人数据进行了限制，但给企业自由处理匿名数据留有法律空间。

（二）“内外双严”保护数据主权

在美俄关系持续走低的背景下，俄罗斯将信息安全与国家地缘政治空间安全相关联，形成了独特的网络/信息安全观，即持续强化国家的信息主权，发展独立的网络通信技术，收紧对网络的整体控制，以坚决对抗美国等“不友好国家”的外来信息技术对俄罗斯政权稳定的攻击。^③俄罗斯着重强调数据主权“本地化”，通过《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以及《俄罗斯联邦主权互联网法案》对跨境数据作出了严格的本地化存储规制，对个人信息保护实施严格监管，形成了“内外双严”保护数据主权的法律特征。

《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于 2006 年由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该法规定了整个信息立法系统的准则、对信息安全的立法保护，调整相关主体在开展寻找、获得、传递、生产和传播信息以及使用信息技术和进行信息保护时产生的法律关系。其中第 6 条对信息权属问题进行了规定，“信息资源是财产的组成部分和所有权的客体”，明确了“信息可为资产，其主体可以是公民、国家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或者机构及社会团体”。

① Конвенция о защите физических лиц при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ой обработке персональных данных (Заключена в г. Страсбурге 28.01.1981) (вместе с Поправками к Конвенции о защите физических лиц при автоматизированной обработке персональных данных (СДСЕ N 108), позволяющими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ообществ, принятыми Комитетом Министров в Страсбурге 15.06.1999) .

② 26 个白名单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英国、匈牙利、德国、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芬兰、法国、捷克、瑞典和爱沙尼亚。

③ “俄罗斯如何强化网络主权保护？”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721860251552624&wfr=spider&for=pc>, 访问日期：2022 年 3 月 23 日。

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区别不同的情况对信息权属作了进一步明确：提供资金创建、依法获得、通过赠与或继承接受的文件的自然人或法人，是文件的所有者（如果用联邦预算而依法获得的，所有者也可以是国家及各联邦主体）。同时，该条还规定有关信息资源所有权的关系根据俄联邦民法调整，^①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民法中暂未有对个人信息所有权的单独规定。^②俄罗斯大部分学者认为，所有权的界定是保障财产权属的基础，数据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是数据交易必须予以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数据所有权归属的重点是要确定个人数据所有权的主体。《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对于信息主体已作了明确规定，但尚未对个人数据的法律属性予以说明。目前俄罗斯主流学者基于信息资源是资产的一部分，认为未来关于个人数据法律属性的划定可借鉴信息权属属性；他们主张个人数据具有财产属性，个人数据同其他信息与数据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能将数据权属单独地界定为独立的人身权，也不能认定其具有类似知识产权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混合的双重法律属性。^③

《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第 11.4 条对数据处理许可及告知制度进行了规定：“非国家机构和私人从事有关个人资料处理和向使用者提供个人资料的活动，应经过必需的特许（申请许可证及申领执照）。”该法规定了信息拥有者、信息系统运营者需要承担的信息保护义务，包括预防非法获取信息和（或）将其传递给无权获取该信息的人员；及时发现非法获取信息的事实；对违法获取信息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警告；不得采取破坏信息处理设备和手段功能的行为；迅速恢复因非法获取而被异化和销毁的信息；经常检查信息保护水平。

2006 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旨在保障公民个人数据处理中的权利和自由，并对个人数据的跨境转交提出了同等保护的要求。该法与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7 июля 2006 г. N 149-ФЗ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 о защите информации».

② Мажорина М.В. О коллизии права и “неправа”, реновации lex mercatoria, смарт-контрактах и блокчейн-арбитраже// Lex russica. 2019. No.7. С.93-107.

③ Вершинина. И.А. Данные в цифровом мире: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л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риски?// 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2020. Vol.20. No.4. С.977-984.

1993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秘密法》、2004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商业秘密法》共同构成了限制获取数据信息的法律规制体系，范围涵盖国家和商业秘密信息及数据。根据《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第9条，为了保护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度体系，维护道德、保护公民权利以及保障国防和国家安全，可以中止或者限制个人数据跨境转交行为。

个人信息安全是近年来全世界关注的热点，俄罗斯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也非常严格。从数据本身的内容来看，个人信息属于合法的数据信息，因此对此类数据的管理主要是从行为角度进行规范。^①2021年3月，俄罗斯数字产业部开始修订《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其中拟规定个人数据匿名化需用户同意。根据俄罗斯数字产业部提出的修正案，个人数据的匿名化只能在获得个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在俄罗斯联邦法律所规定的个人数据领域中的某些情况下才能进行。《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修正案规定，企业能够自由处理匿名数据。同时，为了确保对俄罗斯个人数据的保护，对处理数据的运营商施加了一些限制，例如，数据运营商将无法对特定个人数据进行操作及处理，以保护个人数据所有权。除匿名数据外，还禁止将信息传输给特定的第三方；除非需要保护人类生命或健康，否则将禁止对数据进行匿名处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在个人数据所有权与其处理规则的二元关系中，出入公共场合是否需要强制性出示“防疫二维码”，在俄罗斯学术界与法律实务界有着广泛争议。有律师和普通公民因被强制要求出示二维码，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并向检察院提出上诉，认为这与《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俄罗斯联邦宪法》相违背。但俄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在共同威胁出现之前，行动自由的权利与个人信息的保护，侧重于社会自我治理；但在面对威胁的情况下，个人信息自决权需要给国家与公共利益让路，在疫情环境下强制性要求出示“防疫二维码”，不涉及侵犯公民权利。

《俄罗斯联邦主权互联网法案》于2019年11月1日生效，该法突破了传统网络安全立法的框架，重塑了俄联邦网络治理的法律规范。该法基于美国网络霸权背景而提出，就域名自主、定期演习、平台管控、主动断网以及技术统筹五个方面，构建起俄罗斯以保护数据主权为目标的网络安全体系。

^① 米铁男：“俄罗斯网络数据流通监管研究”，《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1期。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28 章规定了信息与数据领域犯罪的刑事责任（第 272-275 条）。《俄罗斯联邦行政法典》第 13 章规定了通信和信息领域犯罪的行政责任（第 13.1-13.24 条），其中包括违反拒绝向公民提供信息的行政责任（第 5.39 条）、违反隐瞒或歪曲数据信息的行政责任（第 8.5 条）、违反采取非法行动获取和（或）传播构成信用记录的信息的行政责任（第 5.53 条）等。《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规定了处理和保护雇员个人数据的一般要求，以及这些数据的存储条件和使用程序。除此之外，俄总统令《关于在使用国际信息交换的信息和电信网络时确保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的措施》《就“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个人数据处理规范”对俄罗斯联邦系列法律的修正案》《〈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修正案及个别互联网信息交流规范的修正案》《俄罗斯联邦澄清部分关于信息和电信网络联邦法律中适用处理个人资料程序的修正案》等其他规范性文件，也涉及对数据流动的监管与保护。

总体来看，具有强制性的数据监管模式，成为俄罗斯规范数据流动的主导方向。俄罗斯的数据本地化与数据跨境传输的控制措施，目的是维护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俄罗斯数据安全具有基础性与牵连性的特征，俄罗斯采取的数据流动本地化原则是服务于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俄罗斯政府通过强化立法来保障数据安全，其立法不管如何调整数据流动的存储模式，都绕不开数据主权这一核心问题。俄罗斯政府通过施加严格的法定义务，实现了对企业的数据存储、处理、跨境传输等环节的全面控制，从而掌握了本国数据流动与监管的主动权。

二、俄罗斯数据跨境流动的立法特点

目前，全球对于数据流动监管尚未形成统一的规则和方案，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数据监管制度。各国在选择数据流动监管制度上受地缘政治、国家安全、隐私保护、产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本地化两大基本监管制度。^①

^① 金善明：“跨境数据流动法律风险防范与规制”，《中国对外贸易》，2016年第6期。

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基于数据主权的安全需求与立场，制定了数据本地化的监管措施，表现为跨境与境内限制性措施相结合，既要求跨国企业在俄开展业务或提供服务时须在俄境内建立数据中心，也对数据存储和服务器地址提出本地化要求。

（一）绝对的数据本地存储模式

按照数据本地化的严苛程度，可以将数据本地化分为三种类型，即数据本地备份模式、可访问的数据本地存储模式和绝对的数据本地存储模式。这三种模式通过在不同程度上监管数据的存储、处理和访问，来限制数据的境外利用。^①

根据俄罗斯数据本地化存储制度的规定，将数据转移出俄罗斯之前，数据处理人必须确保接收国对个人数据提供足够的保护，数据接收人所在国需为《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约》成员国。2018年，俄罗斯更新了被官方认可为“确保充分保护”的国家名单。除了《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约》成员国外，截至目前还有26个国家被列入“白名单”。如果处理人向无法提供同等保护的境外主体转移个人资料，则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取得数据主体的书面同意；（2）俄罗斯联邦参加的国际条约关于签证事宜另有规定的，以及国际条约中涉及提供民事、家庭和刑事案件司法协助事宜另有规定的；（3）基于保护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度、保障国家安全目的所需；（4）履行数据主体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要求；（5）在不能取得个人数据主体的书面形式同意时，为保护其或者他人的生命、健康、其他重大生存利益。

可见，俄罗斯以维护数据安全为着眼点，确立了以数据本地化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措施，其目的是保障本国的数据主权与信息安全。

俄罗斯推行严格的数据存储本地化措施，要求在俄罗斯产生的数据只能在俄罗斯境内存储与使用，禁止向境外传输和从境外访问，拒绝数据国际共享，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跨境流动。俄罗斯通过极端的保护措施虽然维护了数据主权和国家利益，却制约了数据跨境流动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① 程昊：“从‘云幕’法案看我国数据主权的保护”，《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4期。

（二）有序的流动规则

允许数据跨境流动不代表允许数据无序流动，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背后应形成有序的流动规则。世界正进入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以数字驱动的新时代。互联网的全球扩张及对数据流动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在改变传统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形态，使数字产品和服务成为主要输出口。^①

数据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价值，但由于数据的自身特性，也会引发安全风险。数据的无序流动将对国家安全利益、监管框架及执法权造成挑战。国家利益的复杂性、价值观认同的差异性和国家间信任的缺乏，阻碍了各国在短期内形成数据流动规制的共识。究竟是推动“数据自由流动”还是实行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如何在安全和成长二者之间实现平衡，非常考验各国政府的数据战略思维和治理能力。俄罗斯将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数据权利作为数据有序流动的首要前提，认为只有将数据风险降到最低，才能有效保护数据安全。

《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通过内外两手保障数据的有序性，对内实行互联网跨境购物不受限与不损害个人隐私、不妨碍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外实行外企数据安全审查与限制搜索引擎。例如，俄罗斯以外国数字企业为监管对象，除要求外资企业实行本地存储数据外，还对搜索引擎进行了限制，规定搜索引擎要排除在俄境内发布该国所禁止信息的网络链接。

（三）“数据保护”的共识

在俄罗斯，“数据保护”已逐渐成为广泛共识。自“棱镜事件”后，俄罗斯不断加强数据领域的治理与监管，对各类数据收集人违规收集用户数据、滥用甚至贩卖用户数据等非法行为采取了严格措施。从数据跨境流动与个人数据权利两个层面实施保护措施。

在跨境数据流动层面，俄罗斯实行严格的管控制度，对不同国家的数据主体实行差异化的法律监管。例如，对于美国等主动型数据流动国家，俄罗斯以《俄罗斯联邦主权互联网法案》为基础，在全球首次立法，实施“主动断网”，以识别网络主权威胁；在保护数据主权的同时，孤岛维权式地反对

^① 朱德沛：“‘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数据本地化”，《河南工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网络霸权成为保护性特征的重要表现形式。面对新兴经济体保守型数据流动国家，俄罗斯采取较为柔和的监管态度，在实施数据本地化存储的同时，兼顾数据流动的对等性。

在个人数据层面，俄罗斯注重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在保障个人数据权利的同时，注重保障个人数据不被窃取、破坏和滥用，以及确保整体数据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由于个人数据隐私的属性很难界定，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与美国等国家有所不同，俄罗斯在加强对科技公司使用本国用户数据的监管与限制使用搜索引擎的同时，正研究制定向数字企业征收数字税的规范。

总体来看，俄罗斯的立法规定十分严格，通过对企业施加法定义务，实现了政府对数据处理、存储和跨境传输等环节的全面控制，牢牢掌握了本国数据跨境流动的主动权。

三、俄罗斯数据存留本地化

数据存留本地化是专门限制数据跨境传输的措施，包括禁止信息出境、跨境传输信息必须征得数据主体的同意、要求在境内留存信息副本、对数据输出征税等形式。^①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国情选择，各国关于数据的政策模式呈现出相互对立、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从全球来看，美国追求贸易利益，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坚定支持者，反对数据本地化措施，这也是其发展数字贸易的政策要求；欧盟支持对个人隐私有影响的数据采取本地化措施；俄罗斯基于本国网络安全、数据保护的监管目标，倡导与推行数据主权，采用数据存留本地化措施来限制数据跨境流动，通过相应立法对企业施加法定的义务，实现政府对数据存储、处理、跨境传输等环节的全面控制，将数据主权与网络安全视为国家战略，初步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跨境数据流动的俄罗斯模式。

“棱镜事件”后，俄罗斯加快了数据流动法律的修改，旨在全面限制数据流动，加强数据流动监管，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数据处理本地化的基本规则。

^① 孔庆江、于华溢：“数据立法域外适用现象及中国因应策略”，《法学杂志》，2020年第8期。

（一）数据本地化留存与处理规则

2014 年 5 月 7 日，俄罗斯发布联邦第 97 号法令——《<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修正案及个别互联网信息交流规范的修正案》；同年 7 月，俄罗斯总统签署联邦第 242 号法令——《就“进一步明确互联网个人数据处理规范”对俄罗斯联邦系列法律的修正案》，此法令也被称为“数据本地化法”。两部修正案对俄罗斯现行法律关于数据本地化留存与处理问题进行了修改。

修正案明确了信息/数据处理人的法律释义以及信息/数据主体的权利，指出处理人是指独立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处理个人数据，并能确定个人数据处理的目的、范围的国家机关、主管机关、法人或个人。其中，数据主体具有知情权，更正、中止、删除权，可携带权，被遗忘权，防止自动化决策权以及诉权。

修正案在《俄罗斯联邦关于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第 16 条第 4 款中增加了一项，要求信息拥有者、信息系统运营方有义务将对俄罗斯联邦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收集、记录、整理、保存、核对（更新、变动）、提取的数据库存放在俄罗斯境内。同时，在“互联网信息传播组织者的义务”中增加了境内留存的要求。修正案在《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第 18 条增加第 5 款，要求收集个人数据（包括使用互联网手段）时，运营商需要保证使用位于俄罗斯境内的数据库，方能对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进行收集、记录、整理、保存、核对（更新、变动）和提取。

2015 年 9 月 1 日，《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正式实施，对数据本地化处理进行了规定，要求除为履行国际条约或者法定职能、权限和义务、为诉讼或履行司法文书以及为从事新闻行业或个人创作等少数特例外，必须在俄罗斯境内的服务器系统中存储和处理涉及俄罗斯公民个人的数据。

这两部密集颁布的法令，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数据本地化留存与处理制度，明确了数据处理人所收集的俄罗斯公民的个人信息或数据，必须存储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服务器或数据中心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数据本地化留存与处理制度保障了本国数据主权，但在平衡数据安全与产业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有很大的提升和完善空间。

（二）数据处理告知义务

根据《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第 15 条的规定，处理人开始处理个人资料前，有义务通知保护个人数据权利的主管机构。第 18 条规定，数据处理者在处理数据前，要告知数据保护机关包含俄公民个人数据的数据库所在地的信息，并根据俄联邦法律，对违反联邦个人数据法的信息进行访问限制。

由此可见，上述数据处理人的告知责任，构成了相对严格的数据本地化与数据流动制度。俄罗斯推行数据本地化制度的根本要因，是担心本国数据向境外转移会有损监管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隐私保护、维护网络安全、便利执法等具体监管目标。而美国推行数据自由政策，认为数据本地化是限制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直接要素，会直接对数字贸易自由化形成政策性阻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2020 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继续将数据本地化措施视为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的主要壁垒。^①尽管美国的申辩存在夸大之嫌，但数据本地化制度作为数据监管手段所产生的副作用，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数据跨境流动，减损数字经济价值的实现。因此，处理好分离数据本地化存储与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四、俄罗斯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发展趋势

数据存储本地化与数据跨境监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数据存储本地化是针对数据安全而设置的规则，数据存储本地化并不意味着数据不能跨境流动，也不等于禁止数据跨境传输。《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第 12 条对个人数据的跨境流动作了安排，符合要求的可以进行跨境传输。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是基于数据有无涉及重要或敏感信息、是否关乎数据的安全与国家安全，而不是由数据本地化存储来决定的。而数据跨境流动的限制措施从本质上来看，是基于本国安全利益或者国内数据监管目标作出的选择。^②俄罗斯强力推行数据主权“本地化”，典型的表现是对跨境数据作出

^① 许可：“自由与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方案”，《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1期。

^② 田旭：“数据本地化立法的兴起与反思”，《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了严格的本地化存储规制。俄罗斯实施的严格数据本地化留存与处理规则，从监管角度来看，是将数据服务的市场准入与使用当地基础设施相挂钩，虽然其目的是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保护隐私与数据安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基于数据安全与主权设定的数据本地化要求本身缺乏约束，会严重阻碍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迫使部分数字产业离开俄罗斯。例如，2018 年 12 月，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要求美国社交媒体网站“推特”和“脸书”在法院规定的 9 个月时间内，将俄罗斯用户的网络数据库“本土化”。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推特”和“脸书”未就数据库本地化与俄方进行沟通。2019 年 4 月 16 日，莫斯科地方法院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每家企业处以 3000 卢布（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 310 元）罚款，并要求将俄罗斯用户的个人数据本地化存储。这一罚款金额是对违反相关条款进行处罚的最低罚款额。2020 年 2 月，因仍未将数据库本地化，莫斯科塔甘斯基法院再次对“推特”和“脸书”作出处罚，对每家公司处以 400 万卢布的罚款。2021 年 4 月，“字节跳动”公司因未遵守俄罗斯数据监管规定，拒绝删除相关内容，遭法院起诉，被罚款 260 万卢布。^①

俄罗斯除要求外资企业实行本地存储数据外，还对搜索引擎进行了限制，规定要排除在俄罗斯境内发布该国所禁止信息的网络链接。例如，2019 年，谷歌因未能从搜索引擎中删除违禁内容而被起诉，法院判决其承担行政责任，并处以 70 万卢布的罚款（已缴纳）。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根据后续监测记录，发现谷歌公司仍存在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行为，故该局以谷歌为被告再次提起行政诉讼。2020 年 5 月，法院对谷歌处以 150 万卢布的罚款。进一步的监测显示，谷歌的搜索引擎中仍存有约 30% 的包含俄罗斯所禁止信息的网络链接。根据《俄罗斯联邦行政法典》第 13.40 条第 2.1 款的规定，谷歌重复实施行政违法行为，构成累犯。2020 年 12 月 17 日，莫斯科塔甘斯基法院判决对谷歌处以 300 万卢布的罚款。除谷歌外，“推特”也曾因未按照法律规定，没有及时删除涉及吸毒、儿童色情和煽动未成年人自杀等非法内容的链接和帖子，被莫斯科塔甘斯基法院裁定违反

^① Суд оштрафовал TikTok на 1,5 млн рублей за отказ удалить запрещенный контент// ТАСС. 27 Мая 2021 г.

《俄罗斯联邦行政法典》，对其共处罚金 890 万卢布。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还宣布，因“推特”在俄罗斯未能遵守相关法规，即日起将“推特”在俄境内的服务速度降低。虽然俄罗斯法院对不遵守相关法律的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处罚的数额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忽略不计，这也表明了俄罗斯相关司法的逻辑：兼顾个人数据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双重目标，不采取过度具有倾向性的态度。虽然立法严格，但司法执行有回旋的空间。

由于数字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出现，俄罗斯在推行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存储规则的过程中争论不断，其中，反对严格与绝对化数据本地化存留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基于平衡数据本地化与数据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考虑，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莫兹卡（А. Мозка）认为，将跨国公司在俄罗斯境内建立数据中心作为进入市场的条件之一，阻碍了俄罗斯对接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他认为，在实行数据流动监管的同时，更要兼顾多元的数据合作管理模式和分级分类数据流动的监管制度。^①本文作者之一、莫斯科大学教授哈里托诺娃（Ю.С. Харитонова）同样反对严格数据本地化的做法，指出虽然数据中的关键信息关系到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要求数据本地化从保障国家安全层面来看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综观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条件，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存储会导致俄罗斯在吸引外资数字企业方面，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她建议在保障国家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避免陷入数据保护主义政策的怪圈，采取分离数据本地化存储和出境数据管制的关系，仅对特殊行业的重要数据实行严格的境内存储本地化要求。^②据此，俄罗斯也采取了不断修法以适应数字产业发展的立法技术。《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自 2006 年颁布以来，已经过 24 次修订，其中 2013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个人数据匿名化的要求和方法；2021 年 3 月再次针对个人数据匿名化进行修订，该修订提出个人数据匿名化需经用户同意的基本原则，这体现出俄罗斯在数字经济时代试图在立法方面与时俱进，以达到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①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02.06.2016 No 1083-п. <https://www.garant.ru/products/ipo/prime/doc/71318202/>

^② Харитонова Ю.С. Цифровые финансовы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для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ча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Право. 2021. No.39.

五、对俄罗斯数据流动与监管制度的反思

俄罗斯具有与欧美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基础，这决定了它会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建立信息化发展道路。俄罗斯始终致力于保持政治和文化的独立性，故此在政策和立法上表现出保守的特点。加上俄罗斯饱受其他国家网络恐怖主义的危害，对网络安全事件更为敏感，因此在法益权衡方面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而且在数据信息立法中更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持守。^①根据上文的研究，本文在此进行初步的总结与反思。

第一，俄罗斯采用孤岛式数据保护是国家利益至上的表现，但未必适合其他国家。俄罗斯在数据主权方面开展网络空间法律体系构建与规则重塑，以数据监管本地化为核心出台的《俄罗斯联邦个人数据法》，构建了数据保护的规则框架，强化了对数据主权的维护。俄罗斯推行孤岛式的数据保护，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国家数据主权和网络安全，但难以平衡数据本地化与数据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分离了国内利益法治观和国际利益安全观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俄罗斯同为新兴经济体，在数据存储方面采取相近的监管规则，但细节有所差别。应该说，俄罗斯在保障网络安全与促进网络独立运行上，为他国提供了技术与法律的借鉴空间。尤其是在俄乌危机背景下愈演愈烈的网络战，使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又一次回到全球视野。拥有独立的网络主权和集中管理的网络设施，是一国预防他国网络攻击和网络制裁、保障国家网络安全与数据主权的关键。因此，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在平衡数据流动与数据保护的逻辑关系时，应以积极的数据流动规则监管重要数据的流动，以法律规制平衡数据安全与数据流动的二元关系。

第二，立法需采取多元的数据合作管理模式和分级分类数据流动的监管制度。由于个人数据与重要敏感数据涉及的风险和所需保护的法益各有不同，许多国家都在尝试分级分类监管的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监管模式，确立宽严不同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政策。^②俄罗斯数据立法不断修订的过程体现的是：顺应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有序推动跨境数据流动与加强数据

① 米铁男：“俄罗斯网络数据流通监管研究”，《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1期。

② 方元欣：“数据本地化政策的全球博弈分析”，《中国信息化》，2019年第12期。

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有机统一。但还不理想，俄罗斯对于数据处理仍采用一刀切的模式，未实现多元数据合作管理处理手段，现行的数据存储制度也未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绝对的本地化存储不利于产业发展，需要辩证平衡数据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不同级别类型的数据存储与监管需区别对待。^①中国在数据管理模式上，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数据方面，可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实现多元数据合作管理模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内容与数据管制，确保对重要与敏感数据采取透明化与分级化监管措施。

第三，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流动并行不悖。通观俄罗斯立法历程不难发现，其通过完善个人信息的保护标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等运营商和各类网络企业收集、处理、传输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确保数据流通过程中个人的合法信息权利得以实现。虽然俄罗斯数据立法遵循国家法治利益至上的原则，但不代表其忽略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事实上，俄罗斯通过不间断的立法修改，较好地保护了其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

第四，俄罗斯数据流动立法多元化、精细化体现法治优先。俄罗斯不断推进与实施数据流动与监管的相关立法，涉及网络主权与数据保护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呈现“两大类、双层次”的多元分布特征，在传统部门法、专项法律和政策性文件中均有体现。俄罗斯数据流动立法精细化体现在理顺宪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传统部门法与专项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一般性法律与特殊性政策文件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俄罗斯的数据立法规范较中国更为多元与精细，中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过程中，可汲取俄罗斯立法经验，理顺数据立法的内在逻辑与关系。

综上所述，俄罗斯对数据流动立法实现了多元化与精细化，在法治优先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更新。俄罗斯基于政策和技术博弈的综合考量，为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和数据主权，推行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存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数据主权，确保了国家网络安全。但与此同时，孤岛式的数据保护是一种需要改进和完善的立法模式，因其容易陷入数据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陷阱，更容易牺牲数据的实用价值。

^① Вайпан В.А. Основы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циф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Пра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17. No.11. С.5-18.

【 Abstract 】 Data sovereignty is the latest embodiment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which is related to core areas of national security such as data flow and supervision in cyberspace,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data storage space. As a basic strategic resource, data is vigorously promoted to flow so that countries could obtain strategic benefits. However, required by data sovereignty, there are various risks of data security supervision and personal privacy protection behind the cross-border data flow. In recent years, considering its special cyber security, Russia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its data sovereignty and cyber security, tightening its control over data. Meanwhile, Russia has spared no efforts to build legal systems and rules in cyberspace, adhering to strict localization principle of storage. While maintaining Russia's data security and personal data rights on the one hand, these isolating data protection modes,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limited the advancement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 on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Russia's Data Sovereignty, Russia's Data Localization, Russi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данных – это новейшая эволю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с основными областя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акими как поток данных и контроль в кибер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защита ли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а также места хранения данных. Данные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ресурс позволяют странам активно продвигать поток данных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выгод. Однак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данных за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м потоком данных стоит множество 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таких как надзор з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данных и защита личной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ости.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исходя из своих уникальных соображений сете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я продолжила укрепля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данных и сетев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жесточила общ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данными, осуществила создание прав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кибер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выработала правил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данных, а также внедрила принципы строго 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хранения. Эти меры защищаю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данных и права России на личные данные, но такая островная модель защиты данных также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роль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го потока данных для содейств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данных,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данных в России, защита ли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空间观念与国家认同

从地理形象的重塑看俄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

徐乐**

【内容提要】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地理形象建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前者对后者起文化定位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从后者寻找实证主义的客观证据。18世纪前俄罗斯的地理认知全盘接受西方古典的世界三分图景，以顿河为界划分欧亚大陆，表明莫斯科不承认欧洲的文明优越性，也未赋予欧亚分界以文化和政治含义。彼得大帝的改革承认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差异，模仿欧洲殖民帝国的制度设计，将欧亚边界东移至乌拉尔山脉，塑造对标欧洲的“宗主国-殖民地”帝国二元结构。法国大革命和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的尼古拉政府扭转了国家意志层面的欧洲文化认同，以探索俄罗斯独特道路的名义将俄国与欧洲对立起来，同时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界仍保持着与欧洲共同命运的感觉，但颠倒了原先的价值等级，将自己视为欧洲的拯救者。克里米亚战争则让俄国全社会都感觉到西方的敌意，知识精英渴望摆脱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试图取消欧亚大陆的分界，建构与西欧世界分庭抗礼的斯拉夫民族的独立世界；这一世界图景被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者继承，也成为苏联解体前后建构俄罗斯民族或俄罗斯文明统一体的地理基础。

【关键词】俄罗斯文明 俄罗斯地理空间文化 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 俄欧关系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108(20)

俄国地处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与此相关在文化选择上的“钟摆现象”^①，一直以来是俄国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的话题。目前的研究往往在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范畴内，将俄国文化发展归结为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的西伯利亚书写研究”（项目批准号：21BWW037）的阶段性成果。

** 徐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

①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96页。

这两股思想矢量“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①的争论和交融过程，及它们在俄国民族意识和文明认同中造成的困惑和分裂。苏联解体前，关于俄国与欧洲、亚洲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问题，在意识形态的根源上得到国际学界的充分而深入的讨论。^②然而，一切民族的历史根基都是这个民族生长于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正如俄国侨民历史学家韦尔纳茨基（Г.В. Вернадский）所言，“所有文明一定程度上都是地理因素造成的结果”^③。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多样性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俄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从地理维度考察俄罗斯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文化取向和意识形态建构，迄今显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④

应该承认，俄国的文化定位与其地理定位密切相关，目前的地缘政治研究往往将乌拉尔山脉作为传统的历史-地理边界，将俄国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大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俄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反复摇摆。可是，若

① 刘文飞：《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

② См. Гольдберг А.Л. Дитер Грох отлучает Россию от Европы//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3. №.5. С.208-212; Reinhard Wittram, *Russia and Europe*, trans. Patrick and Hanaluise Dor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Mark Bassin, “Asia”, in Nicholas Rezhevsky,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Russia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7-84; Nicholas Riasanovsky, “Russia and Asia: Two 19th Century Views”, *California Slavic Studies*, 1960, Vol.1, pp.170-181; Idem, “Asia through Russian Eyes”, in Wayne S. Vucinich, ed., *Russia and Asi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2, pp.3-29; E. Sarkisyanz, “Russian Attitudes toward Asia”, *Russian Review*, 1954, Vol.4, pp.245-254. 另参见安启念、冯绍雷、姚海等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③ [俄]沙波瓦洛夫著：《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胡学星、王加兴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④ 据瑞典斯拉夫学研究学者马克·巴辛（Mark Bassin）对现有资料的整理，苏联时期颇有创新性地谈及俄国地理形象问题的学者是拉迪斯·克里斯托夫（Ladis Kristof），See L.K.D. Krist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ole of a Nation in Spac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9; Idem, “The Russian Image of Russia”, in C.A. Fisher, ed., *Essay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Methuen, 1968, pp.345-387; Idem, “The State-Idea, the National Idea and the Image of the Fatherland”, *Orbis*, 1967, Vol.11, pp.238-255. 近年来在俄国文化地理学研究上成果较多的俄国学者是扎米亚京（Д.Н. Замятин），他将俄国的地理学形象定位为“北方欧亚的核心形象-语境”，См. Замятин Д.Н. Вообразить Росси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бразы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азии// Космополис. 2008. №.3. С.33-40; он же. Геократия. Евразия как образ, символ и проек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09. №.1. С.71-90. 巴辛在《剑桥俄国史》中从民族身份的自我建构角度论证了俄罗斯帝国与欧洲的认同关系，其中也有对地理因素的研究，See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5-62.

是在全球知识更新和俄国启蒙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俄国境内的欧亚边界，便会发现，以乌拉尔山脉划分欧洲和亚洲的权威地位远非无可争议。事实上，纵贯俄国境内的欧亚分界线曾经历过数次变化，且每次变化都与俄罗斯的帝国理念和目标的重新设定形成积极的互动——从莫斯科公国对蒙古帝国专制统治遗产的继承，到彼得大帝的锐意西化，以及戈尔巴乔夫“欧洲共同家园”的愿景，和后苏联时代普京的艰难转向。正是在地理观念的变化过程中，俄国的地理“占位”亦经历了在欧亚之间反复移动的现象。而且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俄国归属欧洲或亚洲的主观判断，被认为正是由自然世界本身的物理性质所设定的客观标准决定的。

一、18 世纪前西方与俄国的古典世界图景

古希腊地理学家依据他们当时所掌握的地表的物理外形，将世界分为三块各具独立完整地形的大陆——欧洲、亚洲和利比亚（非洲），希腊被绘制在地图的中心。尼罗河和地中海作为天然的分界，使得地中海南部的利比亚与亚、欧两洲的划分比较清晰。将亚洲与欧洲分割开的水路——沿爱琴海北上，经由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直到黑海和亚速海（更古老的传统是经高加索山脉后抵达里海）——也不易出现争议。但亚速海以北到北冰洋之间的广阔陆地则因当时地理知识的匮乏而被压缩为一条地峡，在想象中，顿河笔直地穿越这块狭窄的土地，从而成为划分欧洲和亚洲的北段边界。由此，亚、欧、非三大洲结构被古代地理学家们建立并一直保持到中世纪早期。

18 世纪前，莫斯科公国的文士们对西方的地理文献十分熟悉，16-17 世纪之间在俄国出现的一些最初的地理学著作，实际上是西方资料的汇编。^①因此，莫斯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世界大陆的古典三分法，随同一起接受下来的还有以顿河为界对欧洲和亚洲的划分。虽然毫无疑问当时的俄国人比西方学者更了解关于自己领土的地形学知识，早就知道黑海和亚速海北岸到北极海岸之间有着极为辽阔的陆地空间，而且顿河是一条体量不

^① См. Соболевский А.И. Перевод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Руси XIV–XVII веков. СПб.: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903. С.45-47, 52-78; Лебедев Д.Н. География в России XVII века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эпохи). М.; Л.: АН СССР, 1949. С.209.

算很大且蜿蜒曲折的河流，并不适合充当理想中清晰整齐的欧亚分界。总体而言，来到俄国的少数早期西方旅行家和俄国人自己已经意识到古典时代世界地理图景的缺陷，但仍然遵从其权威性，不顾这一图景明显有违于现实世界。因此欧亚分界的问题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但尤为让现代人惊异的是，这种以顿河为界的欧亚划分方式，将东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核心区的一大部分，即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①归入了亚洲。俄国人并不在乎自己与欧洲截然分开和一半归属亚洲的身份，其原因在于，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基本上从未承认过欧洲文明优越论的意识形态，“孤立的、沉浸于自身的、患有过度恐外症的莫斯科公国，把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源头归结到拜占庭，绝不把自己看作是欧洲的一部分”^②。而 1439 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教会会议上通过了东正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联合的决议后，拜占庭正教的权威在罗斯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同时，东正教罗斯作为世界上基督教真理和纯正东正教唯一保有者的民族自负得到极大提升，相信罗斯所信奉的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基督教。随即，罗斯修士适时向沙皇上书，提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意识形态信念。帝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О. Ключевский）总结说，至 16 世纪，“在俄罗斯社会中已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莫斯科是俄罗斯领土的统一者，是整个东正教东方的中心和支柱”^③。因此，在彼得大帝改革前，“在整个俄国社会，甚至在它的特别受西方影响的领导圈子内，普遍存在着一种对西方的怀疑态度”^④。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自 14 世纪起赋予欧洲地理区域越来越浓厚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并且日益将自己在科学技术和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受上帝

① 被划入亚洲的地区甚至包括下诺夫哥罗德，这座城市在莫斯科公国历史上有着悠久历史，在混乱时期起到阻止外敌入侵的关键作用。关于下诺夫哥罗德被纳入俄罗斯核心圈内部的历史问题，参见 Leonid Gorizontov, “The ‘Great Circle’ of Interior Russia: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mperial Center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Jane Burbank, Mark von Hagen, and Anatolyi Remnev, eds., *Russian empire: space, people, power, 1700–193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76.

② Бассин М.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Под ред. Верт П., Кабытов П.С., Миллер А.И.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5. С.280-281.

③ [俄]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第 3 卷）》，左少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56 页。

④ 同上，第 315 页。

眷顾的选民的精神优越感。^①到 19 世纪初,欧洲人认为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治理最有成效的地区,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地球上其他所有大陆的文明典范。英国著名教会学者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收集和出版了大量世界旅行书籍,借此信心十足地宣称:“欧洲的品质胜于它的体量,在体量上它屈居世界末位,可在品质上它冠绝全球。”^②然而,这样的西方优越论在罗斯土地上并未得到承认。因为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唯有罗斯教会继承了基督教的东方正统;同时,俄国人对西方启蒙时期的科学和理性持怀疑和傲慢态度,认为世俗科学败坏了信仰之光。总体而言,18 世纪前,欧洲或亚洲、西方或东方的地理事实并未被赋予特别的价值论等级,欧亚边界的划分只是属于中性的物理-地理学术范畴内的问题。

二、彼得大帝的改革与西方帝国殖民地理的确立

可是,在彼得大帝改革前期,西方的文化优势在俄罗斯开始抬头。由于旧的封建采邑制度无力面对国家统一的新任务和西方竞争对手的挑战,莫斯科公国政界和思想界逐渐失去原先的民族自我陶醉心理,不得不从自己的西方邻居那里寻找治理国家的经验。而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明显地暴露出,在西欧面前,罗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贫乏,随之进一步加深对自身落后的认知。伊凡雷帝时期在莫斯科雅乌扎河沿岸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居留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输送作用。来自欧洲各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们聚居于此,以其富足的生活、繁荣的贸易、自由的风俗连同先进的军事和工业技术,吸引了贪图享乐的莫斯科上层社会的好奇和热烈追捧。沙皇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几位亲贵,包括彼得大帝本人,都在德意志文化圈内饱受西欧风习的浸染,有力地促成了后来改革派中坚接受西欧知识和观念的过程。

18 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深刻地扭转了俄国看待西方的观点,由此确认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这种差异对于俄国认同的崭新意义。彼得

^① See Denys Hay, *Europe: The Emergence of an Ide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73-95.

^② Бассин М.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280.

大帝全力以赴欲确立的新意识形态，要求承认欧洲文明的绝对权威，强迫俄国从国家体制到生活方式实现全盘欧化。俄国哲学家津科夫斯基（В.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说，在 18 世纪的时候，“俄罗斯的心灵充当了西方的俘虏”^①，“所有人都是西方主义者”^②。新的欧洲精神也要求并导致俄国的地理位置和与之相关的地理形象发生变化，民族理念和价值认同只有落实到秩序化的管理结构中去，才能真正统摄国家意识对世界的物质地理层面的划分，定义欧洲和亚洲各自的价值等级，确定它们之间的边界，以及重新规划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占位”。

1721 年彼得大帝率领俄国军队战胜瑞典后，在新都圣彼得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仪式。在这场被精心设计的、戏剧化的庆典上，莫斯科公国正式放弃了“公国”（царство，或译为“王国”）的古称，宣布建立一个符合欧洲模式的殖民“帝国”（империя），而彼得大帝的称号则在传统的“沙皇”（царь）和“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头衔之前，意味深长地加上“皇帝”（император）封号。^③《剑桥俄国史》的作者之一，瑞典斯拉夫学家巴辛指出，“帝国”和“皇帝”来自西欧的拉丁文词汇 imperio、imperator，而非本土斯拉夫词汇，此处的用词选择暗示俄罗斯有意改变自身的文化认同，重塑国家的地缘政治结构。须知俄罗斯的帝国属性并非新鲜事物，此前数个世纪，俄罗斯在实质上已经具备明显的帝国特征，且自己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但此时将自己对标欧洲帝国的决心却十分新鲜，展现出这个野心勃勃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以欧洲化为精神内核的制度设计蓝图，因而也在根本上改造了俄罗斯国家的地理形象，以此创造出更有辨识度的欧洲帝国形象，给缺乏有效管理的众多民族的广大聚居地制定严格的秩序。^④

众所周知，西欧列强作为海上殖民帝国，其帝国内部的空间被明确区分为帝国中心（宗主国）与被征服的殖民地疆土，中间一般被大型水体所造成

① [俄]津科夫斯基著：《俄国思想家与欧洲》，徐文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年，第 30 页。

② 同上，第 33 页。

③ См.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Н.А.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Петра I. М.; Л.: Изд. АН СССР, 1945. С.155.

④ See Dominic Liev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p.46.

的实际的物理屏障分割。并且，由于宗主国处于欧洲，殖民地分布于非洲、亚洲和美洲，这种在不同大陆的自然占位进一步强化了帝国内部二元对立的地理结构。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是沿东欧平原和亚洲北部延伸至太平洋的、连绵不断的辽阔地理空间，由于此前莫斯科公国并不认可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所以欧亚边界的模糊不清并未引起特别的忧虑；但彼得改革开始后，力图对标欧洲帝国来打造自身的俄国，立刻就敏锐地感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痛点：若是没有明确的欧亚分界，俄罗斯帝国便不可能按照欧洲帝国模式也分为欧洲宗主国和亚洲殖民地；更何况若是把顿河视为欧亚分界，则无论是传统的帝国核心区，还是乌拉尔山以西新近被征服的领土，都无法得到欧洲文明的安抚。按照帝国历史和当下的统治需求绘制一条新的明确的大陆分界线，将有助于建立客观的自然-地理框架，为俄罗斯与欧洲的亲缘关系提供无可争议的客观物理证据。于是，为改革后的俄国版图制定新的、与俄国人的欧化观念相适应的地理框架，在彼得大帝时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完成这一任务的人是彼得改革主要理念的设计师之一，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塔季谢夫（В.Н. Татищев）^①。受沙皇委托，他首先在 18 世纪初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一系列革新的基础上，着手对早期的地理学勘探进行核查。他发现，17 世纪和之前，俄罗斯的地图和空间感知是零碎而原始的，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受教育阶层更熟悉的俄国西部，对自己的东方领土则未予以充分的重视，结果这些早期勘探和制图所呈现出的国家地理画面也缺乏完整的规划。塔季谢夫坚持认为，“俄罗斯帝国不仅仅居于欧洲，它还拥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亚洲”^②。只有掌握了关于本国全境更完整的知识，才能确定国家的身份归属。并且，他在改革的时代精神中强调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断言这块大陆“在富足、科学、力量和荣耀，以及空气的温和性方面，毫无疑问……占尽上风”^③，因而强调了俄国对欧洲的价值认同，和自身欧洲部分相对亚洲部分的文明优势。然后，塔季谢夫否定了亚欧大陆间的沿不同水路的分割方案，断然将分界线向东推移到乌拉尔山脉，认为这样划分亚

① Лебедев Д.Н. География в России XVII века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эпохи). М.; Л.: Изд. АН СССР, 1949. С.315.

② Татищев В.Н.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по ге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и.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С.112.

③ Татищев В.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 Наука, 1979. С.271.

欧大陆才是符合俄国的欧洲帝国身份的“更体面的和更自然的方式”^①。在乌拉尔山脉的南端，大陆边界沿乌拉尔河延伸到里海，随后转向西南沿高加索山脉延伸到亚速海和黑海。至此，塔季谢夫仿照欧洲帝国的二分法，极力强调俄国欧洲和亚洲部分的环境差异，断言这两块地域没有任何物理和文化性质的亲缘关系，并赋予它们相互隔离且对称分布的地理特征，从而构造出宗主国-殖民地的帝国版图二元框架。

乌拉尔山脉在俄国的古称是“大地带”（Великий пояс），它将俄国领土纵向切开为亚洲和欧洲两个大小不等但相互对称的部分，这一地理标签完成了对国家地理空间的观念重组，奠定了欧洲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评判方式的基础。自此，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殖民地扮演了一个在地形、气候、植物、动物、人种、文化和社会组织方面具有绝对异域性质的“他者”角色——巩固了俄国传统核心区的欧洲身份认同。在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18世纪，17世纪方才纳入版图的西伯利亚和其他亚洲土地，被俄国人通过西欧帝国主义的视角来感知，它们几乎与俄国的欧洲部分完全隔绝，仿佛是一个个“海外的附属国”^②。当时的报刊以西欧帝国海外殖民地的名称指代西伯利亚，称之为“我们的秘鲁”“我们的墨西哥”“俄国的巴西”“我们的东方印度”。^③而俄国作为欧洲文明的承担者，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绝对高于亚洲各族人民，因此担负起向亚洲殖民和启蒙愚昧野蛮民族的“天命”。

到19世纪初，欧洲的风尚和习俗已经在俄罗斯的知识阶层根深蒂固。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后，俄国军队踏入巴黎，士兵和军官的爱国主义情绪与全欧洲统一的意识交织在了一起。维也纳会议后，亚历山大一世主导与欧洲列强签署《神圣同盟法案》，他的财政部长起草欧洲“金融和贸易联邦体系”和欧洲“联邦货币”的工程方案，这些文件都力图推进欧洲各国人民成为“基督教名义下的统一的人民的成员”^④。与此同时，秘密的政府反对派

① Тагишев В.Н.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по географии России. С.156.

② [英]J.P.T. 伯里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18页。

③ See Mark Bassin, “Inventing Siberia: Visions of the Russian Eas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1, Vol.3, p.770.

④ Цимбаев Н.И. Европеизм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К пониманию 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а и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Т.4 / Под. ред. Л.Д. Дергачева и др., М., 2003. С.444.

也完全赞同融入欧洲共同命运的理念，十二月党人即意识到自己参与了全欧洲的革命运动。自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许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都赞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诏书中所宣称的“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强国”，虽然这一示威性的宣言尚未达到全社会的共识——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国内外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俄国人的国家欧洲认同和与西方的共同使命感，产生了严重的侵蚀作用。

三、权力与知识精英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造

法国大革命使得俄罗斯第一次有意识地面对“欧洲问题”，它动摇了俄国人对理性、文明、进步的信仰和历史乐观主义幻想，产生了“关于西方最初的沉痛思考”^①。欧洲大陆以理性原则为基础创建符合道德的生活的狂热努力，却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残酷屠杀。十二月党人起义即是波及全欧的大革命在俄国的余韵。起义失败后登基的尼古拉一世彻底扭转了政府对待西方的思想情绪，在他那份著名的 1826 年 7 月 13 日诏书和侦讯委员会做出的报告中，宣称“十二月党主义”是“从外部输入的传染病”，“这种阴谋既不容于俄罗斯的天性，也不容于俄罗斯的习俗，……俄罗斯的心过去和将来都是它无法触及的”^②；从而在官方意识形态上破坏了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向欧洲普世原则的融入，也破坏了缔造欧洲帝国意识和帝国文化的工程，将专制的俄国与“腐朽的欧洲”彻底对立起来。作为对十二月党人起义、社会改革要求的回应，也是应对时代精神的挑战，尼古拉一世的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С.С. Уваров）构建“东正教、专制和人民性”^③三位一体公式，为俄国政体提供了理念基石。“官方人民性”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报刊记者和大学教授们的热烈讨论，不但被引入学校教材，而且被“时代首席剧作家”库科尔尼克（Н.В. Кукольник）呈现在戏剧的舞台上。^④

① [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 35 页。

② Цимбаев Н.И. Европеизм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К пониманию 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а и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С.446. 这里的“外部”指西方的革命运动。

③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Народность.

④ См. Цимбаев Н.И. Либералы сороковых годов//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XIX века. Т.4. С.171.

1832年，教育部长的密友、俄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波戈金（М.П. Погодин）开始在莫斯科大学授课，他用俄国军队和人民战胜拿破仑的例子，证明俄国对欧洲的优越性。在他对俄国历史的简短阐述中，亚历山大与尼古拉两个时期的王朝之间有一场深刻的转折，正是以欧洲为导向的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导致了12月14日的“阴谋”和“政变”，标志着“俄罗斯历史的欧洲时期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尼古拉皇帝统治下的本国人民的（民族的）时期的开始”^①。在他著名的《彼得大帝》一文当中，他继续强调彼得大帝开创的欧化俄罗斯传统的不可延续和不可接受，断言：“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驾崩的俄罗斯历史阶段应该被称为欧洲阶段。……自尼古拉皇帝起——他的大臣在自己那个俄罗斯三字诀公式中、在东正教、专制之后写上了人民性，——自尼古拉皇帝起，……正在开启的是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民族的阶段，……”^②

乌瓦罗夫和他的保守主义同道们将东正教会和专制制度美化为俄国民族性的体现，并视这个三位一体为俄罗斯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积极的历史成就，认为它们使得俄罗斯与衰老的西方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可消弭的差异。这种官方人民性理论对俄罗斯古代和未来的颂扬，受到思想界内部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反对派的坚决抵制。在此最有代表性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战军官、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密友恰达耶夫（П.Я. Чаадаев）。1823-1826年，恰达耶夫在欧洲游历，西欧各国对于俄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使他深受震动。1829年，恰达耶夫写出第一封《哲学书简》，严厉批评俄国的封闭和落后：

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

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

^① Погодин М.П. Историк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трывки.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Августа Семенова, 1846. С.34.

^② Погодин М.П. Историко-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трывки. С.359.

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恰达耶夫虽然批判官方的民族自大情绪，但他也以一种近乎羞辱民族意识的方式，同样不再承认俄罗斯和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命运，尼古拉一世的意识形态官僚力图塑造的俄罗斯不同于欧洲的国家认同终于开花结果，最终击败了俄国西方主义思想对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的信仰。在俄国启蒙思想的阵地，曾因刊登《哲学书简》而遭查禁的《望远镜》杂志 1836 年第 1 期和第 2 期上，主编纳杰日金（Н.И. Надеждин）连载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对待俄国语言文学的态度中的欧洲主义和人民性》，其中依靠乌瓦罗夫的人民性理论，歌颂“俄罗斯的拳头”（русский кулак），把它与欧洲文明的成就对立起来，并且把“俄罗斯的拳头”看作“伟大帝国的独具一格”的基础。^②纳杰日金的倒戈极具代表性，它标志着“俄罗斯-欧洲”文明成就对立观念的形成。探索特殊的俄罗斯道路的理念深刻进入了 19 世纪俄国的民族意识。

恰达耶夫对俄国历史的悲观主义态度，对俄国人民的不信任，引起其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后者虽然也不接受乌瓦罗夫、本肯多夫^③等对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赞颂，但也坚决不同意恰达耶夫关于俄罗斯民族的非历史性论断——依然大声疾呼俄罗斯与欧洲共同命运的愿景。只是这时他们对欧洲、俄欧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反转：欧洲从文明的发源地变为保留伟大记忆的“墓地”，俄国对欧洲的倾慕变为对欧洲的“拯救”。可以说，19 世纪上半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尼古拉一世驾崩，虽然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界普遍谈论欧洲的“迷误”和“衰退”，但仍对西方怀有热爱和同情，并未表现出幸灾乐祸或者弃之不顾的情绪。哪怕是斯拉夫派领袖基列耶夫斯基（И.В. Киреевский）深知当时的“道德堕落状况、缺乏信念、普遍的利己主义”^④令

① [俄]恰达耶夫著：《箴言集》，刘文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 页、第 13 页。

② См. Цимбаев Н.И. Либералы сороковых годов. С.175.

③ А.Х. Бенкендорф, 俄国秘密警察首脑和宪兵司令。

④ [俄]基列耶夫斯基：《答 А.С.霍米雅科夫》，载[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3 页。

欧洲的所有精英都深恶痛绝，也依然宣称：“我到现在仍热爱西方，千丝万缕的同情感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①这种同情的基础即是双方共享的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理想，只有在基督教精神中与西方民族统一起来，俄罗斯才会是“一个全人类的民族”。基列耶夫斯基总结道：“对欧洲文明的热爱，以及对对我们文明的热爱，——二者在自己发展的最后阶段上会融合为同一种爱和同一种对生动的、因此也是全人类的和真正基督教文明的渴望。”^②津科夫斯基后来解释说：“欧洲文化所具有的那一普世主义原则与欧洲生活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联系，这一普世主义原则源于基督教理想；而欧洲生活，在其现实性、实际力量和愿望方面都与基督教原则相去甚远，……欧洲并没有停止对自己‘共同人类’使命的信仰——这无疑是欧洲文化最重要的创造性动力之一。”^③

虽然欧洲认同遭到重创，但 19 世纪上半期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辟蹊径地论证“第三条道路”，是为俄罗斯“拯救世界（包括欧洲）”的特殊使命寻找神秘主义的“天命”的理由。正如恰达耶夫本人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重新阐释自己的思想时所说，俄国之所以落后，是上帝故意避免这个“伟大的”民族重蹈东方和西方各个领先国家的错误，从而成为“真正的、有良心的法官，去判决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的伟大法庭所面临的诸多诉讼”^④。在写给屠格涅夫的私人书信中，恰达耶夫说得更加明确：“俄罗斯的使命是一项伟大的思想事业：它的任务是在自己的时间给出解决在欧洲引起争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同时，他也毫不怀疑俄国将成为欧洲文明中心：“我们的使命是教会欧洲无限多的东西，否则它是理解不了的，……这一天将要到来，那时我们将成为欧洲的思想中心，正如我们已经是它的政治中心，我们的即将到来的基于智慧的威力，将超过我们现在的依靠物质力量的威力。”^⑤

在斯拉夫派思想家看来，西方衰弱的根源在于“精神的根本性分裂和内在完整性及内在统一性的丧失”^⑥，西方的疾病不在于制度，而在于精神，

① [俄]基列耶夫斯基：《答 A.C.霍米雅科夫》，第 42 页。

② [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 75 页。

③ 同上，第 124 页。

④ [俄]恰达耶夫：《箴言集》，第 147 页。

⑤ Цимбаев Н.И. Либералы сороковых годов. С.174.

⑥ [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 79 页。

但它自己未必能弄明白自己的疾病。能够“迅速并且轻松地”^①诊断和医治西方疾病的，只有在东正教信仰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中成长的俄罗斯人。斯拉夫派中“黑色乌瓦罗夫党”成员舍维廖夫（С.П. Шевырѐв）说：“愿俄国对西方而言成为保护和遵守的力量，愿俄国为全人类利益而保留西方的伟大历史宝库。”^②而当时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在西方不仅创造性的生活结束了，而且已经开始了瓦解的进程；对欧洲来说只能从俄国这里获得新生”^③。有趣的是，这里俄国思想家们将“公正”赐予西方的居高临下的姿态，^④恰好成为 19 世纪欧洲“东方主义”的镜像对照。在欧洲学者眼中，古老的东方也是文明的源头和因此“供人朝觐的圣地”^⑤，“面对现代东方显而易见的衰败以及政治上的无能，欧洲的东方学家们发现有责任挽救东方已经丢失的、昔日的辉煌”^⑥，也就是将东方从死亡的境地中“复活”。^⑦

可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揭破了俄国人对西方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而开启了俄国历史、俄欧关系、俄亚关系的新的阶段。

四、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新欧亚地理版图

俄国与土耳其的冲突由来已久，其中夹杂着诸多民族和宗教矛盾，到 1853 年战前最后阶段，促使战争爆发的国家有法国、英国，还有在旁虎视眈眈的奥地利。俄土战争于 1853 年 10 月爆发，1854 年 3 月英法组成联军加入土耳其一方，次年撒丁王国跟进，欧洲列强组成同盟，将俄国逼入孤军奋战的境地。由于联军装备比俄军先进，俄国最高当局战略误判，致使俄国在克里米亚战场遭受重挫，不得不放弃向黑海地区的扩张和对多瑙河诸公国的侵吞，也丧失了干预巴尔干半岛上诸斯拉夫民族事务的权力。战后俄国与

① [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 86 页。

② 同上，第 71 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同上，第 76 页。

⑤ [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第 224 页。

⑥ 同上，第 106 页。

⑦ 参见同上，第 230 页。

欧洲联盟各国签订的《巴黎和约》“标志着俄国在东南欧和近东地位的显著衰落，一般而言也标志着俄国的世界地位的下降”^①。

克里米亚战争引起了俄国所有社会阶层的警惕，俄国社会不但认识到了与西方相比本国的全面落后，而且感觉到了西方国家对待俄国的深刻的仇恨。1812年拿破仑入侵时，俄国人尚未将其视为西方与俄国的政治敌对，只是把拿破仑个人看作与基督教世界为敌的撒旦的化身。但克里米亚战争却使得原先对西方抱有同情的知识精英受到极大的感情伤害——他们把欧洲诸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结盟视为西方对于基督教事业的背叛，因为恰恰是俄国人把欧洲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出来，欧洲人竟然支持“异教徒”土耳其人，而不是接受俄国人与欧洲列强维护王权稳定和推进基督教文明的共同事业。“对那些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的对手的敌视，模糊了欧洲所有的真理和正义感——对于土耳其基督徒不幸成为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徒的痛苦，欧洲不但视而不见，甚至还燃起了对土耳其人的热爱，因为在他们身上，欧洲开始看到唯一能够向东方传递真正欧洲文明本源的要素。”^②

从这种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的撕裂出发，俄罗斯社会意识最终体会到两个种族和两种文明之间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俄国社会痛彻地感受到，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通过武力途径解决外交冲突，西方‘武装反对’俄罗斯，实际上是为了打击俄罗斯，并且削弱俄罗斯在斯拉夫人当中的影响力。……这是整整两个世界的冲突，……”^③1861年，政论家伊凡·阿克萨科夫（И.С. Аксаков）写道：“西方对斯拉夫东正教世界的仇恨，……源于一些极其隐蔽的原因；这些原因就是两个相反文明原则的对立，是旧世界对有着发展前途的新世界的妒忌。也到了我们最终接受挑战并为了自己和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们勇敢地投身于与欧洲发表的政论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几年后他写道：“欧洲的全部任务曾经并且现在仍旧在于，制止俄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增强，防止产生新的东正教-斯拉夫世界”，是这一

①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著：《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②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М.: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8. С.392. 这里的“对手”指的是斯拉夫民族。

③ [俄]津科夫斯基：《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110页。

世界的旗帜的出现，引起了拉丁-日耳曼世界的仇视。^①

斯拉夫世界与西欧世界的兵戎相见和文明对立，在 19 世纪下半叶破坏了俄罗斯民族与西方共享基督教使命的信念，并且加强了俄国知识精英对于欧洲试图断绝俄罗斯与其余斯拉夫民族的联系、促使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脱离俄国势力范围的警惕。作为斯拉夫派的精神承续，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于是获得了广泛传播。泛斯拉夫主义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修正俄罗斯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的地理形象，以此重塑帝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愿景，在东正教精神基础上整合地处东西方交界处的斯拉夫世界。

承担这一工作的是达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他的名著《俄国与欧洲：关于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马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关系的观点》于 1869 年发表在圣彼得堡的杂志《曙光》上，1871 年出版单行本，1920 年被翻译成德文。该书因提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在人类历史哲学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本书从分析 1854 年俄土战争开始，得出欧洲对俄国及整个斯拉夫世界持有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的结论。针对在俄国人潜意识中依然残存的欧洲主导性观念，和欧洲文化是全人类文化发展的最伟大的体现、具有“共同人类文化”的性质、并且也必然决定俄国和斯拉夫文化的走向的假设，达尼列夫斯基根本不承认存在能够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共同人类文明，也不承认存在共同的人类历史。他认为俄国与欧洲之间被不可逾越的文化和历史鸿沟隔绝，并且为此感到十分满意。

进而，对于“俄国是否属于欧洲”这个问题，达尼列夫斯基的回答是釜底抽薪的——在地理层面上取消欧洲作为一个大陆的物质性的合法性，断言“欧洲是压根不存在的，它只是亚洲西部的一个半岛，这个半岛的前端比其他亚洲半岛与亚洲的区别更小，在末段则逐渐越来越四分五裂”^②。将欧洲定义为亚洲的半岛并非达尼列夫斯基毫无根据的杜撰。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地壳构造理论的发展，著名地理学家洪堡等科学家就已经表述过关于统

① См. Зеньковский 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Париж: YMCA-PRESS, 1955. С.124-125. 中译本《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 112-113 页的译文为“这一世界的旗帜代表俄国，它仇视拉丁-日耳曼世界”，但根据俄文原文，阿克萨科夫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新的东正教-斯拉夫世界的旗帜的出现，引起了西方的拉丁-日耳曼世界的仇视”。

②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74.

一欧亚大陆的观点，并且得到德国和法国其他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支持。^①达尼列夫斯基则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别有用心地更进一步，通过把欧洲贬低为亚洲的半岛，使欧洲相对于亚洲的优越地位不攻自破。为此，他重新审视 18 世纪的地理学解释，否定了塔季谢夫以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为界对欧亚大陆的划分。他反问道：

它（指乌拉尔山脉——笔者注）有怎样特殊的品质，以至于在地球上所有的山脉中，单单是它被授予担当世界两个部分之间的边界的荣誉？——这种荣誉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只被认可属于大洋且极少属于大海。从高度上看——这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山脉，从通行性上看——这是一座便于通行的山脉；在它的中间部分，靠近叶卡捷琳堡，人们翻越它就像翻越著名的阿劳恩高原和瓦尔代丘陵一样，你会问驿站的车夫吧：伙计，这哪儿有山呢？如果说乌拉尔山脉分出了世界的两个部分，那么在此之后阿尔卑斯山、高加索山或喜马拉雅山分开的又是什么？如果说乌拉尔山脉从世界里分出了欧洲这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不认为印度也是这样的一部分呢？毕竟它两面濒海，第三面临山——那座山可是乌拉尔山没法比的；而且在印度，一切物理差异（较之与亚洲接壤的部分）都比在欧洲更大。乌拉尔山脉至少还是那么回事；之后作为两个世界的边界的荣誉落到乌拉尔河上，而乌拉尔河已经什么都不算了。一条狭长的小河，河口宽度只有涅瓦河的四分之一，两岸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它唯一特别知名的是鱼很多；但在鱼这件事上，很难理解，与区分世界的两个部分的荣誉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②

19 世纪，达尼列夫斯基以植物学家、鱼类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身份而闻名，在他出版的 46 部著作中，有 36 部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凭借自然地貌学知识和大量的实证材料，他抹去了帝国版图上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分界，以此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由欧洲和亚洲两部分构成的地理形象。他所要呈现的俄罗斯帝国占据的广袤地表，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自然-地理地域。依靠地形和地貌的因素，乌拉尔山以西的东欧平原和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平原，

^① See W.H. Parker, "Europe: How Far?" *Geographical Journal*, 1960, No.3, pp.278-297.

^②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72.

从西部边疆延伸到西伯利亚深处，同属于单一性质的低地陆块，其上分布着少量的高原地带，它的边缘的大部分被水域或高山环绕，中间则没有任何明显的地形学特征的分割。正是地理、气候等原生的自然条件，保证了俄罗斯为主导的“斯拉夫各族人民大家庭”构成了一个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类型”^①。

五、结语：20 世纪俄罗斯民族共同体的地理愿景

达尼列夫斯基取消俄国作为欧洲帝国的地理愿景，被欧亚主义者继承了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这场在西欧和东欧俄罗斯侨民圈中兴起的政治文化运动与自己的斯拉夫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前辈们的共同之处，是占据道德高点谴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并激烈反对俄国属于欧洲的文化认同，将俄国的灾难归咎于与西方帝国的竞争。这些观念的基础则是他们所共享的世界地理图景：欧洲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独立于亚洲的物理-地理意义上的大陆，因为两者都是单一陆块的不同部分。

欧亚主义运动中杰出的经济地理学家萨维茨基（П.Н. Савицкий）进一步发展了达尼列夫斯基在地文学基础上提出的欧亚统一地理愿景，依据土壤学家多库恰耶夫（В.В. Докучаев）对俄罗斯自然或生态区的研究，他把欧亚地表从北到南分为四个自然带：冻原、森林、草原和荒漠，其中的每一个都是有着独立气候、土壤、动物和植物群落特征的、综合的生态系统，它们连绵不断地横向延伸为大致平行的地带。在俄国领土内部没有贯穿南北的欧亚分界，俄罗斯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地理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欧亚”：“欧亚是完整的。因此，对俄罗斯而言没有‘欧洲的’和‘亚洲的’，因为通常被这样命名的土地，实质上是同样的欧亚的土地……保留‘欧洲的’俄国和‘亚洲的’俄国的称谓，与将俄罗斯（连同毗邻它的诸国）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和完整的地理世界不一致。”^②而在这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俄罗斯族通过自然

①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С.197.

② Савицкий П.Н.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оссии-Евразии. 10 ноября 2021 г. <https://history.wikireading.ru/153908>

的迁徙移民与其他民族实现着“自然的同化”，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超越地缘历史、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人种乃至地缘经济的统一体的愿景，萨维茨基造出一个新术语“地方发展综合体”（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①来定义它。欧亚主义者为俄罗斯塑造的这个欧亚同质地理空间和文化-历史空间，要求断绝与欧洲帝国的联系，因此与苏维埃号召殖民地民族摆脱欧洲统治的亚洲政策接近，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苏维埃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地理空间。

在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18世纪奠定下来的俄国领土以乌拉尔山脉为界横跨欧亚两块大陆的地理观念，在行政区划中被固定下来。但与此同时，20-21世纪的俄国学者都在努力消除俄国领土内部欧洲和亚洲的民族差异，试图用俄罗斯民族统一体或者俄罗斯文明统一体来替代19世纪的帝国话语。俄罗斯政权历史上向东西两个方向的“移民拓居政策”，被解释为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的自然要求。通过地理形象的重塑，俄国也实现了文化上由莫斯科核心圈到欧洲帝国再到欧亚枢纽的整体认同。

【Abstract】 There is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s national ideology and construction of its geographical image, with the former playing a key role in the cultural positioning of the latter, while seeking evidence of positivism in the latter. Russia's geographical perception before the 18th century totally accepted the classical Western world vision with three divisions, in which Europe and Asia were separated by the Don River, indicating that Moscow did not recognize the superiority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nor did it offer any cultural or political meanings to the boundary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Peter the Great's reform recognize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 Asia and imitate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mov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continents eastwards to the Urals, creating a "metropolitan-colonial" imperial dichotomy in accordance with European counterparts. 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Decembrist revolt, the Nicholas government reversed the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will, putting Russia against Europe in the name of exploring a

① Савицкий П.Н.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оссии-Евразии.

distinctive Russian way. While still maintaining a sense of common destiny with Europe, Russian liberal intellectuals reversed the previous hierarchy of values and saw itself as saviour of Europe. The Crimean War, on the other hand, made the whole Russian society feel the West's hostility. Intellectual elites, seeking to escape the dominance of European culture, sought to abolish the division on the Eurasian mainland and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Slavic world that could compete against the Western European world. Inherited by Eurasianist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world vision has become the geographic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nation and Russian civilization continuum before an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Russian Civilization, Russian Culture in Geo-space, Russian Nation-state Building, Russia-Europe Relationship

【 Аннотация 】 Между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ей и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е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причём первое играет решающую роль в культурном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и второг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щет позитивистские объективны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во втором. До XVIII век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мышление Руси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иняло западную классическую триединую картину мира, разделило Азию от Европы Доном, это обозначало, что Москва не признавала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не придавала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границе между Азией и Европой. Петров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передвинули границу между двумя частями света на восток до Урал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здали симметрич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империи «метрополия — колония» по модел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колониальных империй. Власти Николая Первого после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восстания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перевернули европейскую культур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на уровн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вол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в Россию Европе во имя поиска самобыт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пути,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русские

либеральные круги сохранили чувство общей судьбы с Европой, но перевернули прежнюю иерархию ценностей и считали Россию спасителем Европы.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чевидно показала всему русскому обществу враждебность Запада,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элита, стремясь избежать господства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попыталась отменить границу между Азией и Европой и построи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славянский мир, который бы был способен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му миру. Эта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была унаследована Евразийцами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и стал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ой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единства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или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до 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русская гео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宋羽竹)

“转向东方”：俄罗斯东方学视野中的 广州航道与海洋空间建构*

李 暖**

【内容提要】从东南亚融入亚太场域，是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颇受争议的一环。19世纪毛皮贸易推动下的“广州航道”问题为观察其可行性提供了历史借鉴。当代俄罗斯东方学主张“俄罗斯-东方-西方”三元结构，强调公共意识、身份观念与地缘空间建构的关联，对探讨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该视角审视俄罗斯旅行者的相关记述，可透视南方海航道在亚太事务中的角色演变：17世纪，米列斯库广州考察有明确的开拓新水域的目标，是“天命观”与现代地缘政治的结合点；19世纪初俄船首航广州，显现出西方殖民认同，引发南太平洋“平等殖民”实验和别洛沃季耶迁移；19世纪末，欧亚主义先驱乌赫托姆斯基随尼古拉皇储东行广州，借“水手王子”符号探索君主制再发明，试探融合式东方主义的边界。南方海航道是俄罗斯价值输出的通道，其政治文化功能远大于贸易功能；海洋空间不断从“欧亚俄罗斯”观念中退场，新欧亚主义者持续向内陆调整边界，以构建稳定的大陆共同体；俄罗斯或应重视当代公共意识中的身份认同取向，厘清复杂的边界问题，走出二元对立并反思东方、西方对于塑造国家主体性的意义。

【关键词】广州航道 俄罗斯海洋殖民 俄罗斯东方学 “转向东方”

【中图分类号】K107.8**【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128(31)

*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共建课题“广州形象在俄罗斯知识界的建构与演变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GZGJ02）的阶段性成果。

** 李暖，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博士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文学博士。

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促使俄罗斯加速部署“转向东方”(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战略以来,俄学界就中国的角色问题产生分歧。一些学者主张俄罗斯应当更积极地开拓亚洲市场,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①另一些人则认为,俄罗斯通往中国之路障碍重重,尤其是在中亚局势多变的语境下,中俄贸易方向出现错位。戈沃罗夫(Ю.Л. Говоров)指出,中国从不掩饰其削弱对海上航线依赖的愿望,希望提高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亚走廊的陆路运输力;但俄罗斯难以采取有效行动,丧失了陆路主动权。②这一担忧不断被历史经验所证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С.В. Лавров)2017 年访问东南亚时,俄部分学者提出要避免在战略实施中过度依赖中国,甚至主张借鉴西方,取道南洋。

在此背景下,“太平洋俄罗斯”(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Россия)能否从南部“嵌入”亚太,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14 年,沙平柯(А.В. Шапенко)以广州为例,指出困难在于经济重心之间的巨大鸿沟,例如,俄罗斯人口和 GDP 集中在欧洲,中国集中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南端的广州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经济堡垒,区域异质性和商业竞争使俄罗斯融入亚太步履维艰。③事实上,19 世纪的“广州航道”(Coast-to-Canton)④问题就已经映射出南部区域在俄罗斯亚太事务中的难题。该航路在西方殖民国家毛皮贸易热潮的推动下开辟,⑤但俄船首次来粤即遭遇挫折,未能跻身欧美诸国在广州的毛皮市场。至 19 世纪末,该航路已几乎丧失贸易功能,演变为在亚太发展均势与文化输出的路径。有学者指出,经济目标在俄罗斯亚太利益中向来处于次要地位;从海上毛皮贸易时期开始,俄罗斯的目标就在于“掌握国际政治引线,

① 马博:“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动机、愿景与挑战”,《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49-75 页。

② Говоров Ю.Л.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Вестник КемГУ. 2016. №.2. С.10-20.

③ Шапенко А.В.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почему путь России в Китай лежит через запад// Элита Татарстана. 9 ноября 2014 г. <https://elitat.ru/opinions/economics>

④ 参见 G. Barratt, *Rus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1696-184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8, pp.14-27.

⑤ 18-19 世纪西方通过广州进行毛皮贸易始末,参见王华:“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4 期,第 15-35 页。

让陆地和海洋都有俄罗斯的身影”；^①同样，“转向东方”战略并非经济导向，而是俄罗斯偏好均势政治和软实力输出的结果。^②

2017 年，根纳季·利特温采夫（Г.М. Литвинцев）发表《青年不要去广东》一文，将背景设定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之下的广州。^③哈通采夫（С.В. Хагунцев）认为，这反映出“转向东方”战略背景下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即知识界开始反思俄罗斯在亚太事务中的历史偏好，挖掘东方战略背后的海陆殖民冲突、东西方归属及文化身份难题，转向对东方学本身的思考。^④本文以俄罗斯考察者撰写的东方旅行记为研究资料，从当代俄罗斯东方学视角审视俄船来粤始末，梳理 17 世纪以来俄罗斯从南方海航道介入亚太的历史经验及东方战略之演变，反思其殖民倾向及公共意识转型，重估当代“欧亚俄罗斯”的地理文化边界及身份认同等问题。

一、俄船来粤、俄罗斯东方学与海洋殖民

1805 年 12 月，俄船初次来粤，泊于广州，利相斯基（Ю.Ф. Лисянский）在《1803-1806 年“涅瓦号”环球旅行记》（1812）中作如下记载：

泊好船后，我……亲自同克鲁森施特恩去广州，以便让商人快些购买船上的货物。为促成此事，首先需要同了解当地贸易情况的英国商人比尔会晤，把事情委托于他。……1 月 22 日。我们把剩余货物从广州运出，从中国证人“六官”处获悉，地方长官命令滞留船只。……他吩咐在两艘船附近布下卫兵。意外的敌视行动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⑤

1891 年 4 月，尼古拉皇储率俄船再次抵达广州，随行的乌赫托姆斯基公爵（Э.Э. Ухтомский）在《尼古拉皇储东行记》中作出与之相反的描述：

① Братерский М.В.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Атлантикой и Тихим океаном: Вопрос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ыбора//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Европы. 2019. №.1. С.17-35.

② A. Huan, P. Thambipillai, “Russia and Southern Asia”, in G. Christofferson, eds., *Russia in the Indo-Pacific*, L.: Routledge, 2022, pp.198-221.

③ Литвинцев Г.М. Молодым не ходи в Гуандун// Подъем. 2017. №.1. С.1.

④ Хагунцев С.В.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Подъем. 2018. №.4. <https://podiemvrn.ru>

⑤ Лисянский Ю.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а» в 1803-1806 годах. СПб.: Лань, 2013. С.162-163.

迎面驶来很多飘着军旗的船只，由 17 艘炮艇和 20 艘驱逐舰组成。……如此重要的历史性接待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享有！除了俄罗斯，还有哪个国家的旗帜能够给中国如此友好的印象，唤起礼貌和敬意？……众所周知，广州始终对西方来客充满敌意，用如此热情的礼仪欢迎异邦人，对于中国的爱国者而言几乎不可想象。^①

引文呈现了俄船两次来粤的不同境遇，从中可透视俄罗斯贸易和外交诉求背后隐藏的身份认同范式：俄船、英商和广州官员及商户构成了特殊的“俄罗斯-东方-西方”三元结构，这与学界常用的后殖民“东西方”二元对立结构相悖。在三元结构下，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摇摆，显现出逐渐增强的主体意识，使三者关系越发复杂化。俄船初次来华，是在俄罗斯努力跻身西方海上强国之列的愿景下进行的，在广州与东印度公司在其所代表的他者场域中形成经济利益和政治文化身份的共谋，东方只是被征服的对象。至 19 世纪后半叶，尽管在“大陆俄罗斯”（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Россия）整体框架下，广州在其对华贸易中可有可无，^②俄外交决策者对广州航道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借尼古拉皇储东行之事将广州塑造为发展中俄友好关系的媒介，在公共意识中引发较为强烈的共鸣。如加拿大学者奥耶（S. Oye）所言，俄罗斯人时常对大陆身份感到困惑，这使俄罗斯如何看待东方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因为俄罗斯人即便承认自己的欧陆身份，其观点也无法建立在与东方对立的基础上。^③

上述东方旅行记对广州的描述，是俄公共意识中东方形象（образ Востока）建构模式的缩影，映射出俄当代学界围绕“东方学”（ориентализм）展开的一系列争论：第一，后殖民视域下二元对立的赛义德东方学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俄罗斯东方问题的研究？第二，在俄船来华受挫及大陆政策语境下，广东沿海为何持续进入俄知识分子的东方叙事并促成东方认同？南方海

①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II. СПб.: Лейпциг, 1895. С.155.

② 参见 Пале С.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Океании//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2017. №.37. С.207-221；柳若梅：“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3 期，第 77-82 页。

③ S. 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12.

航道在俄罗斯东方策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当代俄罗斯的东方学思考大体建立在反思后殖民东方学批评的基础上，呈现出两个主要方向：其一，思考俄罗斯东方学有别于赛义德东方学的特殊模式；其二，挖掘和重估俄罗斯东扩问题中被忽略的海洋殖民元素。

赛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 1978）建构了含有贬义的“西方-东方”对立模型，理路植根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经验。模型中的“西方”主要指涉 19-20 世纪的英、法、美，忽略了俄罗斯这样具有东方传统的国家；而“东方”的意指更加含混，主要关注中东和北非，忽略了中亚、东亚和太平洋。因此，俄罗斯学者赖特布拉特（А.И. Рейтблат）指出，东方学究其本质是一个东方“身份形象”（образ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建构问题，在二分式空间等级结构下，东方无论如何呈现都处于从属地位。^①托尔茨（V. Tolz）认为，二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东方学的延伸，赛义德东方学经由埃及学者阿卜德尔-马雷克（Anwar Abdel-Malek），受到苏联观念的深刻影响。^②1951 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收录“东方学”这一词条（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指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对立，反映出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世界观”，“把东方研究完全置于帝国殖民政治之下”。^③这与赛义德东方学批评如出一辙。

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越发意识到东西方夹缝中的身份困境。其一，俄罗斯处于特殊的双重地位：俄罗斯已于 18 世纪通过教育系统基本习得西方看待东方的整套思维体系；^④然而，自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就形成了同情东方的文化本能，主张建立东正教文化孤岛，与“受损的西方”对峙。^⑤这导致俄罗斯在用西方视角看东方的同时，也向东方寻找精神根源，无法仅通过对立实现自我界定。因此，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基础并非东西方对

① Рейтблат А.И. «Ориентализм» и русский ориентализ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20. №1. С.392-400.

② V. Tolz, “European, National, and (anti-) Imperial”, in M. David-Fox, eds., *Orientalism and Empire in Russia*, Bloomington: Slavica, 2006, pp.132-133.

③ Прохоров А.М.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4. М., 1951. С.389-393.

④ S. 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pp.1-12.

⑤ Черная Л.А. Образ «запада»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11-17 вв. Россия и Запад: Диалог или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культур. 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2000. С.31-46.

立，而是“自我-他者”的矛盾共生；俄罗斯持续进行“自我东方化”（самоориентализация）。^①其二，俄罗斯对东方的认知由分散的断面构成。无论是东方学本身，还是国家话语、公共意识，都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统一的东方形象，而是受变动不居的地缘政治和区域化印象碎片的制约；局部区域特征被置换为整个东方，形成高度空间化的形象建构机制。从17世纪开始，空间建构的核心遵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变化趋势，由高加索、西伯利亚转移到中亚、远东和中国东南部。奥耶指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既有一个东方，也有多个东方，苏联东方学和赛义德东方学却假设了一个“共同的东方”，不符合俄罗斯复杂的亚洲观念。^②

结合俄罗斯特殊的拓殖经验，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赛义德东方学范式很难适用于俄罗斯，因此尝试用“俄罗斯-东方-西方”三元结构取代“西方-东方”二元结构，将俄罗斯视为与东西方并存的三大主体之一，而非简单探讨东西方取向问题。此外，力求还原《苏联大百科全书》和赛义德之前的东方形象建构，即作为中性词的“东方”（восток）和“东方学”（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列平娜（Л.П. Репина）、布拉戈德尔（Ю.Г. Благодер）、明茨（С.С. Минц）等整合出东方形象建构的方法论体系。^③该体系强调主体性，围绕两个核心概念展开：第一，公共意识，区域形象建构主要在公共意识层面进行，它是知识分子个体思想与大众群体观念激烈碰撞的区域，促成文化转型的发生和新身份的生成。第二，身份观念，“形象”一词代表了个体和公众意识中一系列身份观念的集合，与集体记忆、群体、个体行为紧密相连。

列平娜提出，东方形象建构的多元主体可归纳为两个端点：一端是信息收集者和文本建构者、传播者；另一端是信息接受者。^④他们的文化背景、

^① Алексеев П.В. Концептосфера ориенталь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 в. Т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 С.39.

^② S. Oye, *Russian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Russian Mind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Emigration*, pp.1-12.

^③ 参见 Благодер Ю.Г, Минц С.С.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7-начала 20 в.// ВестникРУДН. 2011. №3. С.110-125; Гузенина С.В. К вопрос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браза востока в Росси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011. №2. С.112-115.

^④ Репина Л.П. Образы времени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Россия-Восток-Запад. М.: Кругъ, 2010. С.1.

生活方式等共同决定了信息选择和描述方式的特征。由此可见俄罗斯东方学有别于西方的研究路径，即强调个体化、具体化的材料，以旅行者构建的文本、实物资料为素材，探究有多少东方思想被制度化并影响国家策略、公共意识和生活行为，避免东西方二元对立导致的概念简化。此外，俄罗斯东方学在公共意识中的建构机制可分为四个步骤：（1）口头信息、文字材料传播；（2）图像资料、实物资料对抽象观念进行形象化巩固；（3）公众基于本国价值体系进行价值观念比照；（4）国家地缘政治、区域地理、贸易关系等将观念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并随着国家政策的区域需求而变化。

遵循该思路可知，俄罗斯东方学对建构者身份及区域空间、地缘政治有极强的依赖性。从 17 世纪开始，俄公共意识中的东方形象建构，其空间结构的核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在亚洲北部，^①但随着地缘政治观念的改变，重心逐渐向亚洲东南部转移，太平洋及中国东南沿海开始在形象塑造中占据地位。至 19 世纪围绕广州航道形成较为明确的东方海洋观念。不可否认的是，理解东方的努力通常伴随着直接的帝国扩张目标。^②俄罗斯的广州航道探索是在俄美公司效仿西方海洋殖民模式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学者德米特里申（B. Dmytryshyn）于俄美公司 200 周年纪念之际指出，“俄在北美的扩张是北亚扩张的自然延伸”，但与西伯利亚垦殖不同的是，这次扩张主要依赖俄美公司的海上航路开辟，是“政府全程参与的国家计划”。^③俄罗斯学者沃尔霍维金诺夫（Н.Н. Волховитинов）同样认为，阿拉斯加殖民的独特性在于鲜明的海洋性质，不同于大陆性质的西伯利亚垦殖，这最终决定了俄

① 关于 17-20 世纪俄罗斯东方学以亚洲北部为核心的空间结构问题，参见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 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115-121 页；黄达远、孔令昊：“文明论视角下的‘俄国·中亚’空间建构及其对晚清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37-61 页；Чач Е.А. «Ориентализм»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факты и наблюдения. СПб.: СПбГУПТД, 2016. С.228-229.但大部分论著对该问题的探讨止于亚欧大陆和远东，仅苏珊娜·林（S.S. Lim）、帕列（С.Е. Пале）等少数学者将俄罗斯东方学的边界问题延伸至太平洋西部和南部，参见 S. Lim, *China and Japan in the Russian Imagination, 1685-1922*, L.: Routledge, 2013; Пале С.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Океании*. С.207-221.

② S. Oye, “Reformi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forming the Tsar’s Arm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3-150.

③ B. Dmytryshyn, *To Siberia and Russian America*, Portland: The Press of the 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1985-1989, p.31.

罗斯的扩张方向。^①

俄罗斯向中国的探索过程始终具有潜在的海洋特征。早在 1675 年米列斯库·斯帕法里（Н. 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经陆路来华时，就已带有明确的海洋探索目标，其著作《中国漫记》^②对广州做了最早的俄文记述，对南方海航道做出较完整的设想。1805 年，克鲁森施特恩和利相斯基开辟广州航道，分别写成《环球旅行记》^③与《“涅瓦号”环球旅行记》，促使官方将中国形象建构与多元化研究相结合，也激发了知识界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文化思索。1853 年冈察洛夫（И.А. Гончаров）随“帕拉达号”环球旅行至中国，其著作《“帕拉达号”战舰》（1855-1857）^④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俄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方关系的反思以及“自我-他者”认知结构的重塑。1891 年乌赫托姆斯基写成《尼古拉皇储东行记》，他在广州口岸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想显示出俄罗斯的殖民储备空间延伸至中国以南。上述五部旅行记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漫记，代表了特殊的文本类型：即由俄罗斯官方考察者写就，具有明确的地理考察意义、公共意识目标和海洋殖民意识。苏珊娜·林认为，这类旅行记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把东方塑造为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主题，最大限度地将其付诸社会文化想象；极少有旅行者到达过中国南方海域，因此它更深地扎根于集体记忆的观念世界，直接影响信息传播方式和公众接受程度。^⑤此外，这类体裁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档案化文本，保证了信息来源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避免了期刊资料和民间资料的分散化、碎片化。

二、《中国漫记》、旅行阶层与“新水域”开拓

在东方形象整体建构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扮演着关键角色。俄罗斯

① N. Bolkhovitinov, “Som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the Maritime Colonization of Russian America and the Continental Colonization of Siberia”, “Meeting of Frontiers” Conference, <http://www.loc.gov/tr/european/mofc/bolkhov.html>

②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я, 全称为《世界第一区域亚洲含中国及其城市、省份漫游记》（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ь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ая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а и провинции）。

③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④ Фрегат «Паллада».

⑤ S. Lim, *China and Japan in the Russian Imagination, 1685-1922*, pp.76-78.

认识中国始于 17 世纪，哥萨克别洛戈洛夫（И. Белоголов）等旅行者前往中俄接壤处，将简短的见闻带给俄罗斯受众。17 世纪中叶，俄罗斯势力已从北部渗入太平洋，抵达鄂霍次克海与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但始终畏惧南下，仅有少数旅行者到达中原。^①此前，俄罗斯对东方的认知有赖于从西方知识体系中借用的“大鞑靼”观念；^②中国形象尤其具有不稳定性：首先，首批俄罗斯驻华使节文化背景和写作才能参差不齐；其次，带回俄罗斯的信息以口头传播为主，极易被扭曲；再次，旅行范围和资料类型有限，旅行者对中国东南部的记述仍依赖西方地理大发现叙事，且掺杂大量民间传说和东方想象。

1675 年 3 月 3 日，米列斯库受命出使中国，使团规模近 150 人，出行前搜集了大部分在莫斯科能够找到的中国资料。为了这次访华，俄外交衙门（Посольский приказ）特地编纂了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和俄罗斯探险家的报告，文件中提到，中国西部是“一片空旷的大草原，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游荡其间”。而需要使团重点考察的中国东部“是一座名为伊阿波尼亚（Иапония）的巨大海岛”，“东南部是一座名为弗罗摩萨（Фромоза）的海岛”。^③这代表了 17 世纪俄官方对中国地理空间“草原-海洋”的二分式猜想，内陆被置换为俄罗斯人所熟知的边疆游牧景象，沿海则借用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描述，是一种具有海洋神话色彩的模糊建构。俄政府给米列斯库使团下达的任务，是“按上述名称一一核对实情并开列清单”。^④由此可知，除了外交和贸易任务，^⑤米列斯库使团还背负着更重要的地理考察任务，这显现出 17 世纪伴随专业旅行者群体形成而日益增长的领土扩张和文化殖民冲动。

① Минакир П.А. Россия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2006. №.3. С.104-124.

② 参见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 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第 115-121 页。

③ Демидовой Н.Ф.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7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1. М.: Наука, 1969. С.331-332.

④ Там же. С.345.

⑤ 米列斯库使团的任务包括：“请求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尽力探明一条可通往俄国的较近的路线，特别是水路（经由大海或江河）”等，参见柳若梅：“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第 77-82 页。

斯列兹金 (Y. Slezkine) 指出, 17 世纪以前俄国人没有旅行习惯, 他们“不认为穿越空间的运动是一种值得追求的行为”; 俄国人对异域的兴趣遵循着以水域为线索的领土扩张逻辑, 发现“新水域”以界定“新土地”, 征服“异邦人” (иноземцы), 使其为沙皇提供利益。^①马萨 (I. Massa) 认为, “莫斯科人本身并不是一个好奇的民族, 他们只追求利益”^②。这种单一物质利益导向的旅行观在彼得大帝改革前后发生了明显改变。17 世纪初, 德国“壮游” (Die Kavalierstour) 传统传入俄罗斯, 贵族青年在导师陪同下出国游历, 撰写旅行记, 带有明确的人文主义目标, 代表知识分子对地理空间的社会文化渗透;^③至彼得改革时期, 收集珍奇物品和文化产品已成为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结合博物馆、图书馆等的需要, 发展为完备的学术田野作业系统。至 17 世纪中叶, 俄罗斯形成了由政府委派和资助的专业旅行者群体, 旅行同时服务于公众和国家, 形成“娱乐” (увеселение) 与“利益” (польза) 双重功能的结合。值得指出的是“利益”的多义化, 除物质利益外, 还包括公共利益和文化效用。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专业旅行者而言, 这意味着初步成形的文化殖民策略: 第一, 因袭“新水域-新土地-新利益”的扩张逻辑, 开辟新航路; 第二, 给一切地理现象做重新描述和分类, 从地理学角度对世界进行陆地、岛屿、海洋的空间划分, 结合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的推进, 使之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意识; 第三, 主张用“主情主义”视角来质疑西方百科全书式的理性, 构造独特的俄罗斯地形学 (topography), 剖析俄罗斯、东方、西方三者之间的政治文化区隔。^④这导致一个矛盾的现象: 17 世纪的俄罗斯总体向西欧寻找身份认同, 但东方旅行记和使团档案中普遍存在将东方政治体系理想化的倾向, 开辟海上航道、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仅是“文化利益”引发务实观念的结果。

《中国漫记》首先代表了同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方社会形式的主情主

^① Y. Slezkine, “Naturalists versus Nations”, in D. Brower and E. Lazzerini, eds.,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7.

^② J.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Vol.2, L.: Macmillan and Co., 1919, p.10.

^③ Койген А.А. Немец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Карамзин//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3. №.2. <https://magazines.gorky.media/nlo/2003/2/nemeczkiy-pisatel-karamzin.html>

^④ D. Brower, E. Lazzerini,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pp.29-30.

义建构。米列斯库一生撰写了多部中国旅行记,除《中国漫记》外,还有《旅行日记》、^①《使团名录》^②等。米列斯库将东方描述为一个被长城隔绝开来的理想社会形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其统治者努力更好地管理国家,中国的哲人也在寻找最好的治国方式,对国家没有误解”。^③他在《中国漫记》中指出了一种以船只为载体的“水上生活”:许多中国人生活在船上,沿着河流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大批中国人在路上徘徊。其中,广州以其河网密布、交通发达的特征尤其吸引米列斯库的注意,符合俄罗斯人心目中用新水域带动文化利益和领土扩张的“旅行”思路。《中国漫记》第四十九章为“中国第十二省——广东省及其大小城市”,介绍广东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居民习俗等。柳若梅指出,这段记述成为俄国人最早了解广州的基础,强化了俄国人来广东开展贸易的想法。^④关注点从陆路向水域转移,是米列斯库与以往俄罗斯东方旅行者的显著不同之处。《中国漫记》在水上航道方面有若干新发现,除了详细描述已知线路并评估其效益外,还注意到河流、海洋可能组建的南方航道:从阿穆尔河口出发绕朝鲜半岛向南,“从来没有人沿这样的路线到达中国”,继而南下至日本和印度,这将“很好地把俄罗斯同远东、中国、印度连接起来”。鉴于上述分析,米列斯库建议俄罗斯尽快着手组建舰队,摆脱对西方考察成果的依赖:“建立与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发现世界上未被任何人发现的岛屿”,而这将是“整个俄罗斯的荣耀”。^⑤

《中国漫记》显现出多学科研究的迹象。没有到达过广州的米列斯库所记述的只是一些间接得到的信息,但已包含大量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内容。使团配备了植物学、矿物学、地理学等方向的专家,随身携带天文仪器、罗

① Дорожный дневник, 全称为《1675 年俄罗斯使节斯帕法里经西伯利亚、托波尔斯克至涅尔钦斯克及中国边疆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ц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Н. 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

②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全称为《斯帕法里访华使团名录》(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посольства Н. Спафария в Китай)。

③ 转引自 Бажора А.Ф. Китай и китайцы в работах публициста Н.Г. Милеску-Спафария// Мирнауки, культур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8. №.1. С.363-365.

④ 柳若梅:“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问题探究”,第 77-82 页。

⑤ Спафарий Н.Г. 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а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ая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а и провинции. Казань, 1910. С.202.

盘、“描述中国现状及汉语词汇”的书籍等。^①这一切保证了游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苏联学者列别捷夫（Д.М. Лебедев）甚至认为，“17世纪的俄国人对东方海洋的描述比克鲁森施特恩等19世纪初的探险家和权威人士还要准确，后者只是证实了200年前俄国人就已知的事情”。^②米列斯库的游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17世纪之前俄罗斯人依赖西方叙事、以传说和想象为基础的东方形象建构。乌尔苏尔（Д.Т. Урсул）认为，俄罗斯的中国游记具有科学思想的固有特征，“成为东方学奠基的重要资料，超越了同时代的欧洲，（当时）西欧的报道还停留在奇珍异兽和传奇想象的范畴”。^③

从当代俄罗斯东方学视阈来看，米列斯库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进步贵族的扩张需求，是国家计划的一环，西方启蒙观念与东方教会神秘主义、民间传说发生激烈的碰撞。也正因如此，米列斯库的东西方取向问题至今仍是争论的焦点。乌尔苏尔指出，这反映出东方形象建构参与了17世纪世俗启蒙运动（свет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中希腊派与拉丁派的争论。索洛维约夫在《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前言中写道：“在莫斯科，西方天主教支持者和希腊斯拉夫文化支持者之间进行了具有政治特征的意识形态斗争，斯帕法里作为君士坦丁堡宗法学派的学生，是希腊派的支持者。”^④但《中国漫记》表明，米列斯库没有呈现出单一的希腊派倾向，更像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调停者。他主张的南部海航路开辟可视为古代世俗理念与现代西欧理念的结合点，将公众意识从模式化的异域想象中扭转过来，并推动俄罗斯“天命观”（провиденциализм）融入现代地缘政治。^⑤这也预示了之后俄罗斯消解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发展趋势。

三、首航广州、“平等殖民”与别洛沃季耶迁移

在俄罗斯18世纪的对外政策中，海洋拓殖集中在波罗的海、亚速海和

①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И.Н.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службы Н. Спафария (1672-1677). Киев, 1895. С.321; Урсул Д.Т. 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 М.: Мысль, 1980. С.42.

② Лебедев Д.М. География в России 17 в. М.: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49. С.160.

③ Урсул Д.Т. 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 С.107-108.

④ Спафарий Н.Г.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Кишинев, 1960. С.7-8.

⑤ Урсул Д.Т. Милеску Спафарий. С.115-117.

黑海，向东则专注于对西伯利亚的殖民考察。18 世纪末，俄罗斯陆路貂皮贸易陷入困境，库克船长远征时发现了海獭的巨大价值，英国水手在澳大利亚东岸用海獭皮换取几对玻璃珠，继而在广州卖出 2000 镑的高价。1784 年这个故事在欧洲登报并广泛流传；1789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决定派穆洛夫斯基（Г.И. Муловский）率五艘航船前往堪察加和阿拉斯加探险，开拓毛皮贸易新路线并与广州建立海上贸易关系。^①该计划被视为俄罗斯首次远洋航行和海外殖民计划，但由于俄土战争（1787-1791）、俄瑞战争（1788-1790）爆发而被迫终止。^②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国家领土战略、军事战略^③和贸易路线几乎全部转移到大陆策略中，但在公共意识领域却出现相反趋势，带动俄向太平洋积极探索。部分原因在于，18 世纪中期，旅行已成为普遍活动，旅行的流行推动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产生以及对帝国文化边界问题的激烈讨论。^④这也为个体参与甚至改变国家战略提供了可能，克鲁森施特恩在向亚历山大一世提出环球航行计划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海军中尉。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是俄国在真正意义上了解中国和东方的时期，克鲁森施特恩与利相斯基的环球航行是关键推动力之一。这是俄罗斯首次环球航行，也是首次由广州航道抵达中国；俄船还以此为契机对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进行了初步考察，留下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资料。克鲁森施特恩的《环球旅行记》同时出版俄文版和德文版，并在欧洲广泛传播；利相斯基的《“涅瓦号”环球旅行记》于 1812 年出版，两年后传播至伦敦。此外，俄罗斯驻日本使节列扎诺夫（Н.П. Резанов）、俄美公司职员科罗比岑（Н.И. Коробинин）等也出版了相关札记，1816-1818 年，舍梅林（Ф.И. Шемелин）出版了《俄罗斯人首次环球航行日志》。

① Смирнова А.В. Переход России к колони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ли 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 Политология. 2019. №.3. С.111.

② 参见 O. Fedorova, “Krusenstern’s Circumnavigation: 1803-06”,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2011, Vol.46, No.3, pp.381-392.

③ 虽然俄罗斯在俄土战争、俄瑞战争中取得胜利，成为海军强国，但海军委员会主席沃龙佐夫（А.Р. Воронцов）及后来的海军部长奇恰戈夫（П.В. Чичагов）认为，应当集中力量发展陆军，不要在海洋远征上花费多余的精力。参见 O. Fedorova, “Krusenstern’s Circumnavigation: 1803-06”, pp.381-392.

④ D. Brower, E. Lazzerini,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pp.4-5.

从上述资料可知，克鲁森施特恩呈交给亚历山大一世的航行计划带有海洋帝国蓝图色彩，称，航行旨在“让船只成功进驻俄罗斯政府感兴趣的所有世界海洋港口”，这定会为俄罗斯在欧洲争得荣耀。^①海洋机遇促使亚历山大一世调整策略，意欲改善俄罗斯与北美新领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对中国和日本的南部港口尤其感兴趣。官方确定的航行任务有三项：（1）将俄美公司的货物运送到北美和堪察加半岛；（2）送列扎诺夫（Н.П. Резанов）使团去日本；（3）与广州建立贸易关系并在南太平洋上进行科学考察，以期在东南亚扩大影响力并向大洋洲打开航路，这也是航行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计划得到沃龙佐夫（С.Р. Воронцов）的热切支持，他致信英国驻广州的负责人，请求西方殖民者为俄船提供帮助。^②

这次航行因与俄美公司和阿拉斯加的密切关联而超越了地理考察和海上贸易的范畴，沃尔霍维金诺夫指出，它带有鲜明的国家计划特征和海洋殖民意图，俄罗斯海洋殖民和陆上殖民都是在毛皮贸易的掩盖下进行的，其特征可用两个名词来概括：黑貂和海獭。^③16世纪末，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大规模捕猎黑貂和农业垦殖；18世纪下半叶，海獭皮带他们从阿拉斯加海岸横渡太平洋，来到广州和东南亚。海獭皮在中国尤为珍贵，但主要通过恰克图进行贸易，运输成本极高；而在阿拉斯加，海獭和海豹捕猎从4月开始，持续整个夏天，抑制了陆地垦殖，却恰逢最佳航行时间，适于远洋贸易。此外，西方主要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竞争越发激烈，西班牙、英国、美国先后加强对北太平洋的控制，俄罗斯迫切需要向太平洋西南部转移，开拓通往中国、东南亚的海上殖民路线。

但广州之行并不顺利，两部旅行记均如实记载了这次经历。1803年7月26日，“希望号”与“涅瓦号”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经波罗的海、北海

① Круzensперн И. Записки означении кругосветн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ля России. 1803.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Фонд 14. Опись 1. Ед. Хр.26.

② Громыко А.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Документ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ерия 1. 1801-1815 гг. Т.III.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 С.18.

③ N. Bolkhovitinov, “Some Results of the Study of the Maritime Colonization of Russian America and the Continental Colonization of Siberia”, <http://www.loc.gov/rr/european/mofc/bolkhov.html>

进入大西洋，绕道南美洲，到达马克萨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后分成两路，于广州重新汇合。克鲁森施特恩驾驶的“希望号”于 1805 年 11 月 20 日抵达中国海岸，船舱里载有一些海獭皮和海豹皮。船只首先进入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港口，克鲁森施特恩对中国怀有戒备，在 11 月 21 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焦虑：“我除了很少一点东西外，没有中国人要的货物，这很让我不安，被迫决定在澳门等候‘涅瓦号’，这在后来引起了不少麻烦，因为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斤斤计较。”^①但事实上，“希望号”在澳门耽搁的原因并非中国的敌意。根据奥尔洛夫（А.А. Орлов）的研究，俄方决定在此会见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殖民地商馆主管德拉蒙德（J. Drummond），希望得到援助并获取清帝国的详细情报，但商馆已搬到广州。^②旅行记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作者的亲英态度，多次用“勇敢的英国人”“英国军官的来访令我们感到愉快”等措辞；相反，将中国人形容为“野蛮人”和“粗鲁懦弱的海盗”。^③

12 月 3 日，利相斯基驾驶“涅瓦号”满载毛皮和白银抵达澳门，两艘考察船共同前往珠江入海口黄埔港，当时俄驻华使节戈洛夫金（Ю.А. Головкин）仍在边境，无法与北京取得联系，俄船在广州引起骚动，贸易困难重重。首先，未经官方允许，广州十三行不得擅自与外商建立贸易联系，在英商比尔的帮助下，俄船与西成行商人黎颜裕（即旅行记中提及的“六官”）取得联系，通过他对延丰“打点”，才获得贸易许可。此外，在广州进行现钱交易非常罕见，外商货物只能换取茶叶、瓷器、纺织品等，在比尔的周旋下，俄方才换取了 10 万皮亚士^④的现金和 9 万皮亚士的茶叶^⑤。利相斯基的记述相对客观，克鲁森施特恩则流露出更明显的英国认同和殖民考察视角。在克鲁森施特恩看来，重要的不是贸易额，而是成功抵达广州并赢得了英国

① 伍宇星：《19 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年，第 2 页。

② 转引自 Орлов А.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быва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И.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в Кантоне в 1805-1806 гг.// Вестник МГГУ им. М.А. Шолохова. 2010. №2. С.31-41.

③ 伍宇星：《19 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第 3-4 页。

④ 皮亚士（пиастр）：西班牙及西属拉丁美洲银币，一枚皮亚士重约 27 克，自 16 世纪中叶在欧洲广泛流通并传入俄罗斯，多用于海外贸易。参见 Лисянский Ю.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Нева» в 1803-1806 годах. СПб.: Лань, 2013. С.202.

⑤ Крузенштерн И.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в 1803, 1804, 1805 и 1806 годах на кораблях «Надежде» и «Нев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С.254.

东印度公司的援助，称德拉蒙德为“英国人也是在广州的所有欧洲人中的贤哲”。^①此外，两部旅行记除记述来华始末之外，均有《中国信息》和《广州城概貌》等章节，利相斯基采用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呈现广州的具体信息，克鲁森施特恩则侧重考察西方各国在广州的殖民经验。

1806年2月9日，在办完离港手续后，船队驶出南海，一离开港口，北京就传来嘉庆皇帝的严令，命令扣押船只并取消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②奥尔洛夫（А.А. Орлов）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面对中俄贸易的挫败，俄官方报纸对环球航行的报道与克鲁森施特恩、利相斯基的旅行记截然不同。亚历山大一世为遮掩广州之行的败绩，^③将其宣扬为神话般的成功旅行。《圣彼得堡商业日报》（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806年9月发表文章称，尽管俄罗斯使团未能到达北京，“俄罗斯皇室一再收到证明，中国政府保持着不可或缺的友好态度：最近从中国返航的两艘俄船在广州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上述原因令使团访华毫无必要，因此将使团召回彼得堡”。^④对于贸易受挫及对英国救助的依赖只字不提，为公众营造了一个俄罗斯成功跻身海上强国并征服东方的幻象。

通过俄官方报道与两部旅行记的对比可知，与东方交好的表象下掩盖的是错位的西方认同。首先，俄与英国在“他者环境”中相遇，东方对殖民者的敌意使他们具备了共同的欧洲身份意识，正如奥尔洛夫所说，“生于波罗的海的克鲁森施特恩、乌克兰人利相斯基和苏格兰人德拉蒙德很轻易地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发现在广州的土地上，外来者遵循着相似的价值观”。^⑤其次，它代表了亚历山大一世改革下自由主义蔓延的特殊历史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俄罗斯已完成欧化进程。初步得到西方世界认可的

① 伍宇星：《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第9页。

② 关于俄船离港前后的详细史料，参见伍宇星：“俄船首航广州贸易风波再研究”，载关贵海、栾景和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2-184页。

③ 除了与广州通商不利，航行期间，俄驻华使节戈洛夫金也在外蒙古库伦被扣押，未能成功抵达北京。

④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806. No.72. С.811. 转引自 Орлов А.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быва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И.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в Кантоне в 1805-1806 гг. С.31-41.

⑤ Орлов А.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быва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И.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в Кантоне в 1805-1806 гг. С.31-41.

俄罗斯迫切加入竞争行列，但并未成功攫取海上贸易权，不得不借助叙事策略构建虚假的东方认同来掩饰殖民竞争的挫败感。亚历山大二世时期，阿拉斯加殖民地丧失，广州航道几乎在俄官方宣传中彻底销声匿迹。有学者提及，俄罗斯在当代“转向战略”掩盖下仍然存在错位的西方认同，例如，俄罗斯在东南亚事务中变得积极，是为了彰显其政治和经济不逊于西方；虽然它多次宣布自己是“欧亚国家”，但政治重心仍在欧美，这更加表明了矛盾的身份认同取向，换言之，俄罗斯向来自视为欧洲国家，并未完全成为“欧亚国家”，更不是“亚洲国家”。^①

克氏环球航行首次带回了南太平洋信息，绘制了新几内亚、汤加、塔希提、马克萨斯群岛和托雷斯海峡等地的地图，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注意。在克鲁森施特恩和利相斯基贡献这批资料之前，俄知识界已经对南太平洋产生了社会文化想象。基于 1769 年法国航海家布干维尔对塔希提的描述以及狄德罗在《布干维尔旅行补编》一书中对南太平洋原始社会的思考，俄罗斯公共意识中形成了生活在遥远海域的“高贵野蛮人”形象，他们的社会遵循自然规律，一度成为东方形象的核心象征之一。帕列认为，这导致俄罗斯越来越多的梦想家坚信南太平洋可以实现社会平等，认真探讨前往南部海域进行建立平等社会的实验。^②与其他国家优先将本国边疆选作社会实验地的做法不同的是，西伯利亚和其他蛮荒地区已经被严格地纳入俄罗斯国家暴力拓殖机器当中，因此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平等社会理想总是尽可能地远离帝国边界，在“天命观”驱使下，将俄罗斯文化边界延伸至未被欧洲文明影响的海洋区域。克氏环球航行的发现，推动了知识界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称之为“平等殖民”（колонизация равноправных людей）。^③19 世纪初，有志愿者以圣彼得堡大学的社团为基地，筹集资金到太平洋开展社会实验，巴赫梅捷夫（П.И. Бахметев）携带一张 5000 人签名的“平等殖民地”计划书赴太平洋寻找实验点，但发现新西兰等岛屿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尝试未果。知

① 参见 A. Huan, P. Thambipillai, “Russia and Southern Asia”, pp.212-213.

② Пале С.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в Океании. С.207-221.

③ Дридзе А.Д. П.А. Бахметев и е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Океанию (1857)// Этн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 Южных морей. Макла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 1995-1997 гг. РАН. СПб., 1997. С.199-203.

识分子继而将目光转向了航路相对畅通的东南亚和中国南部海域，在这里看到社会思想批判的便利条件。

克氏东方航行对民间产生了更加深远的文化影响，使海洋社会观念植根于公众意识中。这一时期俄罗斯民间兴起了一种东方海洋乌托邦的传说，大众意识、官方务实观念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实验构成完整的对话。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 19 世纪初流行的别洛沃季耶（Беловодье）传说。早在官方考察队伍去东方海洋探索之前，旧礼仪派就试图前往亚欧大陆东端寻找别洛沃季耶。根据苏联学者奇斯托夫（К.В. Чистов）的研究，别洛沃季耶是一片未被尼康改革所影响的海洋区域：从莫斯科经喀山、叶卡捷琳堡和秋明，到达卡缅诺格尔斯克和乌斯提巴村，那里的岩洞和雪山背后有一座名叫乌末缅斯克的村落，步行 44 天，经库班进入中国境内可抵达目的地，“那里的居民生活在大洋边缘，分布在 70 座岛屿上”。^①

这则叙事填补了民众想象中的东方知识空白，也对移民和海洋探索起到强烈的刺激作用。^②别洛沃季耶的传播主要借助三种方式：（1）民间口头传说；（2）官方法庭文件；（3）马克·托波泽尔斯基（Марк Топозерский）与僧侣米哈伊尔（инок Михаил）印发的《旅行者》秘密旅行手册，1862 年由沙波夫（А.П. Шапов）编辑出版。这说明别洛沃季耶传说在诞生之初，其功能并非虚构性和审美性，而是新闻性和公民性；它构成了影响范围较广的地下社会运动，整个 19 世纪都有农民前往东方寻找海洋王国，往往在中俄边境被拦截，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主要从秘密宣传手册和法庭文件中了解到这则传说，宗教与社会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超出民俗学范畴的复杂现象。苏珊娜·林认为，19 世纪的别洛沃季耶迁移构成了以东方海洋为目标的“神圣地理学”（Sacred geography），民众迁移路线首次具备了突出的海洋特征。^③它代表了俄罗斯民众想象中的东方，一种隐藏在陆地边界之外的典型的海洋乌托邦建构，象征着大众逃离欧化俄罗斯的本能。这

① 参见 Чистов К.В. Легенда о Беловодье// Труды Карель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2. №.35. С.116-181.

② Чистов К.В.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утопия. СПб.: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2003. С.448-449.

③ S. Lim, *East Asia in Russia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830-1920s*, A dissertation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6, p.38.

一深刻的文化根源决定了 19 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必然偏离西方，向东方寻找社会发展出路和身份认同。

诸多史实表明，在寻找别洛沃季耶的实践中，大部分旅行者并未遵循《旅行者》手册记载的路线，而是经海路而行，取道东南亚。奇斯托夫认为，最后一次寻找别洛沃季耶的旅行是 1898 年几名乌拉尔哥萨克的探险。他们在 4 个月的时间内经中东、锡兰、新加坡到达中国和日本，路径几乎与俄罗斯官方派出的考察团路线重合，与俄罗斯东部扩张策略几乎完全一致。^①这表明，在东方海洋问题上，南部航道开辟、知识界“平等殖民”与民间的文化迁移达成共识，形成了以海洋社会为契合点的民族身份建构。早在俄罗斯“官方民族学”思想出现之前，克氏环球航行就已经预示了民族身份认同与太平洋西南海域的隐秘联系。奇斯托夫认为，这是由于俄罗斯官方派出的考察者使东方海域的相关信息传入大众的耳朵，滋养了大众的想象力，形成官方资料、宗教、民间传说相杂糅的公共意识。^②例如，广州之行贡献了《克鲁森施特恩环游世界旅行记图集》《利相斯基环球航行地图绘画集》等资料，用俄罗斯视角绘制了一批较为精确的中国图像，直接扭转了普通民众心目中的东方形象。17 世纪末以来，西欧流行的“法式中国风艺术”（*шинуазри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Китая»*）将东方诠释为洛可可风格的梦幻之地，俄罗斯民众受西方造型艺术的影响，认为中国只是一个生活装饰奢靡的国家，而第一批俄罗斯考察者绘制的写生具有民族志特征，倾向于准确记录真实信息，促使大众意识中出现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中国形象构造方式，基于西欧浪漫主义想象的异域情调则淡出了公众视线。

四、东方批判、“水手王子”与欧亚主义先声

亚历山大·卢金（А.В. Лукин）指出，对俄罗斯政治文化和民族身份产生深远影响的东方形象建构从 19 世纪才真正开始。如果说 18 世纪俄罗斯身份归属是一个官方问题，那么 19 世纪该问题的解决更加倚重独立的民间文

① Чистов К.В. 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утопия. С.303.

② Там же. С.304.

化圈。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论争中，东方形象首次发挥重要作用。^①两派别之争使公共意识中的“东方”概念显著复杂化：其一，它代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正教文化和“官方民族性”；其二，代表斯拉夫派提出的东方愿景，认为俄罗斯的独特性在于欧化之前的斯拉夫传统，将“东方”视为人民性的象征，并不关心东亚本身。在上述语境下，出现了一种以塑造俄罗斯民族性和主体性为旨归的东方形象建构模式，即聚焦东亚时局，搭建“自我-他者”相互比照、双重批判的认知体系，^②对东西方社会展开比较和批判性反思，以明确作为文化主体的俄罗斯在东西方碰撞中的历史定位。同时，对东方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赫尔岑农民公社乌托邦的提出，大众心目中的理想实验地从远洋回归内陆，太平洋沿岸则彻底沦为帝国殖民的征服对象。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东南沿海在鸦片战争中遭遇西方强烈冲击，暴露出君主制的弊端，东方世俗国家权力已无力承载乌托邦理想；相比之下，陆路口岸恰克图远离海上的坚船利炮，在很高程度上实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反而成为知识分子社会理想的寄托。正如谢尔比年科（В.В. Сербиненко）所言，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俄罗斯公众意识中，以往的中国形象已不代表任何新的他者特征，异域王国的象征逐渐让渡给亚洲内陆文化符号。^③

乌赫托姆斯基在《尼古拉皇储东行记》中，借广州口岸的外贸情况，用隐晦的方式提到鸦片对理想化东方形象的破坏性冲击：

19 世纪，中国爆发了一种疾病，……清朝皇帝的臣民却对此无动于衷，因此失去了很多利益，日本丝绸的需求却日益增长，尽管后者尊严更差。地方当局应当格外注意这一珍贵工艺面临的危险：每年从清帝国出口的布匹和织物价值约为 7000 万到 7500 万卢布。只有茶叶供应较好，其他所有出口商品总额更低，约为 5000 万卢布。万一中国任由这

① Лукин А.В. Эволюция образа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й запас. 2003. №.3. С.35-41.

② Жукова Л.В. Визуальный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 века. С.141.

③ Сербиненко В.В.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образ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XIX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публикации. Вып.1. М., 1989. С.119-138.

种疾病发展下去！去年丝绸出口量与 1889 年相比减少了 9 万英镑。^①

尽管乌赫托姆斯基常被形容为“君主制的坚定支持者”，^②但广州的历史遭遇促使他反思君主制弊病，为俄罗斯寻找政治改良方式。这表明，鸦片战争之后，疾病隐喻越发紧密地与中国形象相关联，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眼中，东方转变为一种有力的双重批判工具。在苏珊娜·林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可进一步总结出两种批判模式：

1. 海陆对立模式。赫尔岑在《科学中的佛教》（Буддизм в науке, 1843）中塑造了一对一体两面的形象——鸦片战争时期停滞的东方和“中国化的欧洲”，佛教代表东方宗教与君主制结合的绝对静止状态，而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西方派在内，都将科学变为权力和“暴君神话”，同样陷入了停滞状态。^③东西方共同形成了一个与俄罗斯对立的“衰败他者”，西方海上殖民致使现代技术污染中国东南沿海，只有内陆俄罗斯仍保留着原始共同体，俄罗斯“人民性”可以在东扩和内部殖民中彰显价值，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建设农民公社乌托邦。赫尔岑的案例表明，中国开始被知识界用作操控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距离的工具，成为一个同时批判西方和东方的有力武器。^④这使俄罗斯从单一的东西方二元论中摆脱了出来，但又陷入海陆空间的对立当中。

2. 海陆融合模式。冈察洛夫的《“帕拉达号”战舰》代表了与赫尔岑不同的立场。19 世纪 50 年代，冈察洛夫提出一种有别于先前文学传统的旅行记形式，主张忠实记录由政府支持和赞助的海外探险和考察，而非赫尔岑在西方的“悠闲漫步”和猜想。《“帕拉达号”战舰》的叙事已几乎完全摆脱了地理大发现模式，航行以社会考察为目标，计划经印度抵达中国、日本，描绘东方沿海社会现实。冈察洛夫的观察与赫尔岑的猜想形成鲜明对比，他借伦敦贸易中心和南洋市场上共同具备的热带水果，描绘了一个“人人都能吃菠萝”的“民主景象”。^⑤冈察洛夫看到了一个富于变化的东方世界，这

①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II. СПб.: Лейпциг, 1895. С.156.

② Романов Б.А. Россия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892-1906).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Л., 1928. С.91.

③ Герцен А.И. Дилетантизм в науке. СПб.: Лань, 2013. С.43.

④ S. Lim, *East Asia in Russia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830-1920s*, pp.68-73.

⑤ Ibid, pp.83-86.

是赫尔岑等在欧洲所无法感受的。他指出，西方殖民下的东方绝不等同于公众意识习惯接受的“清醒-睡眠”二分法，欧洲并非清醒的文明，东方也不是绝对静止和沉睡。冈察洛夫视东方海域为文明的进步，映照出俄罗斯落后的君主制及其在欧陆的边缘化处境，呼吁寻找俄罗斯与东方社会形式和文化特质的共性。冈察洛夫的思想可视为欧亚主义的先声。

乌赫托姆斯基《尼古拉皇储东行记》^①的立场与冈察洛夫有诸多相似之处，批判西欧海上入侵，反思停滞的俄罗斯，在东方沿海看到了延长俄罗斯君主制生命的契机。1891年，乌赫托姆斯基以东方学专家的身份受尼古拉皇储邀请加入远洋航行，经埃及、印度、东南亚诸国到达中国、日本。乌赫托姆斯基记载了皇储乘坐“亚速记忆号”前往广州的时间安排：俄历1891年3月23日（公历4月4日）“亚速记忆号”经3昼夜12小时从西贡抵达香港，3月24日（公历4月5日）换乘中国招商局私人航船“江宽号”从香港航行7小时抵广州，27日乘同一艘航船经6小时返回香港。^②《东行记》第二卷《香港与广州》一章记载了皇储游历的详细信息。^③

尼古拉东游恰逢“水手王子”（the Sailor Prince）在欧洲君主制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这一特殊的公众形象在帝国时代盛行，融合了王室血统的光环和水手文化的开放性，成为皇室在激烈的制度争论、国际冲突中巩固地位的重要标签。从1868年7月4日英国公民在水晶宫热烈欢迎阿尔弗雷德王子从澳大利亚返航以来，欧洲皇储纷纷利用大众的海洋想象将自己塑造为公共意识的宠儿。当时皇室的航海路线除南太平洋，最受青睐的就是远东和东亚。^④“水手王子”现象是君主制现代化和再发明的表征。19世纪中后期，大众媒体的发展使君主制所面对的公共意识演变为“政治大众市场”（political mass market），皇室和统治阶层必须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塑

① 该书中译本及藏书情况，参见陈开科：“1891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72-182页；李永昌：“俄国皇太子的东方之行与俄国的远东政策”，《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1-4页。

②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 III. СПб.: Лейпциг, 1897. С.56.

③ 参见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 II. С.136-181.

④ 参见 M. Schneider, *The “Sailor Prince” in the Age of Empire*, L.: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1-3.

造公众喜爱的新符号。^①施耐德 (M. Schneider) 认为, 在欧洲文化语境中, 水手是一个被神话化的公众形象, 将君主制与复杂的现代趋势维系起来, 形成公众对海洋帝国的热情以及法国学者阿兰·科尔宾 (Alain Corbin) 所说的“海洋的诱惑” (lure of the sea)。^②

由上文可知, 海洋在俄罗斯公共意识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并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和旅游业的兴起而成为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 因此俄罗斯君主制借海洋符号实现现代化再发明实属必然。《尼古拉皇储东行记》1895-1897 年在彼得堡的成功问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是一次带有庆典性质的出版盛事, 官方对尼古拉皇储东方之行的庆贺, 也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一方面, 东方海洋在欧洲强国政治话语中占据重要位置, 海洋帝国是这一时代最有特色的政治文化价值之一;^③另一方面, 俄罗斯民众普遍向往西方海外殖民, 这正是俄罗斯作为陆上帝国所缺失的, 首次环球航行及太平洋探索的进展使公众看到了弥补缺失的可能。因此, 公众的想象、政治权力和地理现实压缩在“水手”符号中, 促使该形象从旅行家、考察者向帝国缔造者蜕变, 罗曼诺夫皇室试图通过海外殖民为民众兑现海洋社会承诺。赫瓦林 (А. Хвалин) 指出, 尼古拉二世执政前就显现出兴建海洋帝国的迹象, 皇储栽培期间的远洋航行证明他对海洋和海军服役格外熟悉, 这促使他一生都对海洋怀有热情, 影响了执政后帝国扩张的主要方向。^④例如, 1894 年 12 月 19 日, 尼古拉即在利巴瓦 (Либава) 展开了海军建设实践, 为帝国建设海军舰队。

与西方殖民不同的是, 尼古拉的海上东扩是在东方主义思想^⑤和文化认同的掩盖下进行的。陈开科指出尼古拉皇储东游的外交战略环境: 尽管尼古

① 参见 E.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L.: Weidenfeld a. Nicolson, 1994, pp.105-107.

② A. Corbin, *The Lure of the Sea.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side in the Western World, 1750-1840*, L.: Penguin Books, 1995, p.1.

③ M. Schneider, *The “Sailor Prince” in the Age of Empire*, pp.1-3.

④ Хвалин А. Император Николай как полководец. Имперский архив. 19 января 2011 г. <http://archive-khvalin.ru>

⑤ “东方主义” (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 一词不同于前文出现的“俄罗斯东方学” (русский ориентализм)。后者泛指俄罗斯如何看待东方及东西方相互关系的问题; 前者特指 19 世纪末兴起于俄罗斯的一种社会思潮和帝国意识形态, 认为俄罗斯在历史、文化、思想上与东方有更紧密的联系, 主张在亚洲进行和平扩张。参见 Суворов В.В. Место 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Власть. 2012. №.12. С.78-80.

拉东游不负有正式外交使命，但基于“皇太子”角色的政治意义，它可被视为“东方政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皇储出游时机与俄国“双头鹰”外交战略转向远东的时期吻合。^①施耐德也指出，东欧诸国普遍在西方和东方身份之间挣扎，皇储选择向东旅行，代表了他以君主制为根基的东方转向，这部分是受新兴的东方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映现出东方主义对整个东欧知识界政治文化生活的辐射。^②例如，身为皇储导师的乌赫托姆斯基对西欧物质文明感到失望，导致尼古拉本人也更青睐亚洲，而这一思想又通过与尼古拉同船远航的希腊乔治斯王子而对东欧“拜占庭主义”（Byzantinism）复兴产生了影响。

乌赫托姆斯基是一位被遗忘的东方学家，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重新发现。^③在某些层面他预见到了今天的欧亚主义，通过比较俄罗斯和亚洲，将东方学发展为“19 世纪后期俄罗斯政治和公众思想的创新项目”。^④乌赫托姆斯基的出发点是俄罗斯与亚洲之间深远的精神联系。《东行记》强调了西欧与亚洲的精神断裂，主张赶在西方之前在精神文化层面征服东方。面对人们的质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扩张）？”乌赫托姆斯基回答：“对于整个俄罗斯的国家力量来说没有别的出路……亚洲人如果不是被我们唤醒，而是被西方异族人唤醒的话，就会变得更加危险。”^⑤在他看来，由俄罗斯“唤醒”亚洲完全可行，因为二者没有精神边界。他在《论中国事件》中提到：“对于我们来说，亚洲本质上没有边界，除了无边无际的蓝色大海自由拍打着海岸，就像俄罗斯精神一样无拘无束。”^⑥可见，他试图从地理和文化上同时消解俄罗斯与亚洲的界限，认为只有海洋才能构成俄罗斯的自然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欧亚主义学说的前身，东方主义在论及俄罗斯帝国空间建构时，坚持“陆地-海洋”（Континент-океан）二位一体，强调帝国扩张

① 陈开科：“1891 年俄国皇太子东游旅华述论”，第 172-182 页。

② M. Schneider, *The “Sailor Prince” in the Age of Empire*, pp.1-3.

③ Ойе В.Д. Навстречу Восходящему солнцу: Как имперское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привело Россию к войне с Японией. М., 2009. С.70-101.

④ Чернов К.Н. Россия-Восток во взглядах Н.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и Э.Э. Ухтомского// Мир Евразии. 2010. №.1. С.61-67.

⑤ Головачев П.М.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Пб.: Е.Д. Кускова, 1904. С.13-14.

⑥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К событиям в Китае: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Запада и России к Востоку. СПб.: Восток, 1900. С.84.

的“自然性”，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 20 世纪俄罗斯与东亚的关系。^①

卢金认为，乌赫托姆斯基的东方主义观念位于俄罗斯东西方之争的交叉点上，将两种公共思想传统加以融合，承认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国家性当中固有的东方特质；其直接结果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漫长争论在 19 世纪末几乎被东方主义所取代。^②与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都不同的是，东方主义着眼于俄罗斯的亚洲根源，并主张向东进行文化扩张。奥耶指出，该立场的形成很可能基于对佛教以和平手段征服亚洲的模仿。^③这一主张在广州之行的记述中系统地体现出来，中国的东方特质主要有三个方面吸引着乌赫托姆斯基：佛教仪式和礼制、东方审美、森严的君主制。这与世纪末氛围下的俄罗斯文化环境和时代倾向有关，佛教仪式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提供了逃离西方智识体系的路径。抵达广州当天傍晚，皇储一行人参观了海幢寺。在对海幢寺的描述中，乌赫托姆斯基有意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做出误读，将其解读为典型的西方传教模式，意欲将佛教纳入帝国传教使团文化当中，为精神扩张提供例证：

……在神秘的薄暗当中，佛堂上矗立着十六位罗汉，这些亚洲的智者形象散发出安宁的喜悦和平静的气息。如果想一想把它与印度隔开的遥远的距离，不禁会对诞生于恒河的宗教信徒感到惊讶，他们感知到自身坚定的信念，想要踏上这条危险的、几乎是未知的道路，把真理带给我一个思想与之截然不同的民族。^④

乌赫托姆斯基将佛教仪式的审美和文化意蕴塑造得比历史和政治特征更重要。宗教被建构为俄罗斯与东方“融合”的媒介，东方礼制的威严投射到沙皇君主制之上，以对抗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乌赫托姆斯基将广州视为一个现代性冲击下的典型东方模型，以此为鉴，反思俄罗斯君主制在东西方之争中应遵从的方向。《东行记》展现出乌赫托姆斯基对中国的困惑：

像海中沙粒一样数不清的中国人口在文化历史层面构成了巨大的

① 参见 Стрижак Ю.Н. 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 кн. Э.Э. Ухтомского// Вестник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Пушкина. 2012. №4. С.50-58.

② Лукин А.В. 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 М.: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7. С.15-33.

③ Стрижак Ю.Н. 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 кн. Э.Э. Ухтомского. С.52.

④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II. С.157.

谜题。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司芬克斯民族”，……当“天子”眼前永远浮现着和他们密切相连的、传统君主专制下的先贤形象时，西方无政府主义进步又意味着什么？……对于清朝皇帝来说，追逐现代性和通俗性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它，又如何热切地追求西欧世界的主导势力？中国皇帝自古以来都站在人群近旁，却高高在上，触不可及，只有俄罗斯沙皇创立并保有着类似的处境。^①

在俄罗斯知识界“黄祸论”甚嚣尘上的语境下，这段描述罕见地表现出对东方君主制、复杂礼制的赞赏，这表明俄罗斯皇室希望通过彰显与东方的精神共性来对抗西方并与之竞争的意识，断定文化植入能够迅速超越西方的暴力殖民，先一步征服亚洲。其中暗含了东西方君主制在现代性冲击下的生存焦虑。东方场域中清晰地呈现出三个主体：俄罗斯、亚洲、西欧。三个主体之间不是简单的共存关系，而是竞争焦虑裹挟之下的征服、被征服与见证征服的关系。苏珊娜·林认为，在俄罗斯的亚洲设想中，最重要的是让欧洲人见证俄罗斯人对亚洲的征服，欧洲人的目光甚至比俄罗斯征服亚洲本身更为关键。^②

西方的凝视存在于乌赫托姆斯基东方书写的各个角落，首先表现为反复出现的“西方租界-俄船-广州”三角形空间架构。例如，在抵达广州前，皇储乘坐的“亚速记忆号”途经香港。作者将其置于南洋海盗传说的背景之下，形容为“空旷而忧郁的‘英国的前厅’”，^③凸显历史文化的陌异感。对珠江入海口的描写则更加符合俄罗斯公共意识中对东亚海滨风景的文化想象：“岩石陡峭的小岛迎面出现在蓝色的水中，又沉入远方，……轮船笨拙地撞击柔软的海滩。欣赏着周围的景色，我们不禁理解了为什么葡萄牙人贾梅士正是在这里写出了最好的诗篇。”^④此外，作者强调广州对待俄罗斯和西欧的不同态度，体现出俄罗斯在面向亚洲边缘区域时重获的身份满足。例如，描写中方在珠江码头欢迎皇储的盛况时，引入西方作为参照系：“广州始终对西方来客充满敌意，用如此热情的礼仪欢迎异邦人对于中国的爱国者而言

①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II. С.143.

② S. Lim, *East Asia in Russia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1830-1920s*, p.9.

③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II. С.137.

④ Там же. С.145.

几乎不可想象。”^①乌赫托姆斯基将历史根源追溯至中世纪东西方海上贸易，将俄罗斯之外的海上来客全部归入侵略者之列：“从中世纪开始，波斯人就开始与广州通商，阿拉伯船只和欧洲人紧随其后，与当地展开斗争。……这类野蛮冲突后来反复重演，最让广东人困扰的是日耳曼人，否则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把外国人称为‘红毛鬼’。而谁能够把中国从衰落和异族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只有俄罗斯！”^②这段文字中的日耳曼形象是斯拉夫主义“日耳曼-拉丁文明衰亡说”的表征，也是刚刚萌芽的欧亚主义西方批评的关键切入点。乌赫托姆斯基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将西方塑造为东扩竞争中的失败者，也彻底否定了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欧化俄罗斯。霍坎森（K. Hokanson）认为，当俄罗斯彻底背离西方，转向东方和南方时，身份认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为了成为心目中真正的俄罗斯人，不得不强调自己与东部和南部的关系”。^③

在这样的观念下，《东行记》对广州的记述与当时俄罗斯国内的主流论调形成强烈反差：

欧洲人大多住在沙面岛上，资金周转数量并不大，大部分贸易额是通过香港进行的。然而，出口丝绸和茶叶仍然是经过这里，毕竟这里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块不大的空间里，勤劳的居民在迷宫一样的水域上穿行，运载着数量可观的优质资源。……这里的丝绸贸易其实是把天子的王国和印度、小亚细亚连接起来的间接枢纽，同时也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联系起来。^④

丝绸符号构建出一个先进、富庶的东方，与冈察洛夫的南洋民主社会形成呼应，在东方海洋经济体的映衬下，西方租界被描述为“衰朽之邦”^⑤的象征。可见，乌赫托姆斯基明显背离了欧洲中心主义，几乎转向了东方认同。但结合同时代陆路扩张史实可知，这并不意味着用东方身份取代俄罗斯身份，而是和平扩张与文化殖民的表征，与北方的经济扩张形成“分工”。乌

①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 II. С.151.

② Там же. С.155.

③ K. Hokanson, *Writing at Russia's Bord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p.13.

④ Ухтомский Э.Э.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Николая II на восток. Т. II. С.160.

⑤ 参见刘亚丁：“俄罗斯的中国想像：深层结构与阶段转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54-60页。

赫托姆斯基向受众描述海上贸易给广州带来的诱人经济活力，将中国人塑造为丝绸之路维系下的沙皇的“臣民”，无疑成为沙皇权威向东方海域蔓延的动力。东方主义者相信，亚洲和俄罗斯之间在海洋的流动性中形成了几乎完全融合的精神联盟。这与财政大臣维特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和华俄道胜银行（1896）等东扩实践共同构成了海陆空间蓝图，也代表俄罗斯“东方主义视野达到了顶峰”。^①

这一思想却在接下来的日本之行中遭遇挫折。融合式东方主义最终随着皇储在大津遇刺以及之后的对马岛战败而宣告破产，苏珊娜·林认为，在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心目中，俄罗斯帝国可以被自由想象为直抵太平洋的亚洲的一部分，但历史证明这一无休止的想象是有限的，这个边界就是东亚。^②同样，斯特里扎克（Ю.Н. Стрижак）指出，对于俄罗斯文化影响东方的可能性，以及欧洲文明通过俄罗斯渗透到东方的设想，只能是基于文本建构的假设与想象；乌赫托姆斯基东方主义的基础是神话思想、直觉冲动与东方实际利益精打细算的结合。^③随着俄在远东扩张受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体认到帝国边界带来的焦虑，在他们看来，太平洋成了俄罗斯不可逾越的界限。

五、余论：欧亚边界与“转向东方”的思考

从俄船来粤始末可知，在俄罗斯国家观念和公共意识中，转向东方是向亚太地区试探边界的过程，也见证了融合式东方主义的破产。20世纪以来，欧亚主义者继承了乌赫托姆斯基等先驱的衣钵，却不得不为“欧亚俄罗斯”调整边界，向亚欧大陆中部退缩。特鲁别茨科伊（Н.С. Трубецкой）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欧亚俄罗斯“东起太平洋沿岸，西至多瑙河流域，北起北冰洋，南至中国和东南亚”；^④萨维茨基（П.Н. Савицкий）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亚欧大陆》则将中国和东南亚也排除在外，从地理和政治文化上都

① S. Lim, *China and Japan in the Russian Imagination, 1685-1922*, p.127.

② Ibid, p.4.

③ Стрижак Ю.Н. Восточничество кн. Э.Э. Ухтомского. С.50-58.

④ 参见张志远：“俄罗斯地缘政治先驱丹尼列夫斯基思想及其历史贡献”，《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第80页。

打消了向海洋延伸的计划。^①萨维茨基指出，“欧亚”一词有文化历史的浓缩意义，是山脉环绕下一块完整独立的“内陆发展地”。这与施密特（K.K. Шмитт）的“律法”（номос）概念有高度的相似性，自然空间赋予社会活动以秩序和边界，陆地和海洋形成对比：陆地具有稳定性，更可能建立清晰细致的结构体系，明确划定边界；海洋流动多变，难以进行细致的空间构造，无法明确界定政治文化边界。鉴于频频受挫的海上经验，欧亚主义者最终将俄罗斯界定为陆地文化空间，而把大西洋和太平洋所在的海洋空间一并划入西方。萨维茨基的“大陆-海洋”强调俄罗斯与海洋经济体的绝缘，只能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于世界海洋经济的大陆市场。^②

同样，当代俄罗斯公共意识和身份观念中也出现了向欧陆寻找认同的倾向，例如，大部分远东太平洋沿岸居民并未感受到亚洲认同，仍持欧洲导向，认为俄罗斯应当以欧陆国家的身份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③“新欧亚主义者”杜金（А.Г. Дугин）将大陆观念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例如发起国际欧亚运动，支持普京的欧亚一体化政策等。他援引法国学者让-帕尔乌列斯库（Ж. Парвулеско）的观点，指出实践中的大陆性质，普京仍具有第三罗马式的“天命观”，旨在缔造“欧亚大陆王国”和“新挪亚方舟”。^④在“转向东方”的背景下，俄罗斯重新从南部介入亚太的意图可视为历史惯性的结果。综合新欧亚主义者的观点，可进一步反思：俄罗斯的区域发展常与东方出现战略错位，对东西方各自的路径、边界和角色仍有不明确之处；或应更充分地考虑当代公共意识和身份观念中的认同取向，打破“要么与西方合作，要么融入东方”的历史惯性，厘清边界难题，将后苏联大陆区域聚合成具备主体性的大陆共同体，才有可能平等地与西方对话，也平等地与东方合作。^⑤

① Савицкий П.Н. Континент Евразии. М.: Аграф, 1997. С.297.

② Благих И.А. Евразийские идеи П.Н. Савицког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 2015. №.1. С.46-50.

③ Ларин В.Л. Меняющиеся образы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 созна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20. №.4. С.15-43.

④ Дугин А.Г. Параллельна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Жана Парвулеско// Парвулеско Ж. Путин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СПб.: Амфора, 2006. С.438-445. 有关“新欧亚主义”的海洋观念，参见 Королев А.А.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от идей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актике// Знание. Понимание. Умение. 2015. №.1. С.38-52; Парвулеско Ж. Путин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С.234.

⑤ Говоров Ю.Л.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С.10-20.

【Abstract】 Integration in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rom Southeast Asia is a controversial part of Russia’s “Pivot to the East” strategy. The “Coast-to-Canton” issue promoted by the fur trade in the 19th century provide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observing its feasibility. Contemporary Russian Orientalism advocates a “Russia-East-West” ternary structure, 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among public consciousness, identity concepts and geo-space construc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is issue. According to this perspective, travelogues of Russian explorers reveal the evolution of the role of the southern sea route in Russia’s Asia-Pacific affairs. In the 17th century, Milesco’s Canton expedition had an obvious goal of exploring new waters, which was a combination of “manifest of destiny” and modern geopolitic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Russian ships sailed to Canton for the first time, showing its orientation of Western colonial identity, triggering the “equal colonization” experiment in the South Pacific and the Belovodye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Ukhtomsky, the forerunner of Eurasianism, adopted the symbol of “sailor prince” when travelling eastwards to Canton with Nicholas II to explore the re-invention of the monarchy, 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integrated orientalism”. The southern sea route is a channel for exporting Russian values, who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are greater than trade ones; the maritime space continues to withdraw from the concept of “Eurasian Russia”, and neo-Eurasianists continue adjusting their borders from outside in to build a stable continental community. It’s imperative for Russia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ntity orientation in its contemporary public consciousness and to dispel dualistic antagonism, reflecting on the significance of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shaping its subjectivity.

【Key Words】 Coast-to-Canton, Russian Maritime Colonization, Russian Orientalism, “Pivot to the East”

【Аннотаци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через Юго-Восточную Азию является спорной частью «по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морским путём в Кантон», продвигаемое торговлей мехом в 19 веке, служи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примером для наблюдения за осуществимостью сегодняшней стратегии. Русский ориентализм отстаивает тройствен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Россия-Восток-Запад», подчеркивая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между геополитикой,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рукцией 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ю, что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данной пробле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записки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с э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эволюцию роли юж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в делах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в 17 веке экспедиция Милеску в Китай имела чёткую цель исследовать новые воды, что было точкой сочетания “провиденциализм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в начале 19 век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рабли приплыли в Кантон,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ориентацию на западную колони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запустив эксперимент “равная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в южном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и миграцию в Беловодье; в конце 19 века Ухтомский отправился на восток в Кантон, используя символ “принца-моряка”, чтобы исследовать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монархии, проверяя границы “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ого слияния”.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южный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является каналом экспорт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 и его функ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намного сильнее, чем функция торговли; мор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постоянно выходит из концепц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России” из-за её двусмысленности,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ео-евразийцы продолжают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свои границы с целью построения стабильн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ориентацию на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сознании, прояснить сложные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вопросы, выйти из бинарного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и задуматься о значении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субъектно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орской путь в Кантон,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рская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ориентализм,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责任编辑 肖辉忠)

能源与当代俄罗斯的国家认同 ——一项基于互文性话语框架的实证研究*

葛静深**

【内容提要】对当代俄罗斯官方文本、学术文本和流行文化中“能源认同”因素的分析表明，当代俄罗斯同时存在“能源超级大国”和“反能源超级大国”两种认同话语，二者在彼此排斥的同时，又推动了彼此的再生产。能源因素在21世纪俄罗斯“大国愿景”重新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俄官方着力将“能源超级大国”建构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即使在油价暴跌和全球能源转型时期，俄官方仍然坚持自己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身份。但在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及应对层面，俄官方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路线图，也未形成稳定的话语框架——其“能源超级大国”话语更多表现为一种“大国姿态”的自我主张和外交层面的“表演”。“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将俄罗斯与西方的能源贸易视为一种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与文明身份的威胁，这种不安全感反向支持了“能源超级大国”认同的稳定性。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俄过去倡导的“能源市场去政治化”愈发艰难，将能源因素纳入其历史记忆，并以此维持自我身份的合法性，成为近期俄官方主导“能源认同”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俄罗斯能源 俄罗斯石油 俄罗斯国家认同 互文性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D75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2)02-0159(34)

*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齐鲁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21DYJ05）、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013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别尔哥罗德国立大学（俄罗斯）博士研究生赵鹏博搜集并提供部分研究材料。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葛静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与俄罗斯相关的能源政治议题一直在国际关系领域备受关注。就俄罗斯的能源议题而言，一些西方现实主义研究者认为，俄罗斯拥有所谓“能源武器”，并试图利用该武器建立一个新的“能源帝国”；^①而俄罗斯的领导层则专注于“能源地缘政治”，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作为一种权力工具。^②对于自由主义研究者来说，更具价值的议题，是如何通过市场和制度的逻辑，将俄罗斯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转变为“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以确保更高的经济效率并降低紧张的政治局势。^③

无论是将国际能源关系视为零和还是正和博弈，分析过程大多高度集中于能源政治的物质现实，从社会角度探讨能源关系的研究相对欠缺。以俄欧能源关系为例，如果在分析过程中只考虑物质现实，那么诸如“俄罗斯与欧盟如何为二者之间的能源关系‘赋予意义’”“俄欧之间的能源关系是如何

① 参见 Anita Orban, *Power, Energy, and the New Russian Imperialism*,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8; Zeyno Baran, “EU Energy Security: Time to End Russian Leverag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7, Vol.30, No.4, pp.131-144; Elena Kropatcheva, “He Who Has the Pipeline Calls the Tune? Russia’s Energy Powe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hale ‘Revolutions’”, *Energy Policy*, 2014, Vol.66, No.3, pp.1-10; Jeffrey Mankoff, “Eurasian Energy Security”,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43,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② 参见 Pavel K. Baev, “Russian Super-Giant in Its Lair: Gazprom’s Role in Domestic Affairs”, In *Europe’s Energy Security: Gazprom’s Dominance and Caspian Supply Alternatives*, edited by Svante E. Cornell and Niklas Nilsson, Washington, DC, and Stockholm: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8, pp.59-70; Pavel K. Baev, *Russian Energy Policy and Military Power: Putin’s Quest for Greatness*, London: Routledge, 2012; Marshall Goldman, *Petrostate: Putin, Power, and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参见 Tatiana Romanova,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on the Energy Dialogu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08, Vol.16, No.2, pp.219-230; Tatiana Romanova, “Russian Energy in the EU Market: Bolstered Institutions and Their Effects”, *Energy Policy*, 2014, Vol.74, No.12, pp.44-53; Tatiana Romanova, “Is Russian Energy Policy towards the EU Only about Geo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Third Liberalisation Package”, *Geopolitics*, 2016, Vol.21, No.1, pp.1-23; Tatiana Romanova, “Institutional Levels of Analy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EU Relation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search Journal*, 2016, Vol.11, No.4, pp.224-248; Andreas Goldthau, “Resurgent Russia? Rethinking Energy Inc.”, *Policy Review*, 2008, No.147, pp.53-63; Andreas Goldthau, “Rhetoric versus Reality: Russian Threats to European Energy Supply”, *Energy Policy*, 2008, Vol.36, No.2, pp.686-692.

受身份认知的影响而被解释为“威胁”或“利好”等重要问题将无从解答。^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传统为能源政治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研究视角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方案。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能源关系是一种复杂、动态、相互依存的社会进程的产物，反映在行为体表征自我与他者的各种身份与叙述之中。卡希尔（Tom Casier）、德巴德来本（Joan DeBardeleben）、克拉托奇威尔（Petr Kratochvíl）、蒂奇（Lukáš Tichý）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影响俄欧能源政治进程的不仅仅是物质现实，国家身份认同以及话语政治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本文将沿着这一建构主义研究传统展开。^③笔者将对俄罗斯的“能源认同”进行实证性话语分析，力图为俄罗斯的能源政治研究提供一个更加细致的理论视角，探讨能源在俄罗斯国家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挖掘俄罗斯的国际能源战略与其国家身份认同、战略叙述以及社会思潮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能源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一个庞杂的概念，包括民族认同、公民认同、政治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国家认同将自我的内部与外部感知联结在一起，在同一国家（民族）的成员之间产生一种同胞之情，同时使其意识到自

① Petr Kratochvíl, Lukáš Tichý, “EU and Russian Discourse on Energy Relations”, *Energy Policy*, 2013, No.56, p.393.

② 参见 Tom Casier, “Russia’s Energy Leverage over the EU: Myth or Reality?”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1, Vol.12, No.4, pp.493-508; Tom Casier,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ing the Normative Argument”, *Europe-Asia Studies*, 2013, Vol.65, No.7, pp.1377-1395; Joan DeBardeleben, “Applying Constructivism to Understanding EU-Russi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2, Vol.49, No.4, pp.418-433; Petr Kratochvíl, Lukáš Tichý, “EU and Russian Discourse on Energy Relations”, *Energy Policy*, 2013, No.56, pp.391-406.

③ 本文的实证研究借鉴汉森（Lene Hansen）的后结构主义互文性话语分析框架，该框架可纳入广义的建构主义传统。根据伊曼纽尔·安德勒（Emanuel Adler）的观点，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包括：现代建构主义、现代语言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参见 Emanuel Adler, “Constructiv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96-98.

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①一个独特的国家认同需要的基本要素至少包括：与特定国土、祖国的联系（或共同的“缺乏联系”），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政治意愿，对一套共同价值观的信念，以及共同的大众文化记忆。^②

国家认同的内外边界是由各种标志物构成的。这些标志物来自社会建构，通常会被严格控制——传统上由群体内的政治精英所主导，但今天的大众文化同样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社会建构的标志物对国家认同的形成极其重要，它们将长期维持“群体内”与“群体外”之间严格的身份差异。^③对于一些能源禀赋充裕的国家来说，能源因素往往能够构成其国家认同的重要标志物，这尤其适用于一些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叙事中充满了对“黑金”（black gold）的自豪感，涵盖了与石油工业相关的所有活动：从作为高危行业的石油勘探到带来巨额财富的石油贸易。^④

在国家认同相关的能源叙述中，石油一直是最重要的元素，这与石油所能创造的巨额国家财富有关。历史上，对本国石油这一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常被认为是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重要象征。1938 年，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对墨西哥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改革被视为该国“仅次于革命本身的民族独立运动”^⑤。在墨西哥改革的激励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之后发起了追求石油主权的政治、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对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⑥比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虽然在西方的干预下未获成功，但却直接推动了伊朗民族主义运动在之后几十年的不断发展。^⑦到

① Manfred Beller, “Perception, Image, Imagology”, In *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 - A Critical Survey*, edited by Joep Leerssen and Manfred Beller,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7, p.12.

②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③ 参见 Sandra Joirema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London: A&C Black, 2003.

④ 参见 Robert Vitalis, *America's Kingdom: Mythmaking on the Saudi Oil Frontier*,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teffen Hertog, *Princes, Brokers, and Bureaucrats. Oil and the State in Saudi Arab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⑤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Chapt.14; George Philip, *Oil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ationalist Movements and State Compan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⑥ 孙学峰、王海滨：“中国获取全球石油资源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0 年第 1 期。

⑦ James Bill, William Louis, *Musaddiq, Iranian Nationalism, and Oi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8.

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所有拉美、中东地区的产油国都建立了本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石油叙事与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以及民族自豪感直接相关，是国家叙事中最重要的标志物之一。

对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产油国来说，石油元素也迅速被纳入其崭新的国家叙事之中。^①以阿塞拜疆为例，其国家叙事中的石油认同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早在19世纪90年代，在现代阿塞拜疆国家身份出现之前，巴库就已经成了全球石油工业的中心之一。在20世纪后半叶苏联将石油工业重心转移至伏尔加河中游以及后来的西西伯利亚地区之前，阿塞拜疆地区的石油产量超过苏联石油总产量的一半。^②直到苏联解体，阿塞拜疆一直是支撑苏联石油工业的设备制造中心。而在独立之后，与能源相关的历史成为阿塞拜疆支撑其“崭新国家故事”的叙事资源：雄厚的石油工业可以建构其国家身份的独特性，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潜在“身份认同威胁”；同时，石油工业可以推动阿塞拜疆迅速融入全球经济。因此，对阿塞拜疆等后苏联国家来说，石油象征着国家身份的现代性以及广泛的国际认可；对本国境内石油资源的自豪感和对自己作为“阿塞拜疆人”或者“哈萨克斯坦人”的自豪感，在实践、逻辑和意识形态层面上都具有显著的关联性。

在国家叙事中纳入能源认同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一些在现代国家身份确立很久之后才在本国发现油气资源的西方国家，也倾向于将本国的能源财富视作祝福而非诅咒，尽管会存在一些争论。围绕着能源的争论主要来自与之相关的环境议题，以及对“荷兰病”、国内制造业空洞化等的担忧；但这些消极因素往往可以被其他积极因素所中和。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官方话语常常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本国能源行业的技术成就进行积极叙述。挪威则开创了与能源相关的主权财富基金模式，将大部分石油收入作为国家储备资产；这一模式已被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广泛采用。^③事

^① Wojciech Ostrowski, *Politics and Oil in Kazakhst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auline Luong Jones, Erika Weinthal, *Oil is Not a Curs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Nathaniel Moser, *Rus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861-2008: A Case Study of the Oil Indust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09.

^③ Edwin M. Truman, *Sovereign Wealth Funds: Threat or Salvation?*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实上，挪威国家身份中的能源认同，能够部分解释其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中的所谓疑欧主义^①：1972、1994 年两次挪威全民公投的结果（拒绝加入欧共体/欧盟），可以部分归因于丰富的油气资源所创造的国家财富带给挪威人的底气。^②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能源却未被纳入其国家叙事与认同的核心。比如，英国的北海石油在 20 世纪 80 年代贡献了超过 10% 的财政收入，但在撒切尔夫人的话语中，几乎从未出现关于石油收入的只言片语。^③部分原因是西方语境中关于石油的道德讨论——偶然发现的石油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具有某种“道德污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的石油储备主要来自苏格兰的东北部，离“伦敦的精英阶层”非常遥远，因此，“英国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对于石油的想象力几乎为零”^④。而在另一方面，丰富的石油储备是苏格兰民族党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依托。苏格兰民族党在宣传苏格兰独立主张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北海石油能够给苏格兰人带来巨大的利益。^⑤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和南苏丹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油气资源是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中“政治信心”的关键来源。^⑥

前文的分析表明，能源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认同标志物，能够在国家叙事、国家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能源叙事中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能源诅咒”等），但这些消极因素可以被历史、技术、民主等其他积极因素所中和。同时，并不是所有的能源生产国都愿意被贴上“能源国家”的标签，能源在国家认同中的地位取决于国家叙事“情节的需要”。

三、“石油国家”还是“大国”：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复杂性

长期以来，俄罗斯的外在国家形象与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密切关联：石油

① 李明明：“论挪威的疑欧主义及其‘欧洲问题’”，《欧洲研究》，2010 年第 6 期。

② Richard Milne, “Norway: Cruise Control”,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2014.

③ Charles More, *Black Gold: Britain and Oil in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Continuum, 2009.

④ Ian Jack, “North Sea Oil Fuelled the 80s Boom, but It Was, and Remains, Strangely Invisible”, *Guardian*, April 19, 2013.

⑤ 岳鹏：“苏格兰独立公投视角下的民族主义结构矛盾”，《欧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⑥ Gavin McCrone, “North Sea Oil is Key to an Independent Scotland”, *The Guardian*, March 10, 2014.

和天然气工业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俄罗斯向海外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西方媒体热衷于将俄罗斯打造为一个庞大而危险的“能源国家”，比如《经济学人》杂志就常常刊载相关主题的讽刺漫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俄罗斯符合一个“石油国家”的所有特征；^①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庞大而齐全的制造业基础（包括军事工业在内）使其明显区别于其他的“典型石油国家”。^②当然，这种“非典型性”无疑增加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性”与“破坏力”。

而能源因素在俄罗斯的自我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俄罗斯的历史以及多民族现状，使得利用民族要素建构国家身份的战略选择不具备现实可行性；^③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身份随之发生剧变，作为身份认同的“苏联人民”（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消失于历史舞台。“苏联人民”是一种跨民族身份，这一身份认同具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二是以强大军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象征）、科技（以1957年发射的人造卫星为象征）实力为基础的大国身份。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失去了意识形态基础，而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也几乎完全丧失了曾经的大国身份。齐甘科夫（A. Tsygankov）提出的西方主义、国家主义和文明主义，^④大致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俄罗斯在国家认同层面的三大主流思潮。比如，西方主义认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主张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国家”；一些文明主义支持者则认为，新的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以俄罗斯族人口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的缺失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该问题在普京上台之前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旷日持久的两场车臣战争的深层原因即是民族认同问题。

进入21世纪，随着俄罗斯政治进入普京时代，国家主义思想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俄罗斯官方开始贯彻新的内政、外交理念，以恢复俄罗斯在全球

① Marshall Goldman, *Petrostate: Putin, Power, and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Thane Gustafson, *Wheel of Fortune. The Battle for Oil and Power in Rus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2, p.6.

③ P. Duncan, “Contemporary Russian Ident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Historical Journal*, 2005, Vol.48, No.1, pp.277-294.

④ A.P.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4-7.

事务中的地位。^①如前文所述，苏联时期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是大国身份，而普京执政的一个长期目标即是恢复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中“应有的”大国地位。2000 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最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大国之利益的重要地位”^②。2013 年的《构想》重申了这一点，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为“确保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先地位，成为现代世界中最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一极”^③。普京为俄罗斯带回了诸多国家认同标志物，从克里姆林宫卫队的制服到曾经的苏联国歌旋律。第二次车臣战争和 2008 年俄格战争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俄罗斯大国姿态初步的国际展现，俄罗斯围绕着大国身份而形成的国家认同逐渐稳固。而从普京第三任期开始，随着俄罗斯周边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俄官方政策导向明显表现出民族主义转向，多数俄罗斯人也将克里米亚的“回归”视为俄罗斯大国地位复兴的关键一步。^④

很多学者曾论证过俄罗斯的大国意识。莱格沃尔德 (R. Legvold) 认为，“大国” (Державость)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和观念，对俄罗斯来说有特殊意义——越是在危难时刻，俄罗斯人越是表现出对于恢复自我大国地位的渴望，“无论有没有与之对应的实力，他们都会坚持自我对于大国角色和大国影响的天然权力”^⑤。乌尔诺夫 (M. Urnov) 将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定位为“全球舞台上的一个独立角色，能够挑起恐惧以赢得尊重，并具有将自我意志强加于人的能力”^⑥。波波·罗 (Bobo Lo) 则认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大国意识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基于其对自我全球地位的信念，即坚信俄罗斯

① E.B. Rume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eyond Putin*,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7, pp.7-8.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1 июля 2000 г. https://www.ng.ru/world/2000-07-11/1_concept.html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13.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https://legalacts.ru/doc/kontseptsija-vneshnei-politiki-rossiiskoi-federatsii-utv-prezidentom/>

④ Levada Center, March 23, 2015, <http://www.levada.ru/23-03-2015/krym-i-rasshirenierossiiskikh-granits>

⑤ Robert Legvol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Robert Legvold (e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Shadow of th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14.

⑥ Mark Urnov, “Defeating the authoritarian majority: an uneasy agenda”, in Vladislav Inozemtsev and Piotr Dutkiewicz, *Democracy versus Modernization: A Dilemma for Russia and for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65-76.

理所当然拥有参与任何对其自身利益有重要影响之事务的权力。^①

大国意识在俄民众的认知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在列瓦达中心的一项长期调查中，俄罗斯的受访者被要求在“生活水平提高但丧失大国地位”和“成为受人尊敬、令人害怕的大国”之间做出选择——2003年，有54%的人选择了“生活水平”，另外43%的人选择“成为大国”；而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时代背景下，有63%的受访者选择“生活水平”（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有35%的受访者坚持选择“成为大国”。^②根据“全俄社会舆论中心”（ВЦИОМ）2021年的一项调查，51%的受访者认同“俄罗斯必须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影响世界政治能力的大国”。为了达成这一目标，47%的受访者认为，公民个人可以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③与这一调查结果形成鲜明呼应的是，在2022年2月俄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之后，抛开在战场和国际舆论场合遇到的诸多阻力，以及西方对俄发起的严苛制裁，在2022年3月5日的民调中仍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支持此次行动，且认为行动“相当成功”。^④

在“全俄社会舆论中心”2020年的一项调查中，尽管只有31%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应是“重获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相比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了11%），但仍有44%的受访者将国家发展的目标确定为“10-15个经济发达、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之一”。^⑤如果说不利的外部环境以及近年来俄罗斯难称顺利的发展局面让相当一部分俄民众放下了超级大国的执念，但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仍然是多数俄罗斯人对其国家地位认知的底线。

① Bobo Lo,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Reality, Illusion and Mythmaking*,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53.

② Levada Center, *Public Opinion 2020. Yearbook*, Moscow: Levada Center, 2020, <https://www.levada.ru/sbornik-obshhestvennoe-mnenie/obshhestvennoe-mnenie-2020/>

③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цели, приоритеты, императивы. 12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i-obzor/gosudarstvo-i-obshchestvo-celi-prioritety-imperativy>

④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Арм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на фон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5 марта 2022 г. <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i-obzor/armija-i-obshchestvo-na-fone-specialnoi-voennoi-operacii>

⑤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Цели России в XXI веке. 15 сентября 2020 г. <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i-obzor/czeli-rossii-v-xxi-veke>

鉴于大国意识对于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性,对俄罗斯国家认同中能源问题的讨论,必须与俄罗斯的大国认同相结合。油气资源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是俄罗斯国内经济的“火车头”。但如前文的民调结果所述——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经济的发展未必能为俄罗斯带来大国地位,公民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福祉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让位于争取大国地位的国家行动。在俄罗斯民众看来,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主要来源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能源财富与大国地位之间似乎没有明确的相关性;并且,由于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官僚、腐败问题,能源财富与国家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甚至还“非常可疑”。

这种矛盾的逻辑同样反映在俄官方的能源政治问题上。油气资源在俄罗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其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贡献并没有那么不言自明,二者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反西方”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俄罗斯的国内团结,却与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利益相反——俄罗斯的油气部门需要向国外出售能源以获得利润,而俄罗斯对高纬度、北极地区新油田的开发也需要来自西方国家的技术支持。在俄罗斯能源问题上,地缘政治安全 and 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明显冲突,这种冲突必然反映在俄罗斯的国家能源叙事之中。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具体文本对俄罗斯官方及社会语境中的能源叙事进行分析,揭示能源因素在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中的复杂地位。

四、研究设计

为了进一步探讨能源在俄罗斯国家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将利用互文性话语分析框架,对当代俄罗斯的能源认同进行实证性话语分析。分析的重点集中在各行为主体对与俄罗斯能源相关的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话语表述,并以此为基础考察这些话语之间是如何通过“互文性”联结而固定为话语框架、最终转化为知识系统、建构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的。

(一) 理论依据:“互文性”话语分析框架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分析者并不试图检查任何话语版

本或者主张的真实性，而是试图了解现实是如何被话语所建构的。”^①这一论断后来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话语分析研究范式的思想源泉。正如福柯所说，“陈述所需遵守的物质性规则属于制度的秩序而不是时空定位的秩序”，因此语言具有“重新编排和复制”客观现实的可能性，人们可以通过对语言的“生产、操控、使用、传播”以实现对外在世界的“联结、分解、重构甚至摧毁”。^②

本文借鉴汉森（Lene Hansen）的“互文性”话语分析理论框架。该理论的核心议题是身份的话语建构。因此，该方法非常适合用来分析本文中的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问题。^③在“互文性”话语分析的过程中，身份认同的建构被置于一个严谨的研究框架之内，研究哪些符号被特殊的话语或文本表达出来，它们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以实现一种话语稳定性；哪些地方会出现一些不稳定性和“小错误”，以及其他竞争话语是如何把同样的符号建构出不同结果的。^④话语是不稳定的，任何政策和身份之间的联系或是对身份的表达也不会绝对稳定；话语的不稳定性也为改变身份或对外政策提供了施动性的空间，为解构既有事实、挑战主导话语、引发变革提供了可能。

根据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一个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由文本本身所赋予，而总是阅读和诠释其他文本的产物；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⑤因此，尽管官方话语赋予了国家行动以合法性，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理解国内、国际政治与社会关系都非常关键，常被作为话语分析的起点；但所有官方对外政策文本是存在于一个更大的文本网络之中的，而非脱离广大社会话语而存在；这个文本网络还包括其他政策文本，涉及新闻、学术作品、流行非虚构文学作品，甚至还包括虚构性的大众文化产品等。

① Stephanie Taylor, *What Is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p.35.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pp.97-103.

③ 参见葛静深：“‘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3期；葛静深：“俄罗斯北极宏观区域身份的多维话语建构”，《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丹]莱娜·汉森：《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孙吉胜、梅琼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48页。

⑤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7.

基于“互文性”概念，汉森开发了一套“互文性研究模型”，主要包括四种互文性话语分析模式，每一种都有各自的分析重点、分析对象和分析目标，将研究重点从官方话语扩大至更广泛的行为体、文本和媒介。

表 1 互文性研究模型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A	模式 3B
分析重点	官方话语： 国家领导人 政府 高级公务员 高级军人 国际机构领导人 国际机构官方声明	广泛的对外政策辩论： 政治反对派 媒体 企业机构	文化表象： 通俗文化 高雅文化	边缘政治话语： 社会运动 非法结社 学术界 非政府组织
分析对象	官方文本： 直接和次级 互文性联系 支持性文本 批判性文本	政治文本： 议会辩论 演讲、声明 媒体文本： 社论 现场报道 观点-辩论 企业机构文本： 公关活动 重复的互文联系	电影、小说、 电视、游戏、 摄影、漫画、 音乐、诗歌、 绘画、建筑、 游记、自传	边缘报纸、网站、 书籍、宣传册 学术文本
分析目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通过互文性联系确定稳定的官方话语（基本话语） • 确定官方话语应对的批评话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官方话语霸权 • 官方话语的可能转变 • 媒体话语的内在稳定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文化表象中身份的沉淀或再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非民主政府中的抵制活动 • 对“模式 1”“模式 2”话语霸权的挑战 • 学术辩论

资料来源：[丹]莱娜·汉森：《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孙吉胜、梅琼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69 页。

（二）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在模式 1、模式 3A、模式 3B 的框架内收集材料进行分析。^①其中，模式 1 直接建立在对官方话语的分析基础之上，着重分析

① 关于“互文性研究模型”中各种分析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考[丹]莱娜·汉森：《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第 64-70 页。

有批准对外政策官方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在执行这些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人的话语行为，目标在于仔细研究官方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除了官方文本，互文性话语分析还格外关注大众文化。模式 3A 引入对大众文化产品的分析，尤其关注大众文化是如何再现、传播或挑战官方话语表象的。事实上，大众文化以一种隐性的形式勾连了精英、大众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围绕着各种流行文化制品所形成的无穷无尽的日常社会互动，影响民众看待自己和外在世界的方式；同时，大众文化产品中表征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叙事，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这反过来将再生产的“大众地缘政治脚本”反馈给精英阶层，从而影响宏观层面的地缘政治理念、国家安全战略及外交政策等。^①

除了模式 1 和模式 3A，本文还引入了模式 3B 中对学术文本的分析。尽管今天的俄罗斯也存在边缘性的“反普京”“反政府”社会运动，但在当代俄罗斯国家认同问题的探讨中，真正有价值的“边缘话语”更多存在于学术界，比如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②

具体来说，笔者在模式 1 框架内选取了 2000-2021 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统发布的国情咨文、2012 年以来普京在公开场合发表的与能源议题相关的部分政治演讲、2012 年以来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舒利吉诺夫（Н.Г. Шульгинов）、前部长诺瓦克（А.В. Новак）、前副部长捷克斯列尔（А.Л. Текслер）、伊纽岑（А.Ю. Инюцын）、亚诺夫斯基（А.Б. Яновский）等在公开场合发表的部分演讲，共 92 个文本作为官方话语的分析材料。在模式 3A 中，笔者主要关注 2015 年俄罗斯能源部发起的名为“伟大胜利中的能源”（Энерг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的社会运动、俄罗斯当代艺术家丘马克（А. Чумак）、洛日金（В. Ложкин）、金托夫特（А.Ю. Беляев-Гинтовт）、莫洛德金（А. Молодкин）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共 40 个文本作为大众文化话语

① 葛静深：“大众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身份政治与‘他者’形象——以美俄（苏）之间的大众文化形象建构为个案”，《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

② 本文没有将模式 2 纳入研究框架。模式 2 关注政治反对派、媒体和企业机构所产生的“更广泛的政治辩论”，但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语境中，政府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和所谓“政治霸权”，不具有美国、西欧的“政治辩论”语境，因此将这一部分纳入分析的价值有限。

的分析材料。在模式 3B 中，笔者选取了米特罗娃（Т.А. Митрова）、萨利霍夫（М.Р. Салихов）、卡皮托诺夫（С. Капитонов）、格鲁舍文科（Е. Грушевенко）、莫夫昌（А.А. Мовчан）五位公共知识分子于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发表的评论文章，共 20 个文本作为学术话语的分析材料。

表 2 本研究选取的分析文本

	模式 1	模式 3A	模式 3B
文本内容	国情咨文：2000-2021 政治演讲： 总统 普京 梅德韦杰夫 俄罗斯能源部 舒利吉诺夫 诺瓦克 捷克斯列尔 伊纽岑 亚诺夫斯基	社会运动： “伟大胜利中的能源” 艺术家： 丘马克 洛日金 金托夫特 莫洛德金	公共知识分子： 米特罗娃 萨利霍夫 卡皮托诺夫 格鲁舍文科 莫夫昌
数量	92	40	2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编码原则与分析步骤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笔者利用质性分析软件“MAXQDA2020”管理所收集的数据集，并对所有文本进行编码分析。

第一步：对收集的所有文本进行初步的开放性（归纳）编码。这一过程围绕两个基本问题：

- （1）俄罗斯的国家身份是如何被界定并表述的；
- （2）俄罗斯与自己的能源财富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界定并表述的。

在阅读和编码过程中，笔者利用这两个问题来审视数据集中的每一个文本，以确定其中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主题、概念以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并对这些代码进行概念性分类，形成俄罗斯“能源认同”的总体性话语框架。

第二步：2012 年后，由于俄罗斯面临的内外政治局势和宏观经济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对本文的研究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

笔者筛选出了 2012-2021 年的 57 篇官方文本，进行进一步的个案分析。为了详细考察这一时期俄官方的能源话语结构，本部分研究将借鉴“框架理论”的分析模式，对这些文本重新进行混合式编码。

第三步：在前两步编码结果的基础之上，总体分析近 20 年来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建构与其能源财富之间的关系，挖掘、梳理、比较俄罗斯能源政治和身份认同中的主导性话语结构，并追踪话语的历时性变化。

五、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俄罗斯

互文性话语分析强调要从文本中解读基本话语。一般来说，对外政策的辩论总是围绕有限的几个话语展开的，这些话语就是基本话语。基本话语往往由围绕共同主题、身份、政策的多种文本构成，是理解身份与对外政策的关键；通过基本话语，可以发现表述身份与政策的主要不同观点。基于前文步骤的编码分析表明，“能源超级大国”话语是当代俄罗斯国内政治语境中的一个基本话语，与俄罗斯对内、对外的国家认同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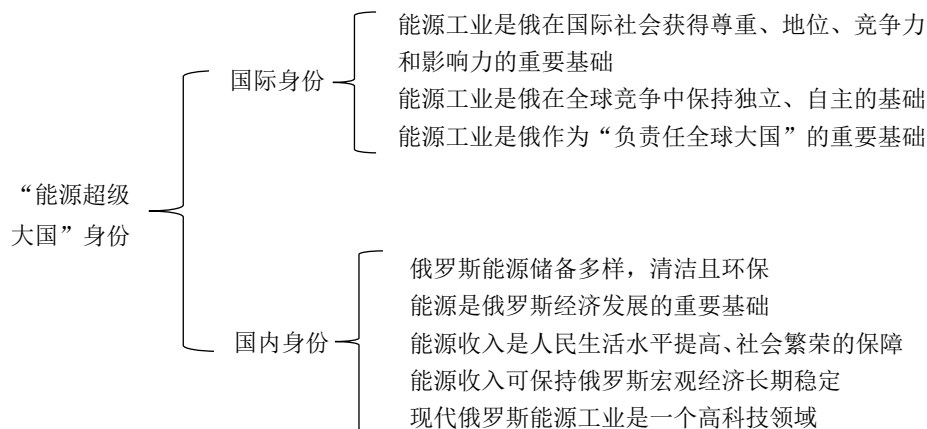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身份认同的话语结构

在国内层面，俄罗斯能源储备多样，是经济发展、人民福祉、社会繁荣的基础，能源租金收入能够保持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定。而在对外层面，发达的能源工业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关键，也是俄罗斯作为“负责任全球大国”辐射影响力的基础。

（一）苏联解体后俄官方“能源认同”的建构历程

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的国家认同，首先是基于油气行业在俄罗斯国家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油气工业与俄罗斯其他工业部门一起遭受转型衰退。到 1995 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与 1989 年的峰值相比已经“腰斩”。之后，世界石油价格的低迷使得俄罗斯能源工业雪上加霜。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俄罗斯的石油行业被匆忙地私有化，石油市场被十几家相互竞争的合资、私营石油公司瓜分，并出现了卢克、尤科斯和苏尔古特三家新兴石油巨头。^①通过 1995-1996 年的债转股，一些石油公司（如尤科斯）落入了新兴的金融寡头手中；另一些石油公司则仍然处在地区精英（如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以及效忠克里姆林宫的实业家（如卢克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的控制之下。与石油行业相比，俄罗斯的天然气行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并未受到私有化浪潮的冲击。在原苏联天然气工业部部长、1992-1998 年担任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В.С. Черномырдин）的主导下，苏联天然气工业部被保留、改组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由国家控股，保留了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和管道运输网络的垄断权。^②

进入 21 世纪，普京通过一系列果断举措，使俄罗斯政府重新获得了对国家能源行业的控制权。^③在 2003 年以偷税漏税等罪名逮捕创始人霍多尔科夫斯基（М.Б.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之后，国有独资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接管了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资产。随后在 2005 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

① 参见 Li-Chen Sim,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vatization in the Russian Oil Indust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Thane Gustafson, *Wheel of Fortune. The Battle for Oil and Power in Rus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2.

② Jonathan Stern, *The Future of Russian Gas and Gazpr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Michael Bradshaw, “The Kremlin, National Champ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il Compan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ussian Oil and Gas Industry”, *Geopolitics of Energy*, 2009, Vol.31, No.5, pp.1-14.

公司收购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重新控制能源行业，是俄罗斯中央权力得到重新确立，经济复苏并开始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认为，能源因素在 21 世纪俄罗斯大国愿景重新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俄政治精英普遍认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必须在国际上得到重新认可，但直到普京第二任期的国际油价暴涨时期，以俄罗斯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重新控制为基点，俄罗斯 21 世纪的大国之路才真正寻找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口。

上台之初，普京将俄罗斯外交的首要目标界定为维持外交战略的独立性，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①并指出俄罗斯应坚持与其他国家建立“利益平衡、互利合作、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国家关系，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②在 2002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人打算对我们有敌意——没有人希望这样，也没有人需要这样。但也没有人特别对待我们，没有人要特别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自己在‘阳光经济’下争取一席之地”；并指出，俄罗斯正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找到盟友和自身成为其他国家的可靠盟友尤为重要”。^③在这一背景下，油气工业显然是这一时期俄罗斯融入欧洲、融入世界经济的战略依托之一。“在中断了十年之后，我们的石油产量已经回到了世界第二位，在能源贸易方面回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我们必须明智地利用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新地位”^④；“（自 1999 年以来）俄罗斯的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出口增长了 18%，今天的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出口国之一”^⑤。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能源工业所创造的财富客观上推进了俄罗斯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

在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2004-2008）结束时，依靠持续多年的高油价，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复苏：“在经历了多年的工业衰退之后，俄罗斯联邦的经济不仅实现了全面好转，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十大经济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8 июля 2000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480>

②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 апреля 2001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216>

③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апреля 200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567>

④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апреля 2002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567>

⑤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6 мая 200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1998>

体之一。”^①俄罗斯中央政府在這一时期成功实现了对国家能源综合体的完全控制，并在这一过程中明确拒绝将国家能源工业“安全化”，积极将能源作为推进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工具和杠杆。^②与国际油价上涨、俄罗斯经济复苏同步发生的，是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模式的转变。2005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主权民主”思想，这也标志着以“俄罗斯新思想”为代表的普京特色发展模式的基本确立；2006 年，俄罗斯进入所谓“主权民主”思想时期，并在 2008 年后逐渐符号化为“俄罗斯保守主义”。

尽管能源所创造财富的激增与俄罗斯主权民主思想的确立，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政治发展理念的转变并不一定由“不断增长的能源租金直接驱动”。“主权民主”思想反映出的是普京本人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混乱局面的反思，以及他为“纠正那个时代的错误”而做出的努力；虽然俄罗斯政治的“威权主义”转向明显受益于 21 世纪初石油租金的暴涨，但高油价只是为普京实践其政治理念创造了物质条件，而非内因。^③普京的“主权民主”和“俄罗斯保守主义”理念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套体系可以完整地诠释俄罗斯历史，并能够预测未来。^④

（二）油价暴跌、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俄官方的“能源认同”建构

如前文所述，普京前两个任期内俄罗斯国力的复苏与大国影响力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能源创造的大量财富。从这一意义上说，能源财富为普京模式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能源是 21 世纪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底色，哪怕西方话语常常对俄罗斯的“能源超级大国”地位进行污名化（如拉夫罗夫 2007 年所说，西方常指责俄罗斯的“能源勒索”，“将能源超级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6 апреля 2007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203>

② Pavel K. Baev, “From European to Eurasian Energy Security: Russia Needs and Energy Perestroik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2, Vol.3, No.2, p.178.

③ Robert W. Orttung, “Energy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Sociopolitical Aspects of Russia’s Energy Wealth”, in *Russian Energy Power and Foreign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dited by Jeronim Perovic, Robert W. Orttung and Andreas Wen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54-55.

④ Anne Applebaum, “Putinism: The Ideology”,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February 2013, <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updates/LSE-IDEAS-Putinism-The-Ideology.pdf>

大国的可疑地位强加给我们”^①），但对手反对的可能恰恰是值得坚守的，正如诺瓦克 2013 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经济的‘火车头’，限制其发展在经济上是不切实际的。”^②

在能源价格高涨的时期，俄官方没有任何理由将自我的身份认同与能源财富进行“脱钩”。那么在油价暴跌的背景下呢？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能源市场动荡，梅德韦杰夫在其著名的《俄罗斯，前进！》一文中，直接将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定位为“原始经济”和“过时的习惯”，认为背负着能源“重担”的俄罗斯将“没有未来”。^③而乌克兰危机、西方的大规模制裁、“双碳”背景下的气候议程以及 2020 年以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近年来持续影响着俄罗斯的外部能源市场环境。但从笔者所收集的文本分析来看，梅德韦杰夫的说法，只能看作是俄官方在较长时期内能源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从普京的第三任期开始，“能源超级大国”的身份认同重回俄官方话语的舞台中央，与俄外部的恶劣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深入探讨国际能源市场动荡背景下俄官方能源认同的建构倾向，笔者对 2012-2021 年的 57 篇官方文本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该部分的编码原则采用混合编码模式：首先，笔者依据“框架理论”，对这 57 篇文本进行第二轮归纳编码，将代码按照问题的定义、原因诊断、道德判断、解决方案这一规则进行分类。^④之后，笔者采用斯坦西克（Andrej Stancik）等学者的方法，将国际能源关系中的大国地位分解为三大组成要素（即三个演绎代码）：利益确认、关系平衡和尊重，^⑤并将这三大要素同归纳代码中与其内

① Лавров С.В.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7. №.2.

② Новак А.В. Приорите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6 декабря 2013 г. <https://minenergo.gov.ru/node/3380>

③ Медведев Д.А.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10 сентября 2009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13>

④ 本文采用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观点，将“框架”定义为“选择可感知现实的一些方面，并使它们在一个交流的文本中更加突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促成一个特定问题的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或处置建议”。参见 Robert M.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Vol.43, No.4, pp.51-58.

⑤ 参见 Andrej Stančik, Jan Osička, Indra Overland, “Villain or victim? Framing strategies and legitimation practices in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on the European Union’s Third Energy Package”,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021, Vol.74.

容重叠的部分进行广泛的比对、合并，产生三组混合代码——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全球能源安全与合作、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及俄罗斯应对，分别对应了利益确认、关系平衡以及尊重这三大要素。这三组混合代码的形成过程本身，证明了这一时期俄官方的能源话语结构与其“能源超级大国”的自我定位是吻合的。这三组混合代码也代表了 2012-2021 年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话语的三个主要的互文性框架（如图 2-4 所示）。可以认为，该套混合代码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 2012 年以来俄官方“能源超级大国”认同话语的基本结构。

1. “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话语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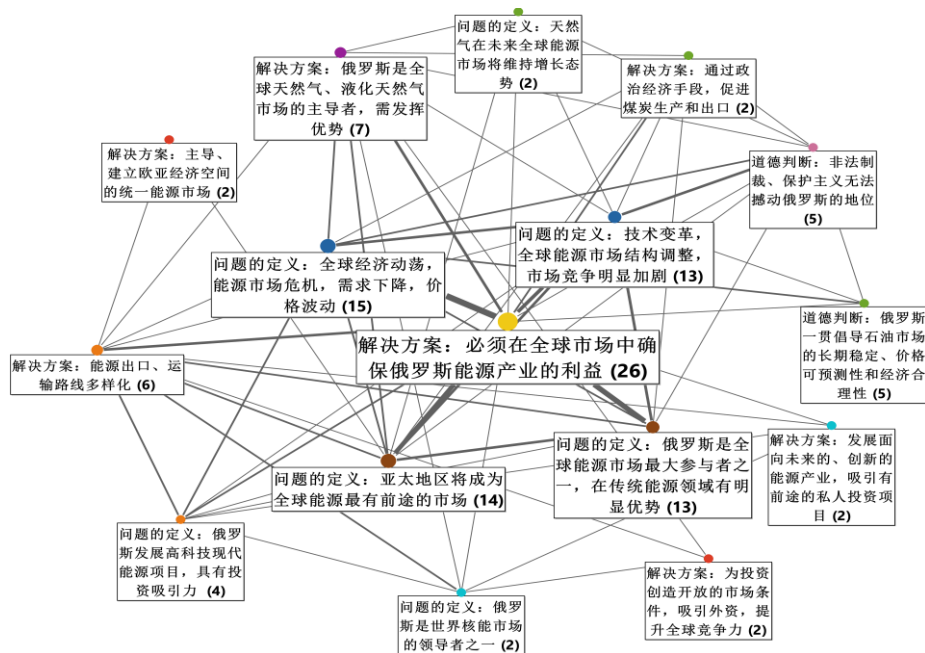


图 2 “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话语的互文框架图^①

① 该图由 MAXQDA2020 软件自动统计、生成，框内文字为笔者根据文本内容和编码规则编写的内容代码，代码后的数字为该代码在文本集中（57 篇）出现的总频次，图中统计了所有频次大于 1 的代码。在同一文本中共同出现的两组代码之间会自动生成一条直线，线条的粗细代表了共现频次的多少：频次越多，线条越粗。因此，这些代码及线条所构成的网络可以直观展现文本内容之间的互文性和关联性——所有进入该“网络”中的代码，都与其他代码有或强或弱的互文性和关联性。下同。

这一时期俄官方“能源认同话语”的第一个框架为“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该话语框架中，俄罗斯的外部能源市场环境被描述为“全球经济动荡，能源市场危机，能源需求下降、价格波动”。同时，俄官方也清晰地意识到，随着技术变革和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正在进入能源市场，竞争明显加剧。在这一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如图2所示，居于该框架核心的话语要素是“必须在全球市场中确保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利益”，即面对动荡的市场环境、飞速发展的能源技术变革，俄罗斯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首要应对策略是“利益的确认”——不惜代价确保俄罗斯的利益，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方案。需要注意的是，该话语框架中涉及对“自我”和“他者”的道德判断：俄罗斯是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剂”，“非法制裁”俄罗斯的某些西方国家则是扰乱能源市场的祸首。

2. “全球能源安全与合作”话语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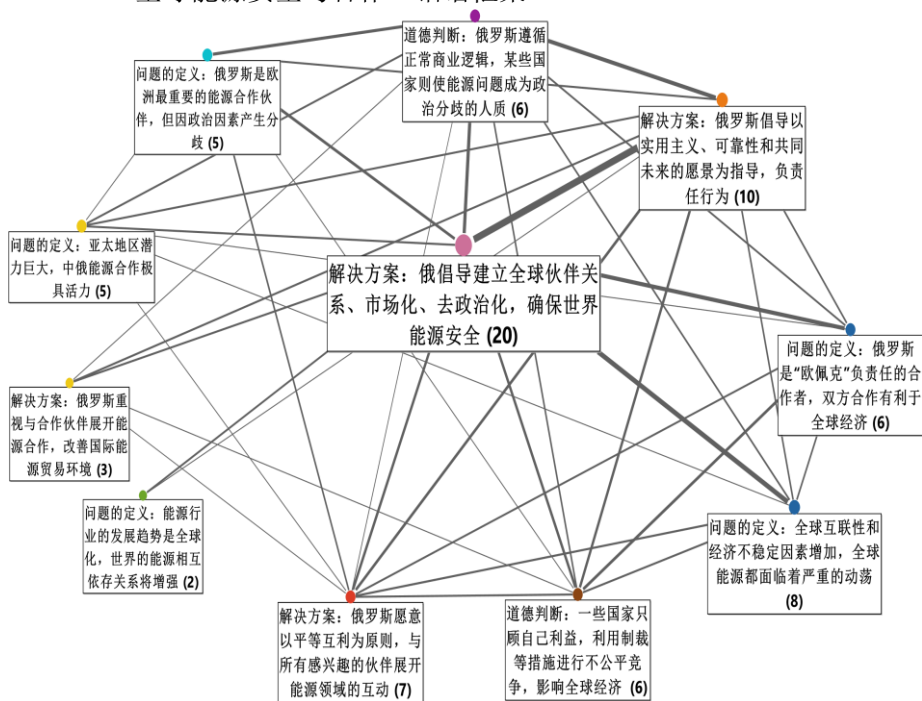


图3 “全球能源安全与合作”话语的互文框架图

图 3 展现的是“全球能源安全与合作”框架。该框架的结构非常清晰，居于核心位置的要素为“俄倡导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倡导全球能源市场的去政治化，确保世界能源安全”。在“全球能源市场动荡”的大环境下，该框架强调了俄罗斯与欧洲、亚太、“欧佩克”等主要合作伙伴在“平等”交往的过程中，秉持“实用主义”和“负责任”的姿态。在这一全球能源关系中，俄罗斯是“遵循正常商业逻辑”的可靠伙伴，而某些西方国家则绑架能源问题，使之成为政治分歧的“人质”。在这样的身份建构逻辑中，俄罗斯倡导、维护全球能源关系的“平衡”，从而确认了“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

3. “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及俄罗斯应对”话语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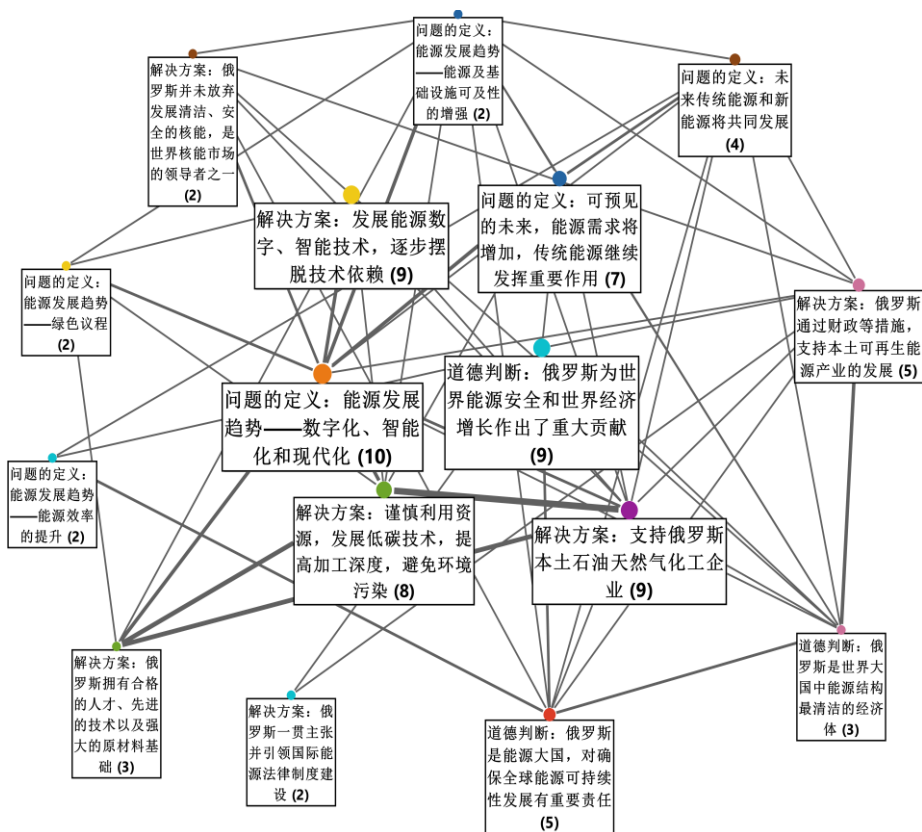


图 4 “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及俄罗斯应对”话语的互文框架图

身份认同的建构既关乎过去和现在，也面向未来。2012-2021 年俄官方能源话语的第三个重要框架即是“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及俄罗斯应对”。如果说前文所述的其他两个框架体现出动荡环境下俄罗斯“能源认同”的稳定性，那么该框架则集中体现了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身份认同结构中的某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如图 4 所示，与其他两个框架不同，该话语框架的最大特征是“去中心化”——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居于框架中心位置的是频次相近的 6 个话语元素，涉及对未来能源需求趋势的判断、能源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趋势、“双碳”议题以及俄本土石化企业的发展等等。总体上，该话语框架强调了俄罗斯在未来能源发展和能源格局中“获得尊重”的愿望，但是并没有围绕一个统一的核心问题来展开话语论述。混乱的话语结构背后的逻辑是：俄罗斯对未来能源发展趋势及自身发展路线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无法就该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叙述路径。话语结构混乱的直接后果是立场的不稳定，即俄罗斯对未来能源发展规划并不清晰。

与俄官方对未来能源发展规划的“模糊”立场相一致，来自“全俄社会舆论中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受访者根本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或者至少不相信是人为因素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而在剩余比例的受访者中，只有 19% 的受访者赞同需要立即减少对传统能源的消费。^①这种潜藏于俄民众认知深处的态度也许正是来源于俄罗斯丰富的能源禀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俄官方对未来能源发展方向的“模糊”立场。

对俄官方“能源超级大国”话语的分析表明，从身份认同建构的角度出发，将俄罗斯建设为“能源超级大国”的选择，与能源直接创造财富以及外部能源市场环境的变迁并无直接关系，而更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主动选择的结果。由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国家复兴与大国身份建设离不开油气资源，因此，“能源超级大国”可被视为“普京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主题之一；即使在油价暴跌的时期，“能源超级大国”相关话语仍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的国内外政策取向。

^①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Жизнь после Греты Тунберг, или потребление на фон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потепления. 18 августа 2020. <https://wciom.ru/analytical-reviews/analiticheskii-obzor/zhizn-posle-grety-tunberg-ili-potreblenie-na-fone-globalnogo-potepleniya>

2012 年再次就任总统以来，普京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作出清晰定性——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过渡时期”，全球发展正在越来越不平等，为新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种族冲突培育了肥沃的土壤。在这样的世界中，“谁将领先，谁将成为局外人并不可避免地失去独立性，这不仅取决于经济潜力，而且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意愿，取决于其内部能量——这就是古米廖夫（Л.Н. Гумилёв）所说的‘激情’：向前迈进和拥抱变化的能力”。^①显然，俄罗斯“向前迈进和拥抱变化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丰富的油气资源。

2013 年 12 月，时任俄罗斯能源部部长的诺瓦克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指出在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中，制定世界第一能源大国的能源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国内和国外，人们经常谈论俄罗斯的‘资源诅咒’问题，说我们剥夺了平等发展所有经济部门的机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看法……如果我们退出世界能源市场，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②这一表态反映出俄罗斯官方对自我“能源超级大国”意识形态的建构逻辑——俄罗斯并不存在“资源诅咒”，不是俄罗斯依赖世界能源市场，而是世界能源市场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至于未来全球能源市场风云如何变幻，以及俄罗斯将如何“拥抱变化”，俄罗斯似乎并不急于给出答案。如前文所述的三个框架所展示的那样，对于“能源超级大国”身份，俄官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利益要保障，关系要平等——但是未来具体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因此，其官方话语中的“能源超级大国”更多表现为一种对外层面的“大国姿态”主张，一种外交层面的“表演”。

（三）将能源纳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

在 2013 年下半年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普京开始重新提出国家意识形态问题，并在同年国情咨文中重申俄罗斯选择保守主义倾向，保护传统价值观，这些传统价值是千百年来俄罗斯文明精神、道德的基础。^③笔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

② Тезис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инистра энергетики РФ А.В. Новака «Приорите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Брукингс, США. 6 декабря 2013 г. <https://minenergo.gov.ru/node/3380>

③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12 декабря 2013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825>

者发现,将“能源”因素纳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是近年来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议程。从2015年开始,俄罗斯联邦能源部发起了名为“伟大胜利中的能源”的社会运动,并将俄罗斯能源工业参与二战的史料数字化,制作了一个“线上博物馆”。^①

该网站首页上刊登了时任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的致辞:“许多年过去了,但我们仍然怀念那些英勇的日子和勇敢的人们,他们证明了自己对于职业的忠诚和对祖国土地的热爱。这就是‘伟大胜利中的能源’项目对我们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将把记忆的接力棒传递给能源行业的新一代工人,向他们介绍我们的英雄,并再次向退伍军人致敬。我相信我们和那些刚刚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会为俄罗斯燃料能源综合体的进一步发展而竭尽全力,让我们的父亲和祖父为我们感到由衷的自豪。”网站中还保存大量俄罗斯能源工业参与“伟大卫国战争”以及相关纪念活动的新闻报道和影像资料。

同样在2015年,俄罗斯国有电视频道(Россия-1)播出了“伟大胜利中的能源”同名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将充足的能源供应描述为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因素之一,认为苏联的能源部门在战时确保了胜利,在战后恢复了经济,是苏联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依托。^②除了“线上博物馆”和纪录片,“伟大胜利中的能源”项目自2015年起,还定期举办相同主题的大型音乐会、足球锦标赛、排球锦标赛、马拉松比赛等公益性文体活动,参与者为俄罗斯主要能源公司的员工。这些活动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国家能源部、能源企业改善公众形象,同时成功地将“能源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嵌入俄罗斯二战胜利的历史叙事之中。

当代艺术为我们审视俄罗斯的“能源超级大国”认同提供了另一种非官方视角。金托夫特是俄罗斯当代著名艺术家,他于2008年底凭借“祖国女儿”(Родина-дочь)项目获得了当代俄罗斯著名艺术奖项“康定斯基”奖(Премия Кандинского)。由于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作品中所谓的“苏联式帝国美学”,金托夫特在当代俄罗斯文化界备受争议。金托夫特追随杜金(А. Дугин)的“新欧亚主义”理念,是欧亚运动中的著名文化界人士。杜金的

^① “伟大胜利中的能源”官方网站: <https://www.энергияпобеды.рф>

^② Тернер С, Евсюков А. Энергия Великой Победы. 10 мая 2020 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PDXSltgsM>

欧亚思想强调对欧亚大陆的扩张性整合和与美国的对抗，具有明显的激进色彩；^①而金托夫特的艺术创作遵循同样的理念，他认为根据地缘政治的规律，俄罗斯属于大陆国家（与西方海洋文明相对应），在艺术中应该以静态、恒常、保守主义的方式被表征。有趣的是，他选择“石油”的黑色以及象征“帝国”的金色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色调，以表达他所理解的崇高、永恒的“俄罗斯帝国”。在他的作品中，黑色的五角星是“欧亚美学”的重要标志物，与“石油”和“苏联”形成互文；同时，莫斯科白宫、克里姆林宫、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莫斯科凯旋门、奥斯坦金诺电视塔等标志性建筑常以象征“帝国”的金色呈现，与厚重的黑色“石油”背景形成鲜明对比。在金托夫特“欧亚美学”的隐喻中，俄罗斯的石油财富是实现其“欧亚主义”主张的依托，是艺术想象中“俄罗斯帝国”的“永恒财富”。

另一位俄罗斯当代著名艺术家丘马克则将石油视为“新神”，“石油是神的礼物。以前，人们依赖太阳和雨水；而现在，人们依赖石油”^②。丘马克热衷于在作品中描绘一个未来的“能源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圣彼得堡宏伟的宗教殿宇与石油工厂“杂交”，“挪亚方舟”上搭载的动物被替换成炼油厂的管道、烟囱。丘马克的艺术想象体现出明显的“俄罗斯保守主义”理念：俄罗斯土地所蕴含的自然财富（石油、天然气、黄金、水）是俄罗斯战胜“后工业全球化”的关键；如果石油是人类发展的“新神”，那么俄罗斯这片富含石油的土地就是新的“应许之地”。

六、“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俄罗斯拒绝成为“原材料附庸国”

如前文所述，“能源超级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是一种俄罗斯官方构建的意识形态。但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关于能源与俄罗斯国家发展、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止。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数据，多数俄罗斯居民认同俄罗斯必须继续追求“超级大国”地位（76%，2020），但只有非常有限的受访者将能源等自然资源作为“超级大国”的重要构成要素

^① 毕洪业：“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影响”，《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Квасок Ю. Пастух старука фараона// Advertology. 16 июля 2012 г. <http://www.advertology.ru/article107015.htm>

(20%, 2018)；^①多数俄罗斯民众认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应该更依赖于人民的福祉、经济发展潜力、军事实力（核力量）、文化、科学、艺术等因素。^②在奥斯陆大学进行的一项名为“当前俄罗斯的国家建设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有64%的俄罗斯受访者同意“俄罗斯是一个能源超级大国”，但同时，在另一项看似矛盾的调查中，有63%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一个原材料附庸国（сырьевой придаток）”^③。

民调结果显示，在俄罗斯的大众想象中，作为国家认同的“能源超级大国”身份，受到另一种主流认同话语的挑战——俄罗斯应避免成为一个“原材料附庸国”，因为这将使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落入从属地位。本研究对所收集材料的编码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点：巨大的能源财富对于俄罗斯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祝福”，对于能源工业的依赖有可能阻碍俄罗斯的现代化发展，并使俄罗斯沦为外国市场的“附庸”；换句话说，“能源”有可能成为俄罗斯追求“超级大国”身份路上的阻碍因素。这构成了俄罗斯能源认同中的一个基本话语——“反能源超级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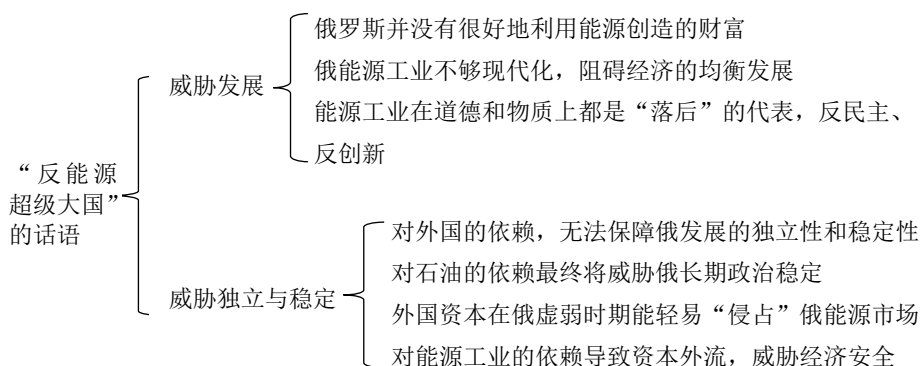


图5 “反能源超级大国”的话语结构

^① Levada Center, *Public Opinion 2018. Yearbook*, Moscow: Levada Center, 2018, <https://www.levada.ru/sbornik-obshhestvennoe-mnenie/obshhestvennoe-mnenie-2018/>

^② Levada Center, *Public Opinion 2020. Yearbook*, Moscow: Levada Center, 2020, <https://www.levada.ru/sbornik-obshhestvennoe-mnenie/obshhestvennoe-mnenie-2020/>

^③ NEORUS, *National Survey 2013*, University of Oslo, 2013, <http://www.hf.uio.no/ilos/english/research/projects/neoruss/national-survey-2013.xls>

与“附庸”相关的话语在俄罗斯的政治语境中历史悠久，可追溯到苏联成立之初。1925 年，斯大林对苏联经济建设作出指示，鼓励苏联发展独立的经济体系，以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后来，苏联当局使用“附庸”一词来描述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经济、政治自由化的反对者声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俄罗斯一步步转变为西方的原材料附庸国。^①

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21 世纪以来俄罗斯的“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认为能源工业是原始的、前现代的、不可持续的落后工业的代表，对于能源出口的依赖威胁俄罗斯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进程；第二，对能源工业的依赖加深了俄罗斯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威胁俄罗斯的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且不可避免地将俄罗斯置于国际等级体系中的低位。最初，“原材料附庸国”的论述侧重于将西方建构为威胁自我身份的“负面他者”；而近年来，随着中国能源消费在俄罗斯能源出口份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俄罗斯国内关于中俄能源关系的讨论也随之增多。

“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在俄罗斯的学术话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似乎只有少数俄罗斯专家满怀热情地谈论将能源作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和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基础，比如西蒙诺夫（К. СИМОНОВ）在其引起广泛讨论的著作《能源超级大国》（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中指出，“建立一个开采和销售能源资源的主权体系，使俄罗斯能够独立决定其能源出口的去向，这关乎的并不是一个帝国的野心，而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生存问题”。^②但同时，西蒙诺夫也指出，对能源所创造的财富善加利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更多的专家则公开宣称将俄罗斯变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的尝试是一种战略失败。比如卢基扬诺夫（Ф. ЛУКЬЯНОВ）认为，在 21 世纪初油价上涨时期，政治精英们将俄罗斯转变为“能源超级大国”是一种聪明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的最初目标并不是停留在“能源超级大国”这一荣誉之上，而是将能源资源作为鼓励俄罗斯经济发展、加强其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工具。但

^① Нина Андреева. Неподарен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или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збр. с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 Нина Андреева. Сост. сб., авт. примеч., предисл. и послесл. Белицкий А.И. - Саранск : Б. и., 1993. С.66-76.

^②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Пресс, 2006 г. С.7.

是当国际油价在 2008 年开始下降时，这一战略就应该转变，继续坚持建设“能源超级大国”甚至是有害的，因其损害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俄罗斯的现代化和市场自由化，阻碍了后苏联时期俄经济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①

莫夫昌等学者认为，就石油出口的依赖程度而言，俄罗斯大约与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和伊朗等国类似。虽然从短期看，石油是维持俄罗斯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这种对于能源的依赖最终会将俄罗斯的经济推向危机的边缘。^②米特罗娃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世界范围内的能源转型，尤其是欧洲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呼吁走低碳经济复苏之路，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加强了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这些都将对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带来不确定性。^③

“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并不局限于经济、社会领域。俄罗斯公共话语空间中存在着一种疑虑，即将能源收入与普京的“威权政治”联系在一起，认为对能源收入的依赖客观上为专制和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莫夫昌非常直白地指出，21 世纪初俄罗斯石油收入的爆炸性增长与普京的执政模式走向“威权主义”有直接联系，因为“该政权在执政初期坚持更加自由的政策”，但后来的巨额石油收入使得政府不必再费心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也不必绞尽脑汁讨好选民，因为石油解决了所有问题。而石油收入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内部殖民化”：俄罗斯的巨额石油财富造就了大批腐败官员，俄罗斯并不成熟的经济体制使得他们害怕把资金留在国内，因此石油贸易产生的大量非法资金被持续转移至国外；而俄罗斯“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将导致剩下的“黑钱”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洗白，重新用于俄罗斯国内的投资，所产生的恶性循环很难被普通民众察觉。^④

大众文化中的“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的表征方式则更具直观性和象征性。艺术家洛日金曾创作“天然气父亲”和“石油母亲”的艺术形象，隐喻

① Лукьянов Ф. Умный дауншифтинг: как России догнать 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революцию. 1 марта 2016 г. <http://www.forbes.ru/mneniya/mir/313863-umnyi-daunshifting-kak-rossii-dog-nat-promyshlennuyu-revolutsiyu>

② Мовчан А. Россия и «ресурсное проклятие»: когда действия режима контрпродуктивны для экономики. 6 апреля 2017 г. <http://carnegie.ru/2017/04/06/ru-pub-68601>

③ Митрова Т. Корона-нефтяной обвал. Что ждет российскую энергетику после эпидемии.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790>

④ Мовчан А. Черное зло. 6 Апреля 2017 г. <https://carnegie.ru/2017/04/06/ru-pub-68599>

油气资源在俄罗斯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趣的是，这两个艺术形象阴沉可怕、面目可憎，而“石油母亲”怀抱中象征“俄罗斯”的婴儿，正大口吮吸着奶瓶中的黑色石油。在洛日金其他以石油为主题的作品中，将石油隐喻为俄罗斯文明“不清洁的食物”也是常见的艺术手段，如用石油做成的气泡水、鱼子酱、香肠、蜂蜜等等。将俄罗斯的历史、文明与油气资源联系在一起，这是前文所述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认同的核心话语结构之一，但洛日金等艺术家的作品则解构了这一关系——能源可能是俄罗斯文明的“养分”，也可能是“慢性毒药”。

装置艺术家莫洛德金的作品，则体现了俄罗斯当代艺术中有关能源与权力、专制、腐败等问题之间关系的思考。尤科斯石油公司前总裁、俄罗斯能源金融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于 2003 年以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财产等罪名被起诉，并被捕入狱，获刑八年，之后又于 2010 年被控洗钱追加刑期五年。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审判期间，莫洛德金用“石油装置艺术”讽刺了该事件：他设计了一个透明的牢笼，并在牢笼中注入石油和天然气，隐喻“国家权力被石油、天然气所渗透”。之后，莫洛德金以“石油装置艺术”的形式创作了多个艺术作品，如在标有“希望”“民主”“G8”字样的透明装置上连接输油管道，注入石油。他认为，管道就像血管，石油就像血液，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资源是当代社会权力的象征；不仅仅是俄罗斯，石油工业也是当代西方经济的“血肉”；当今世界的文化、宗教、经济、政治冲突都可在“石油”中寻找答案。因此，将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希望继续寄托于“石油”之上，是对“发展”本身最大的讽刺。

七、结语

本文认为，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来说，其国家认同中的能源因素具有复杂性、矛盾性。与世界上多数能源生产国相比，俄罗斯的国家认同中并未充分纳入“能源叙事”——俄罗斯并未被建构为一个“典型”的“石油国家”。普京第二任期以来，俄罗斯官方着力将“能源超级大国”建构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尽管这一做法在俄政治精英内部并未达成绝

对的共识。而在学术界、大众文化语境中，“反能源超级大国”“反原材料附庸国”话语和官方主导话语之间存在张力。

在俄罗斯的公共话语空间中，“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和“原材料附庸国”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建构的，在彼此排斥的同时，又加强了彼此的再生产。以“原材料附庸国”为代表的“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普京政权必须在国内、国际层面上不断复制、强化“能源超级大国”话语，以维持俄罗斯作为能源出口大国身份的合法性，并依据此身份来完成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因为，俄罗斯与能源工业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一旦放弃“能源超级大国”这一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就意味着俄罗斯不得不接受该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原材料附庸国”身份。因此，即使在油价暴跌时期，俄官方仍然坚持自我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身份，坚持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维护俄罗斯的利益，维持与西方大国能源权力关系的平衡。在应对未来能源发展趋势方面，俄官方并未给出明确、具体的路线图，也未形成稳定的话语框架。

而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能源超级大国”又会不可避免地唤起人们对“原材料附庸国”的负面联想与反感情绪，二者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这就是俄罗斯官方不可能将自我表征为一个“典型的能源国家”的原因。因此，尽管在俄官方的对外话语中时常明确阐述俄罗斯在全球能源供应中的不可或缺性，但“能源超级大国”这一概念并未高频出现在普京及其他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对内讲话中。由此看来，其“能源超级大国”更多表现为一种“大国姿态”的自我主张和外交层面的“表演”。

“能源超级大国”和“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同时存在于当代俄罗斯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语境中，二者能够表征出不同的“我-他”身份的关系建构。“反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将俄罗斯定位为西方全球扩张过程中潜在或实际的受害者；在这一话语框架中，俄罗斯与西方的能源贸易被视为一种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与文明身份的威胁。而“能源超级大国”话语则将俄罗斯建构为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合作者身份，甚至在合作过程中可以利用“资源禀赋”争取主导地位——尽管这种主导地位有时会被解读为“能源勒索”，但来自对手的污名恰恰反向迎合了俄罗斯的大国心态。

在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差异性身份建构过程中，俄罗斯的“能源超级大国”身份客观上需要西方国家的认可。比如，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安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俄罗斯自我建构的“能源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基础之一。但随着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急转直下，俄罗斯“能源超级大国”身份迫切需要引入新的“他者”，以维持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因此，2012 年之后，俄罗斯官方主导的“能源超级大国”话语与“伟大卫国战争”“俄罗斯保守主义”等历史、意识形态叙事相互杂糅，赋予俄罗斯的能源财富以独特的“俄罗斯文化价值”；这种话语变体配合了 2012 年之后俄罗斯官方的反西方主义倾向，使得能源因素成为弘扬俄罗斯历史记忆及文化优越性的重要象征。在 2022 年俄方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语境下，俄过去倡导的“能源市场去政治化”愈发艰难，通过历史记忆维持自我身份合法性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official, academic texts, and popular culture, an analysis of the element of “energy identity” shows that both energy superpower and anti-energy superpower identity discourses co-exist. Both discourses of identity reinforce each other’s reproduction while rejecting each other. The energy facto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establishment of Russia’s great power vi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for a long time, Russian authorities have focused on constructing the energy superpower as an official ideology. Even in a period of plummeting oil prices and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Russia officially has maintained its identity as an energy superpower. However, with regards to future energy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lated responses, Russia has neither formed a clear and concrete roadmap nor given a stable discourse framework. Its energy superpower discourse is more of a self-expression of a great power status and diplomatic performance. The *anti-energy superpower* discourse views Russia’s energy trade with the West as a threat to 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and this *insecurity* supports the stability of the *energy superpower* identity. In the current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depoliticize the energy market as Russia has advocated in the past.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energy factor into its *historical memory* and maintaining the legitimacy of its identity have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Russian-led *energy identity*.

【Key Words】 Russian Energy, Russian Oil,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Intertextual Discourse Analysis

【Аннотация】 Анализ факторо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текстах,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текстах и популяр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два вида дискурсов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 и «анти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верхдержава», отвергая друг друга, он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развив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сыграл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процесс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Россией «видения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в 21 веке, и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чиновники прилагали большие усилия для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в качестве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Даже в период падения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и глобаль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лица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астаивают на своём статус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Однак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удущих тенденций развития энергетики и ответных мер российские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лица не предоставили чёткой и конкретной дорожной карты и н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устойчивую основу дискурса — дискурс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больше похож на самоутверждение «позиции великой державы»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Дискурс «анти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торговлю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ями России с Западом как угрозу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это чувство незащищённости,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дкрепля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В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лож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деполитизац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рынка», за

которую выступала Россия в прошлом,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труднее, включени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в сво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амять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стало нов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развит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м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ефть,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ый дискурсивный анализ

(责任编辑 苟利武)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 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 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 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 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 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 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2年第2期(总第234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公开发行人

定价：30.00元